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 著



商务印书馆



“欧洲共产主义” 与国家

〔西班牙〕 圣地亚哥·卡里略著

钟 琦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2年·北京

Santiago Carrillo
“EUROCOMUNISMO” Y ESTADO
Editorial Oritica
Barcelona
1977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
〔西班牙〕圣地亚哥·卡里略著
钟琦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3017·219

1982年1月第2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2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 120千
印数 1—6,800册	印张 5 1/8

定价 0.69元

目 录

前言	1
一 国家对社会的作用	5
二 国家意识形态工具	20
三 国家强制工具	41
四 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	68
五 “欧洲共产主义”的历史根源	99
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128

前 言

由于情况特殊，我比较有空，而且也有兴致，于是我便对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任何探索都有点冒险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1976年2月，我跨进西班牙国境时，就知当局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会允许我在国内露面，迫使我继续过一种完全处于地下的生活。我打算一方面积极和同志们一起商定各项政治决策，为出现一个适应民主制度的共产党而进行工作，另一方面逐步打破处于地下的状况，争取我作为西班牙公民的权利。尽管如此，我知道，我不得不采取的活动方式会使我有时间来进一步研究一个时期以来我不断在思考的问题，并把这些想法写下来。

一位朋友乐于向我提供使用其藏书的方便。他的藏书种类繁多，数量众多。尽管在西班牙书刊检查制度的限制下，我想引用和注明出处以及核实记忆而需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不齐全，但我最关心的论证国家问题的书籍还是很多。一部分书用处不大，而另一些却很有用。倘使我能自由活动，引用的材料定能更加可靠，我也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帮助，不过一旦能自由活动，我便难以有时间做这件工作了。反正总得有所取舍。

1919年7月11日，列宁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题为《论国家》的报告时，告诉听众，如果认为报告不够明确，说服力不充分，也不必懊丧，“因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可

以说，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①*

作为才学浅薄的自修者，我想对此作一点小小的补充。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本身也有含糊不清的地方，甚至有时还有矛盾（至少是形式上的矛盾），这就可能在读者中产生疑问，至少是引起思索。这个课题已被搞得如此之乱！如果从实践中去观察，那末，矛盾和混乱还更严重。因为列宁在关于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中所描述的过渡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列宁在世时在实际中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国家（更不必说他死后的那种国家）之间，有着种种根本的区别。

我在本书中经常使用“欧洲共产主义”这个提法，读者也许感到奇怪。这一提法现在十分流行，尽管并非共产党人所创造，且其科学价值也还是值得怀疑。但在舆论中，它已经有了一种含义，并且一般说来，成了目前各种共产主义倾向之一。这种思潮到目前为止，与其说表现为一种理论主张，不如说表现为对政策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所以如果它还有些不确切，那末，这种不确切性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探索得还不具体而造成的。这一情况再次表明，实践通常领先于理论，而理论又是实践的概括。当然在理论指导实践，给予科学的严格性，并广泛地阐明其作用的情况下，实践也就会具有可靠的依据和根本的内容。

然而，“欧洲共产主义”所依据的政策和理论主张，确定了当代进步革命运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力图切合本大陆的实际情况（虽然在根本上对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效），力图使得具有当代特点的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符合欧洲的实际情况。

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公开明显地存在的实际问题和矛

^① 列宁：《论国家》，《列宁选集》第4卷，第41页。

* 着重点系卡里略所加。——译者

盾，是形成上述进程各种问题和矛盾的反映，其中显然包括有关国家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有些地方在以前的社会结构下采取种种特有的途径建立政权而造成的，其中强行并吞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被造成的政治状况，不是总能符合当地种族和历史状况的；凌驾于这些矛盾之上的，还有新的矛盾，即由于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利害不同以及由于列宁早就说过的无产阶级并不会因夺取了政权就变成圣人而出现的矛盾。然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问题与矛盾也渊源于各种道路、具体情况、文化传统影响、经济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造成了实际存在多种政治思想倾向的状况。当革命进程带着巨大的差异扩展到全世界，这些不同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存在不同的倾向是今天的现实。用“实行统一的命令”也好，用革出教门也好，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社会、文化、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世界化的漫长过程（谁也无法预言需要多少时间）中，逐步消除这些倾向。

这就是被确认为现实的，人们所说的“欧洲共产主义”，尽管至今我们还没有给它找到更好的提法。应该指出，这一倾向固然有其不可否认的特点，并曾在1976年6月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和其他国际会议上有所表示；但它既不是一个组织，也未曾制订任何的共同纲领。

这并不是要宣传一种第三条道路。如果把世界革命进程采取的各种不同的道路都罗列出来，则人们所知道的就远远不止三种。

这也不是向社会民主党立场的倒退，也不是否定产生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原因。

必须承认，本书对国家问题的看法不同于列宁在1917年和1918年的论点。列宁的论点适用于俄国，理论上也适用于当时

的其他各国，然而今天已经被超越，已经不适用于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适用，是因为经济结构起了变化，客观上壮大了进步的社会力量，包括核能力在内的生产力有了发展，社会主义和非殖民化取得了进展，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失败。

有的人读到列宁的某些论点已被超越之时，也许觉得这是亵渎。这种人不知道列宁对马克思的某些论点也讲过同样的话，而且苏联的列宁的继承者也曾公开修正列宁的某些论点。

我于1976年12月22日在马德里被捕，中断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写作。一星期后我获释出狱，成了合法的公民，于是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时间进一步修改我的写作，只在付印前粗糙地审阅了一遍。我相信书中的缺陷和不足，将在今后对这一如此重要和决定性的课题的辩论中得到克服。

一 国家对社会的作用

国家政权的问题继续是一切革命的问题

开始下笔，我就想立即概要地阐明这个我要提出的棘手问题，仅仅是为了引起辩论，促使更加高明的有识之士继续这一工作，即使我完全被压倒也心甘情愿。这里谈到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在具体论及前途方面提出的（意大利、日本、法国、英国、瑞典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大体类似地提出的）关于国家、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课题。这些党并不企图充当榜样，目前正在按照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特点，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制订一条革新的路线。

关于这一路线，某些信仰相同的人以及许多观点敌对的人，都写了严厉批评的文章。信仰相同的人谴责我们是机会主义，为了“民族主义”而放弃了国际主义，是“反苏主义”，抛弃“阶级立场”。总之，象谈论“恐怖主义者”一样地把我们说成是某种概念不清的东西，说我们是修正主义。

读者在回忆中，也许不曾忘记东方国家的领导人和官员大量散布谴责我们的文章和讲话。

面我们的政治对手，甚至是某些盟友却从另一个角度攻击我们，或对我们有所保留。他们表示，这可能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便于取得其他民主力量的谅解，走出处于地下的小圈子，或者也是为了获得更好的选举结果，其最终目的是为更方便地上台执政打开道路，等到一旦执政，我们强大了，就会“摘去假面具，采取强硬手段”。

我在这里不过对上述两种人的批评作一简单综述，各种批评常有极其细微的区别，但是其根本意思就是这样。

这些批评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无数的批评是存心不良，不正派的。但是，我并不低估这些批评不仅在某些工人和人民群众以及在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即在中等阶层里，甚至还在我们自己党内所造成的影响。在我们党内，可能有人认为我们若非已经陷入的话，也正处于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边缘而危及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有些同志也可能相反地认为，我们的方针实际上是在特定时期，为了统统占为己有而采取的一种权术，认为这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态度。

纵然在西班牙这样一个刚刚痛苦而茫然地摆脱了四十年独裁统治的国家里，各个政党（不包括我们党）在运用政策方面习惯于采取一切能在策略上有利于自己兴旺强固的手段，不必过多地顾及原则。对于这些党，人们无论如何都能原谅的。它们可以采取这些对它们有效的方法，因为人们相信，即使这些政党取胜，它们也是不会改变社会制度的。与此相反，共产党人却处于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得不到那样的容忍。人所共知，我们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的，我们并不对此故弄玄虚。许多人害怕我们也将不可逆转地破坏种种政治权利，并取消在野派的权利，因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在取得胜利之后确实是这样做的。

为了实现我们所主张的道路（即实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将保持和丰富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人权，并赋予这些权利以新的经济和社会内容，民主权利和人权是人类向前发展的无法否认的历史成果），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仅仅抛开我们的理论家创造的某些公式（比如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仅仅声称我们遵守民主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对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处的世界形势，对生产资料取得进步所造成的后果以及由其推动的新的社会

结构，进行贯通全局的分析，尤其要对目前的国家，特别是通过民主道路改造国家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也要批判地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

如果我们拿不出站得住脚的观点，来证明有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民主化，并把它改造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效工具而不必采用暴力从根本上加以摧毁，那末有人就会说我们是策略主义，或者把我们比作社会民主党。

因为国家机器就其整体来说，仍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且是一种精心使用的工具。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国家并不凌驾于各阶级之上，不是各阶级的仲裁人。然而有一种思想却竭力持与此相反的论点，以不同说法表达的这种思想起码可以追溯到黑格尔，而由法西斯主义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改造国家机器，任何社会主义改造都搞不好，甚至白搞。尊重选举结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却不是选举结果的问题。问题在于会受到在理论上保卫法制的那些人的有力的打击。

智利的经验表明，在准备尝试社会主义的人民团结政府执政时，国家机器仍然是一个受到美帝国主义及其各种机构和多国公司深刻渗透的资本家的统治工具。一当形势有利，这部机器就来了一个大翻个儿，取消了民主宪法，建立了残暴的军事独裁统治。

资本主义国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国家当前有些什么特点？如何加以改造呢？这就是一切革命的问题之所在，也是我们准备通过民主、多党制、议会这种道路实行的那种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能够无视的。

对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对于很有名望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按我的愚见，他们是草率和匆忙提出的）民主概念，也必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现在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概念也是值得的。通过这种或那种

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现在已有好几种例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连宗教神话都发生了危机，因而我们不能神化这些社会，而要研究它们的经验，以便摆脱我们的导师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多少带着一些预卜空想的那种状态。他们那时没有掌握现在的经验，因而无法更深刻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的道路，这些道路上所会遇到的艰难险阻，以至某些情况下的局限。

另一方面，当我们陷于主观性，质而言之亦即陷于唯心主义的时候，某些容易忘却的事情倒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比如生产资料发展所起的作用，这个发展程度是不顾我们的意志而在客观上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实际内容的。

生产关系告诉我们社会的性质，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是在有形的生产关系之外，最终决定生产关系内容的真理也在于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具体发展程度。不是建立在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能具有某些表面形式——要在我们常常讲资产阶级社会具有各种自由这一意义上理解这种表面形式。总之，承认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尽管这是根本的），还不能算是站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还必须认识另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因素，即生产资料发展的全部重要意义。在历史上，有时阶级斗争的高潮会造成超越生产资料发展程度的暂时飞跃；但是归根结蒂，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资料发展这一因素会重新发挥作用，并会使阶级斗争在关键时刻造成的飞跃失去平衡，变质，甚至成了问题。

在一定的限度内，上层建筑确实有自主性。但是上层建筑的自主性并不是无限的。掌握政权的领导人有时忘掉了制约上层建筑的各种条件，他们以为发号施令的工具以及他们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就可以决定一切，不受任何束缚，不受任何客观规律的制约。总之，他们专横武断地行事，每当他们的计划不符合实际可能时，就需要找出替罪羊来对此负责。那些出于好心的评论家仅仅从伦理

的观点试图对这些或那些错误和反常现象作出判断，他们从反面角度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在当代背景的情况下，探讨这些问题决不意味着不要革命，不要社会主义。

这不是空想（即那些在一个时期中鼓舞着我们的种种神话）同迄今各国革命所达到的实际成果之间有差距，以及同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进展之间有差距，从而产生失望和幻灭的结果——至少在我来说不是如此。我今天信仰着二十岁时信仰的一切，而且在根本上还怀着那时候的幻想，我认为现在的根据更多了。有的人抛弃了这种幻想，我对此感到痛心和失望。

尽管有着各种错误和异常，正是由于各国的革命以及工人运动和解放运动的进展，历史才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历史进程确实是在巨大的不正常现象中发展的。人类的意志和社会科学在克服和控制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后果方面应该越来越起作用。但是否认进步，妄自菲薄，失望泄气，站在一旁计算受到挫败的次数并预言今后的灾难，这样就不配是真正的革命者。

我尊重评头品足的人，他们可以并且正在起一种有用的作用，提醒注意政治不应超越的界限，他们也算是是非的判断者吧。但如果要由他们来搞政治的话，很可能会落得一个上保守势力绞刑架的结局，要不然就是为躲避风险而逃离职守。他们定会造成严重得多的灾难。

我讲这番话不是想否认我在一系列问题上改变了看法，也不是否认有时对我提醒（或对我指责）的人是有道理的。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改变了好些以前维护过的观点。不时有人怀疑这种看法的变化是否真诚，这些人是没有道理的。其中许多人的看法确实没有任何根本变化，他们自以为，世界和我们在结束了一个周期之后，又回到了历来固有的位置。他们不知道周期似乎在接近他们，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而是螺旋形上升，并越来越离开他们。人的自

然倾向，尤其是为事业而殊死斗争的具有特性的人的自然倾向，是“保持本性而不是反复无常”。我们在战斗事业中的特性和坚定性，我想人们是无法否定的。既然我们改变倾向，那就是因为我们取得了一种深刻的信念，而个人的经验和历史的经验又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宝贵的一点倒不是我们自己学到了一点东西，并敢讲出来；最宝贵的一点也许是凭借了我们自己的经历，就能在纠正方向时享有一种别人因缺少这种经历而不具有资格。

我们这些在判断一系列问题方面有了变化的共产主义老战士，人数很多，可以说除极少的例外，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了变化。还可以说（尽管这个说法看来是冒失的）变化最大的人恰恰是那些看来根本没有变化的人，是那些鹦鹉学舌似地重复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乃至一百年以前的公式的人。那时候的公式是一些针对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情况的概念，其实质内容也不同于目前发起革命所需要的主张。同样的词汇，同样的公式，今天的概念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这些说法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成了内容保守、一事无成的东西。尽管重复这些说法的人，可能也是那种没有意识到事物发生了变化的老实人，然而他们却更多地使人想起官办宗教的司仪牧师，而不象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进行斗争的革命者。更不用说有人还象为了保持自己的等级或是为了向上爬而一味听从命令的放荡的牧师。

我深信，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改变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正努力在实际经历中进行学习，紧紧抓住具体情况，从中引出切合于当代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方针。我们恰恰是在根本上没有起变化的人。我们继续感到肩负着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责任，我们无保留地献身于捍卫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工人运动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有名的论战——其中最有名的是恩格斯同杜林，考茨基同伯恩斯坦，列宁同考茨基的论战。“修正

主义”一词因而声名狼藉。现在有人企图用这个提法，加在根据具体斗争所处的实际情况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而改变某些观点的我们这些人头上。

然而他们忘了，曾经有过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修正主义。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谈到资产阶级革命时写道：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象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①

“相反地，……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②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自我修正的，革命者也是这样。列宁修正过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并创立了比如说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利用其最薄弱的环节的理论，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奠定理论基础。考茨基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断定俄国在1917年并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也是有道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那里并未取得高度发展。然而考茨基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用于1917年的俄国革命危机。

列宁也曾多次作过自我修正。1919年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修正了以前全部的经济政策。他在论述中国革命的讲演中，谈到农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② 同上书，第607页。

民苏维埃而不是俄国的工人苏维埃，这也是考虑到中国具体情况而对苏联本身的经验进行了一次修正。掌握了政权，放弃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接受并采纳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这难道不也是修正吗？

自称列宁接班人的斯大林，用苏共机构通过决议的办法，毫不费力地修正和取消了列宁阐明的种种理论。赫鲁晓夫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赞同之下不仅修正了而且谴责了（这是有道理的）斯大林的某些做法和想法。现在的苏共领导人又修正了而且在政治上还活埋了赫鲁晓夫。

现在并不是要揭示这些接连发生的修正事件对了多少，错了多少，而是要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推断出，从相反的意义上进行修正，这样做的不仅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而且还有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有人吊着嗓子拚命反对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其他西方党的修正主义，他们之中有些人尽管总能找出替罪羊来推卸他们自己至少在某种意义中对某些行动应该承担的责任，然而他们本人也曾多次充当过修正分子——甚至修正了他们自己的著作。

我想在下面谈谈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民主的意义、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内容等问题，这完全由我个人负责。今天谈论这些问题意味着怀疑我本人曾经为之申辩的某些想法和某些解决办法。我相信，我，以及研究这些问题的人在谈看法时，都会采取忠于并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态度，我们都是象以往一样的共产主义者。我们不打算“伸手帮一把”没落的帝国主义，而是在努力加速它的灭亡；我们不是在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营垒，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仍在继续同它战斗；我们是要拿出生活在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行动。

我们主张的解决办法无疑并不适用于全世界，而是适用于我国和发展程度相似或发展程度更高的其他国家。想要在历史上从

未有过多党制、议会制的地方，比如越南、老挝以及第三世界其他地区推行这些制度，提出这种要求犹如狂犬吠日。在这类地区，社会主义和民主会有不同的形式。反过来，那些要把自己的模式树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并要向我们及其他人推行的人，也在犯类似的错误。列宁关于可以有多种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天才预见，如果尚未被现实所超越，那末也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就是对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要么就是真能这样做了；要么就是搞纯意识形态（我是贬意地用这个词的），脱离实际，搞成早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东西。今天，西班牙、欧洲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实际情况，有着我们无法回避的种种非常具体的特殊性。如果西班牙保守势力碰到的共产党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抱着过时的看法不放，把西班牙革命仍旧看作以前其他国家革命的简单翻版，那末他们就会更加高兴了，因为这样的党势必十分脆弱，不能摆脱孤立和摆脱小圈子，不能以自己的形象来指引政治活动，不能发展成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不能有助于确立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然而我们是不会使他们高兴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逝世后， 国家的结构和职能的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看法是在本质上把国家看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特别强调国家的强制性质。

另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有葛兰西和阿尔杜赛）还提到了意识形态工具，即不怎么用暴力而是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手段对人们意识起作用的工具。意识形态工具包括宗教（各种教会）、学校（公立和私立的各种学校）、家庭、法律、政治（由各种政党组成的政治体系）、新闻报道（报刊、广播、电视等）、文化等方面。

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经济集团的代表，越来越多地起着控制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今天似乎也必须补充提出这种作用。国家控制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直接干预不到的种种社会活动也就日益无足轻重。

如果说过去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生产的家庭私有性质，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因而逐步发展了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利润的资本主义私有性之间的矛盾，那末今天由于人们所说的科技革命，生产力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增长，生产、服务业、整个经济的社会性质又有了惊人的发展。

技术发展给开办私人企业的原则造成了危机，因为只有为数甚少的几家大企业才能够拥有使用这种技术所需的巨额资金。资本主义国家主动补足私人资本的短缺，用集体的资金维持那些无力自行解决资金问题或靠一般私人贷款无法发展的企业事业单位。无论是投放资本，还是降低国家的服务费用，或是取消税收或是在不收购产品时奖励出口，实际上都是一样。归根结蒂，国家使用的是社会的款项。整个社会在未经咨询的情况下，却在帮助解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因此，经济的社会性规模庞大。名次排在最后、经济条件最差的纳税人，居然在用自己的钱，资助那些利润直接归其雇主的垄断企业。

这种作用使得作为垄断资本的工具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一种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

尽管当政的人还在谈论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然而在资本主义其他阶段确曾存在过的那种自由竞争，现在由于技术的惊人发展而被扼杀了，已经完全消失了。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在我们西方世界结束自由竞争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垄断集团的国家却凌驾于各个阶级和各种意识形态之上，力图承担起一种社会职能，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必要的。

法国政府用数十亿法郎补偿在1976年严重干旱中受到损失的种植者和畜牧者，这一决定提供了一个经济不断社会化的明显的例子。在从前自由竞争的时期，这些社会阶层都须自己设法对付自然灾害，在好年成中以丰补歉。这种办法无疑使力量最弱的种植者和畜牧者破产；但是按照那种办法的逻辑，也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财产集中。法国那种整个社会支援依靠土地进行生产的人的方针，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倒是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农业恶化并不是用大工业企业、银行和保险公司所得的超额收入，却通过税收用减少生产者工资薪津的办法来进行补偿。与此同时，在促进大企业自己解决资金问题和发展经济的借口下，减轻了大企业的税款负担。此外，补偿金也是任意分配的，优惠力量雄厚的种植者和畜牧者，这也必然促进资本主义的财产集中。

在最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甚至直接接管无能为私人资本提供充分利润的企业事业。西班牙就是这样，国家通过全国工业协会和其他官方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钢铁业、造船业、铁路等等。

据某些专业杂志报道，全国工业协会最近正在收购疑虑政局变化影响其经营前途因而撤离我国的几家大规模多国公司的产业。

今天的国家不仅拥有为其服务的军队、警察、法官、收税人以及传统的官僚，而且还有数十万教师、行政人员、技术人员、新闻工作者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它仍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为之确定其性质的那种阶级统治的工具。但是，今天国家的结构比这三位马克思主义导师所了解的复杂得多，差异得多。国家同社会的关系又有了某些不同的特点。

首先表现为这种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就是被称之为“新资本

主义”的制度，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几个“肥牛”年头里曾引起过无奇不有的改良主义幻想。

恰恰是在那个时期，由于消费的发展，汽车、家用电器、服务业的发达，加上充分就业，就出现了关于阶级区别和阶级斗争“消失”了的各种理论。

法国的乔治·布尔多教授概括了其中某些理论，谈到了一种“有效能的国家”，一种“有关的原理符合各种社会机构的内在逻辑因而不能予以怀疑”的社会，这种社会“能使原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不起作用，也能解决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对抗”，“政治会失去试图改变社会的资格，其唯一的任务在于按照社会的根本性质管理社会”。

根据布尔多教授的概括，这种国家的根本性质就是“技术打进了国家”，就是“技术专制主义”，它将决定国家的目标，并把各种问题排除出政治和社会斗争的领域，仅仅置于技术发展所需的没有阶级性的、有效能的无菌地带。

这些观点是对现实的歪曲和混淆。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对政治社会制度造成巨大的冲击。这种发展在管理国家的形式上提出了新的要求。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的水平看，社会上的政治确实应该集中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管理职能方面。但是他们两人不仅把这种成就同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同培育出一种没有被剥削阶级也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目前不可能考虑“技术说了算”——也不可能考虑随着技术的发展在社会关系中出现新的人道主义面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正是因为上述各阶级仍继续并存，统治阶级企图利用技术保持其统治地位和特权之故。其实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实际结果是：现代社会已经成熟到了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了。

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集团玩弄过布尔多教授概括的那些转移注

意力的理论，用技术这个新的神取代今日已被弃置的神授的政权，把新的神说成兼有有理智的和无理智的各种优点，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在“肥牛”时期转变为“瘦牛”时期的过程中，所有这些理论都发生了危机。原来似乎合理的东西不合理了。政治和社会矛盾再次显示了作用，压倒了技术的“说了算”。人们清楚地看到，这种比霍布斯的描述更加凶恶的新的极权政权，就是今天极其经不起任何矛盾冲击的社会种种矛盾的结症所在，因而也暴露了这种政权的面目，它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当然对其力量也不能低估。

法国 1968 年 5—6 月的运动，尽管带有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表现，而且搞得虎头蛇尾，但却并非无助于去暴露那种表面上万能而又有着种种弱点的国家。这次运动可能是反对这种国家并带动其他动乱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动乱。

水门事件的决定性的因素尚不清楚，某些思想工具在这一丑闻中同实行强制的机构发生了公开冲突，并取得了胜利（虽然是有限度的）。这种冲突典型地反映了目前垄断资本的国家制度的各种矛盾。

极少数私人集团控制的技术发展，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达到了顶点；但同时也使这种国家的危机接近于冰点。

过去，自由资产阶级的国家给人以国家充当仲裁人的假象，在斗争着的阶级之间进行调停，当它对工人的抗议进行干预时，就使用暴力和有阶级倾向的法律，这样不仅维护了享有特权的资本家集团，而且维护了社会上所有的其他阶级和阶层，也维护了只有少数有觉悟的无产者加以反对的某些原则。

社会与现有国家的冲突

然而国家今天越来越明显地充当着所有方面的管理者，尤其

是经济方面的管理者。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已经不再为整个资产阶级服务而在为控制着大垄断集团的部分资产阶级（他们经济上基础雄厚，但人数极少）服务了。这样的国家不仅同先进的无产阶级对抗，而且还同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社会阶级阶层直接对抗，同社会上大部分人发生了直接冲突。

正因如此，近年来我们耳闻目睹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以种植主和畜牧主、商人、专业人员为主的直接反对国家机器的种种社会斗争。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过去是不熟悉的。我们也看到出现了种种企业家的组织形式，他们以种种名义（往往更多地在此社会的意义上而不是年龄的意义上使用年轻的这个形容词）体现中等资产阶级甚至某些被称作技术官僚的人们的利益和观点，这种人看到了当前企业机构的社会性，感到这种社会性同企业追求资本主义利润这两者的矛盾，因而是动摇不定的。

因此目前消费者和零售商在反对价格政策方面，种植主、畜牧主同消费者，工人阶级、文化界、农民同某些资产阶级，正在广泛形成一种过去无法形成的社会一致看法。所以产生这些一致的看法，都是为了反对对于上述两方面人进行掠夺和剥削的大垄断中间商或者大垄断企业，归根结蒂也是反对国家权力，因为它确定和实施的经济管理制度是使少数人享有特权，让其他人受到损失。垄断集团同社会的矛盾集中体现为社会同国家权力的矛盾。因此作为管理者的国家即有效能的国家，一直想取消政治的和社会的斗争，实行技术说了算，其重要性和规模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决定意义。新资本主义的理论枉费了心机，国家正越来越不成其为所有人的国家；国家越来越成为少数几个人的国家。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正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貌似不可变更也不会受到任何革命威胁的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目前实际上面临着危机。这种危机不会因其症状异于不发达国家社会革命的症状，遂不成

其为面临革命前途的深刻危机。

有一件事物很新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用静止的理论主张来回避它，必须运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加以对待。这就是鉴于国家机器目前具有的规模[·]和特点，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可能而且也应该越来越具体地表现为国家机器内部的[·]危机。国家机器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受损害的阶级，实际处境也类似这些阶级。在形成一支广大的群众力量之时，这些人不会象军队警察那样关闭在铁蒺藜围墙中的军营里同整个社会隔绝。正在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政治思想潮流还有打进国家机器，从中夺取重要地盘的种种新的可能。

当发生1968年5—6月运动那种以自发因素为特点的运动时，整个社会并未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实际情况。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这种认识在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法国、日本、西班牙，甚至在英国这样昔日曾是庞大帝国的宗主国里，这种认识也在较缓慢地提高。危机本身以及先锋队力量有觉悟的行动，无疑会普遍提高人们的认识，并且更加明确地提出社会的大多数同目前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

二 国家意识形态工具*

意识形态工具的危机 教会

目前垄断资本的国家机构正处于深刻的破坏之中。这首先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语言中叫做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东西发生了危机。最好不要忘记意识形态工具的基本作用。当它发生危机之时，这个危机也会影响到国家强制机器，因为国家强制机器必须无条件服从并忠实执行来自政权机构的意图的理由被打破了。

在过去的一些革命中，革新力量的战略是连同镇压机器一古脑儿地加以谴责，并打碎这些意识形态工具。然而，很多情况表明，意识形态工具的生命力比镇压工具更要强大得多。打碎镇压工具比较容易，而意识形态工具则继续存在，革命不得不适应它，同它妥协，尽管这种妥协有时很难，但不得不这样做。

今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的战略，必须设法使这些意识形态工具反过来起作用，改造它，利用它（如果不是全部，则是部分地）来反对垄断资本的国家权力。现代的经验表明，这是可能的。这也是通过民主道路改造国家机器的关键所在——除非发生战争或经济、政治灾难，而今天在发达的国家里，这是很难想象的。

这并不是同实际情况毫无联系的抽象概念。只要睁开眼睛看看眼前开始发生的现象，积极参加进去，设想设想今后可能的发展

* 我在这一章笼统地使用了“国家意识形态工具”或“社会意识形态工具”这两个概念，因为实际上，其中有些机构，对国家来说还保持着某种独立性，尽管由于国家日益融化了它的职能，这种独立性越来越小。

前途，就足以使你信服了。

教会这个最古老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意识形态工具，今天正开始处于危机。这次危机可能比导致产生路德派新教的危机更为深刻。那次危机同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产阶级的产生相联系；今天的危机则同资产阶级社会的衰落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相联系。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文化，破除了一系列建立在人民的幼稚和落后基础上的教理和信条。列宁约在六十年前就是这样讲的：“……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大多数被剥削者是一群没有理性、没有文化、愚昧无知、有恐惧心理和一盘散沙的人。”^①要是今天，列宁是不会用这些话来谈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被剥削群众的。

新一代的先进的神学家懂得所谓“烧炭党人的信仰”这类非常简单的俗套话纯属无稽之谈，沿着泰拉尔·戴夏尔丹开辟的道路，开始进行了一项旨在填补官方罗马天主教同科学之间原有鸿沟的影响深远的工作。亚当和夏娃、六天内创造了世界、天堂和地狱等神话以及其他种种神话，已逐步为更符合当今时代的文明基督教所代替。正统派天主教的日益退却和孤立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梵蒂冈第二次主教大会以后更是如此，尽管其残余力量在官方教会，尤其是在罗马还很有影响。这种被称作更新的人所共知的现象，在基督教家庭中引起了一种可以毫不夸张地看作是某种真正的文化革命。

如今，社会主义已开始成为现实，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涉及社会上最广泛的阶层。在这样的时代里，基督教向科学开放，这势必一定在社会领域内造成影响，从而又为革新的社会潮流，为社会主义开放。

^① 这段语录没有找到出处，系自译。——译者

在我国，这种变化是可以看到的，在教士和基督教基层组织的成员中更为明显，在教会上层的少数人中也能感到。《可能》杂志反映了西班牙主教会议在1976年2月23日至28日召开的第二十四届全体大会上对主教们进行的一次保密测验，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资本主义。杂志是这样概括所作的回答的：

关于资本主义。教会的首领们关于这个问题是在破釜沉舟：资本主义就是对根本价值观念的否定，对它不能抱什么希望，因为它抵制改革。我们选出一些最重要的回答如下：

资本主义制度同基督教人生观相矛盾的方面。所有的回答一致承认问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唯物主义，人从属于经济，自由受到操纵，弱者无能为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都是同基督教人生观相矛盾的。有些人还补充提出了另一些方面，如：追求发财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的根源和动机；资本攫取了不仅是资本的而且还是劳动的大部分果实；人们不可避免地处在于相互竞争、斗争和对抗的地位；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造成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社会上的不平等；对公共财富产生私心；把私有财产权加以绝对化，等等。

有些人指出，问到的四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有的；但情况有些差别。有一个回答认为，这些缺点不是结构本身造成的，而是使用这种结构的方法造成的。

能否通过改革克服这些资本主义弊病？有些回答断然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深处隐藏着一种唯物主义哲学的问题，因为它“根本上是剥削人的”。因此，“看来决不能克服其根本的弊病，因为这些弊病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和收益分配关系的处理方式……所造成的”。

另一回答说，这是可以克服的；但又说是很困难的。他们指出资本主义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资本主义在劳动阶级的压力下已

有所温和，有所不同了。但是，应该承认，虽然资本主义用新的形式进行剥削，其固有的某些弊病总是存在的。

还有一些人承认，教会的社会理论迄今一直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因为它包涵私有财权的观念，它谴责各种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不做批评，还把神学说成是神化私有制和神化服从权力的东西。“最糟糕的无疑是，在不少人看来，教会使人们认为，在教会大家庭里只能容纳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风格和形式的基督教徒——不管他们是工人还是企业主。”

关于教会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大家都承认，教会部分地和间接地在经济和社会利益方面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教会完全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脱离和它的联系。教会有时求助于富人的经济帮助；在各种基金组织里拥有股票；有时显得阔气，等等。

关于教会的沉默。多数回答承认，教会过于沉默了，没有足够的传教师，在教义问答和传教活动方面宣传很少，勇敢地提出预见性的看法也很少。

当然，从分析这些回答中不能得出主教们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结论。我们这里讲的是教会这种意识形态工具发生了危机，并不是讲什么已经走向其反面的某种意识形态工具。根据上述同一个材料，几乎所有的主教们都认为，选择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可推测为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是正当的，有些人还认为是非常适宜的，尽管几乎一致回答说，这种选择在工人中“没有任何市场”，因为“他们不把这种选择看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有效出路”。“这种选择最多只是资本主义的变种。”

第三个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回答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少数回答有些区别。有些人看到了这一些和那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观点的区别，承认有些马克思主义政党“真诚地尊重民主程序，尊重人，尊重批评社会主义

制度本身的权利，鄙弃暴力的方法，等等”。

总之，除一个回答外，其他的回答都认为，一个基督教徒“可以接受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内容”。而所有的回答都承认，“在社会或政治性质的某些具体问题上，基督教徒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合作是合法的”。

接触到这个材料的人们，正确地指出其中的矛盾是有理由的，他们认为主教们好象在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一条其实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

但是，看来最清楚的问题是，上层教会集团已经开始怀疑资本主义能否生存下去，即使尚未得出承认社会主义进而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但是他们在涉及这个问题，并未受到要被开除教籍的谴责，而这种谴责在不久前是习以为常的。

从教会上层往下看，越是下层观点就越开放。现在的“基督教徒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共产党和其他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都有信奉基督教的成员，这就是证明。

大家知道，最近几年许多神学院的学生，有时在教师的帮助下，在研究神学的同时，还曾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教堂和修道院成了召开工人大会的避风港。

象耶稣会会员领导的德乌斯托大学这样的学府，几代人以来都是培养忠于统治制度的干部的苗圃，而今天至少部分地不是这样了。

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的教会的危机，不仅在西班牙而且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和另外一些国家已成为一种现实，尽管这种危机的程度在各地不尽相同。

就在意大利，一部分天主教徒在最近的立法选举中，全然不顾梵蒂冈的各种禁令，同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选举。可以肯定，敢于

不听梵蒂冈指令的还是少数人，但这件事以及 1975 年轰动一时的公民投票中投票赞成离婚法的事实，也都表明了这一危机。

如果说教会在传统上是统治阶级的基本意识形态工具，并且在西班牙 1936 年至 1939 年为佛朗哥暴乱提供了根本思想基础，那末今天在教会内部发展着的危机，不仅在最广泛的人民阶层中，而且在历来把保卫国家和保卫宗教等量齐观的国家强制机器的成员中，可能造成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这种后果已部分地出现了。

需要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的教会的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基督教信仰的危机。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引起宗教信仰的某种繁荣。许多基督教徒由于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说，基督教徒参加了党，党就得到了扩大，但是我想也许可以补充说，我们基督教徒党员的宗教信仰也因此得到了加强。从事涉及物质生活，涉及社会改造，涉及我们事业改造人、博爱、平等性质的各项任务，能在参加党的基督教徒身上恢复最早期的基督教徒那种造福于人、真诚、乐于献身的精神。

我们深深地尊重这种情感。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宗教具有毒害人的性质。而对受到这种感情鼓舞的人来说，它正在使宗教脱离这种性质，并且使之成为争取人类解放的一种鼓舞力。

这种危及教会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程度）正在破坏教会在阶级社会中所起的主要思想工具的职能，并把部分职能变为社会改造的因素。这种危机难道是一种必将消失、必将倒退的偶然事件，是某种发作一阵子的麻疹吗？能否在这种危机的基础上制定一种为改造社会而恢复宗教感情的新的革命战略呢？

可以肯定，这种危机虽然不会直线上升地发展，虽然还会有波折，但它是不可逆转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除非发生使科学和人类

进步急剧倒退到过去时代的巨大灾难。

这种过程能否持续下去，不单取决于基督教徒以及社会现象对教会内部冲突自发产生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革命力量是否理解这种现象并对此采取什么行动。

要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促使基督教徒参加革命力量，单纯重复适用于过去的理论公式是不行的，反教会的老一套宣传更是不行的。须知生产资料的发展，社会的各种变化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已深刻地改变了种种物质结构和意识形态这个上层建筑。这些变化正在解放，并且可以（如果先锋队意识到这一点并因此采取行动）进一步解放强大的革命力量，而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世时都是不曾有过的。

如果我们充分衡量一下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工具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那就可以得出这种结论：让它反过来起作用，则不仅不妨碍而且有利于目前进程的发展，这是当代任何革命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

意识形态工具的危机

教育 家庭

如果教会危机是显而易见的话，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意识形态工具的学校和教育制度的危机也并不逊色。

毫无疑问，产生这种危机的原因是：教育事业被当作脱离人民的少数贵族的特权；在技术发展的迫切要求下，教育事业大众化了；生产资料的飞速发展，客观上——甚至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趋于消失，尽管垄断集团的政策是尽力保持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差别，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总是处于相对的愚昧无知和被排斥的状况。

如果一个人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大学、学校及其教学

方法、教员和学生状况，又看看今天的学校和经常到学校从事种种活动的人，就能看出情况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1968年5—6月间发生的某些最说明问题的游行（我们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纵然还模糊不清，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恰恰是在大学和学校里开始起来的。这些游行是学校危机的爆发。在佛朗哥主义及其继承者控制下的西班牙，这一危机一直是十分激烈的。

在目前资本主义社会里，文化界的地位本质上同工人阶级的地位相仿，而文化界大部分力量获得这种认识上的飞跃，可以说就是发生在当时的大学和学校里。

今天，大学和学校不仅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而且往往成为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场所。事实上，整个教育制度处于危机之中。欧洲这样和那样一些国家接连进行了改革，但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

在不发生核灾难的情况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总是不会停顿的。这也就是生产资料的发展。过去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个顶点，就会变成阻碍其发展的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实践证明，人类进步的规律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道路冲破社会制度的束缚。资本主义本身为了维护和延长自己的制度，需要发展生产力，虽然这种发展是畸形的，是受到利润规律支配的，并且会引起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普及教育是不可能的。数以百万计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就使高等教育失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贵族堡垒的特色，这就在客观上为革新运动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方面的贡献，开阔了它的视野，也扩大了它的范围。另一方面，数十万、数百万的青年进入大学——尽管其中工人出身的人只占少数——，使得多数人属于中等和下等的社会阶级，使极多的学生不得不半工（常常是体力劳动）半读，使大学成为反映社会冲突的一面镜子，成为在经

常辩论各种实际生活问题的环境中学习文化科学的中心。学生离开了学校，必然会碰到上述各种实际问题，必然要进入劳工市场，经受失业。至于在从前，学生一进入中等学校，就能在国家机构、私人企业或资产阶级政界获得高而可靠的社会地位。

今天，大学无疑应该在革命政治力量的活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不仅因为大学高度集中了可以随时投入行动的青年群众，而且也因为大学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培养着干部；在大学的各年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进步思想，是确保反过来利用（至少部分地）这些工具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资本主义象有求于工人阶级一样有求于大学。然而大学象工人阶级一样无求于资本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彻底实现使教育民主化，提高科学水平，提高教育的批评性和多样化的特点，使教育广泛地向广大青年群众开门等种种深刻的改革。

在各种意识形态工具中，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正处在深刻变化的阶段。这种变化最初并非任何代表人们意愿的思想造成的，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那种日益严重的非人生活引起的，并使传统的家庭观念发生危机。一旦人们了解了真相，那一整套世代相传的条条框框就逐步崩溃了。妇女在经济上独立于男人，在取得妇女解放方面有了一些进步——仍是多么不够呀！得到了一些权利——尽管常常是纯形式的权利——如离婚、使用避孕工具、流产；父子之间半宗法式的关系变成了更加不受约束的关系，子女的思想和行动可以更加独立更加自由——大家回忆一下那种形象地叫做“青年造反”的情景吧；道德危机如此直接地危及了家庭，其实质是由于原有的道德观念的条条框框失去了作用，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情况表明，家庭作为人类的基本单位，不是趋于消失，而是处在发生变化的过程。

这是不是说家庭已变化到了要同社会制度发生破裂的程度

呢？显然不是。但是由于打破了一系列历来不得冒犯的禁令，象在西班牙这样古老传统仍然很有影响的国家里，那些“赢得战争的人”的子女们居然在政治上反抗他们的父辈，谴责他们的观点，甚至还有不少使父辈的态度发生某些转变的情况。子女已不再象往常那样驯服地顺从家庭的思想传统了，他们正在同这些传统决裂，甚至还在对他们的父辈施加影响。

如果说在西班牙这种情况在政治上是很明显的，那末在社会上也有所表现——不只是我国有这种情况。从前，许多中产阶层的子女差不多在婴儿时就被注定了以后的社会命运，要他们进入同样的或类似的社会阶层，总之是离不开原有的社会地位。现在，子女们有了更加独立地选择自己前途的可能和趋向。

这种现象的影响还是相对的。但是，家庭已逐渐不再是几乎自动再产生原有社会关系的基本单位了。

我们谈论资本主义西方道德危机不是徒劳的。这种危机同经济结构和宗教、学校等意识形态工具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同这些变化在家庭组织中的影响，都是有关联的。

意识形态工具的危机

司法 政治

至于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甚至也是强制工具的司法制度，其危机确实只是开始露头。

只要政权不发生变化，法律将继续确保和维护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但是今天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样一些国家的司法界内，尽管为了确保对现制度的忠诚而采取了制约招收人员的种种审查，但部分人（尚属少数）的见解已有所表达，他们严肃地考虑着司法权独立的主张。这种主张在实践中产生了司法部门与这种现存的国家政权的矛盾。他们主张对司法程序和法律实行根本性的

改革，以便朝着更大的民主取得一个新的历史性的进步。在不发生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可以设想，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新大学生参加司法专业工作，这种现象必将进一步发展，对传统的资产阶级司法的谴责也必将广泛得多。要知道，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个部门，它是最保守的势力留作专用的神庙——其程度不亚于甚至超过于军队和治安部队。

谈论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政治制度，主要不是研究某种政权的宪法特点(尽管这些特点不是不重要)，而是要探讨在政权赖以生存并得到保护的各政党、工会、社会运动等周围组织起来的那些社会政治力量的结合。

不必追溯到更远，让我们来看一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目前这一阶段欧洲的情况吧。在本大陆，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维持的是这样一种结合，大体上说来右翼由如法国的“戴高乐派”、德国基督教民主党和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以及其他更为传统的政党象英国保守党和斯堪的纳维亚各种右翼政党，乃至社会民主党；左翼由各社会主义政党，连同某些带自由色彩甚至中间色彩的党派这两者之间的结合。在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土耳其长期存在的独裁政权当然不在此列。这种平衡状态包括了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工会和群众运动，资本主义在大发展时期就因依靠这种平衡而未发生什么重大困难，即便这些集团交替执政也未曾影响社会制度的稳定性。

在没有受到经济危机严重影响的一些欧洲中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看来这种制度还是牢固的。但是，即使在那些国家，这种政治制度也开始受到侵蚀了。瑞典帕尔梅的失败和社会民主党的倒退，还有联邦德国基督教民主党的分裂，都说明了这种侵蚀。实际上，在这些国家里已经发生了某些向右的倒退——尽管是轻微的。这是否仅仅属于其制度内在平衡中的一次小小的曲折，是否会在社会民主党里存在的内部发展进程中，在加强“左”倾或右倾

上产生反响，还有待于观察。也可能会在瑞典产生这样的影响，而在德国产生那样的影响。

在英国，危机更严重，制度也更不稳定。工党内部要求采取严厉措施对信贷实行国有化的左派倾向正在发展，不久前在布莱克普尔举行的代表大会就是证明。工党首相卡拉汉抨击了这种倾向，他扬言存在着称之为独裁政权的危险。工党左派的发展和卡拉汉的威胁说明，多年来保证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稳定的那种政治制度的健康状况不太妙了。目前，这不意味着这种政治制度已濒于崩溃的局面，但它确实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欧洲政治制度的不稳定性在这个大陆的南部更为严重。葡萄牙和希腊的独裁政权垮台了。在西班牙，我们正在由独裁艰苦地走向民主。

在意大利，“肥牛”时期可行的中左政治制度已经衰竭。左派，尤其是共产党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工会运动的统一获得了巨大的进展。正在确定能够促使左翼执政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新对比。

在法国，第四共和国时期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中间派同社会党人合作，第五共和国时期则是“戴高乐派”、“德斯坦派”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党派的合作。而现在左派的政治团结以及工会的一致行动使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人们进行的种种测验一致认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左翼联盟将会得到多数选票。

可以明显地看到，保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政党、团体的制度的平衡，今天可能先从南欧国家打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转折今天也从这里开始。

西欧历来拥护资本主义的各政党和团体的集团，从充当资本主义世界头子的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了鼓励、支持和指示。美国外

交的反共压力是某些欧洲国家国内政治生活中仍然有反常现象的一个因素，说到底，是对民主的一种威胁。不应忘记，这种压力支持了萨拉查和卡埃塔诺，把希腊的上校们扶上台，支持了佛朗哥，而现在又企图改变西班牙走向民主的进程。

美国所以能够实行这一政策，是因为美国资本通过多国公司的作用，而通常是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美元起主导作用的世界货币体系，使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处于依附状态。

这一压力的作用支撑着以天民党(天主教民主党)为基础的意大利政府，尽管它处于慢性危机，并力图鼓动起一种不让法国左翼获胜的欧洲政策。

今日的西欧，美帝国主义以及各国社会统治集团竭力使人相信这样的思想概念：民主=资本主义，反之，社会主义=苏联统治。

这是一个令人难办的问题。非常广泛地称之为“欧洲共产主义”的倾向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要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到符合当前历史水平的高度。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说明，民主非但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而且要维护和发展民主，就要战胜这种社会制度；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趋于缩小、以至最后取消民主。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民主必须得到新的内容。

另一方面，“欧洲共产主义”还应该表明，西欧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胜利，将丝毫不会增加苏联的国力，也不会是苏联一党制模式的推广；它将是一项独立的经验，是一种更加进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将对今天现存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民主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是一场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政治思想斗争，其结果应该是瓦解今天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关系体系以及

造成一种有利于实行社会变革的新的力量对比。

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共产党要独立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确立一条真正的民主道路，这是至关重要的。

把最广泛的非垄断性的社会阶层的命运同工人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也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已不仅为无产阶级所需要，而且也为绝大多数人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结成联盟，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的思想，从广义上讲，即组成种种反垄断联盟的问题，当前正在取得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几十年来支持了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力量和工会力量体系是无法用暴力改变的。这也是群众从过去直到现在还给予巨大支持的一个思想体系。但是，这一体系现在发生了危机。在法国，社会党大大改变了它的政策，同共产党结成了左翼联盟。我们的邻国法国的垄断资本处境不稳，这不仅是危机造成的，还因为这种变化使法国失去了曾对其平衡起过根本作用的一个棋子。在意大利，社会党人因未及时做出这种改变，失去了一些地盘，损伤很大；而意大利共产党却获得了共产党在西方国家历史上最大的选举成绩。

危机也影响到了天主教势力。

当前条件下，要改变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工具，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政治、社会和文化斗争的方法建立新的力量对比。这种对比要求在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内部促使真诚主张社会主义的立场得到加强，并在天主教运动中促使进步和社会主义的潮流得到加强。同这些力量汇合在一起，各国共产党才能建立起新的政治力量体系；这一政治力量体系使现在仍然支持着垄断资本的群众改变态度，而且这体系本身就将是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基础。

谈到政治、社会和文化斗争，我们首先注意到最广大群众的直

接经验的价值，因为这些经验是他们为争取具体利益、为争取实际参加确保其具体利益的社会决定而进行的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因此，至关重要推动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到垄断资本损害的阶层行动起来，使其配合行动，使其克服目光短浅、本位主义和行会主义，提高群众的认识能力，使之认识到各部分人的斗争都具有全局的性质。要把日益深刻地实行社会民主化的要求同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要求结合起来。这样，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能同争取更多民主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

为了这一前景，工人阶级、文化界的先进力量，以及具体说到我们共产党人，必须习惯于以社会多数的名义讲话，不但口头上要这样，而且要体现出这种内容，也就是说，要考虑、处理社会上所有的问题。这是进而起到领导作用的条件。

在这方面，资产阶级政党常常比我们占优势。资产阶级从其过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时期起，就习惯于作为社会的代表讲话。在它还是一个进步阶级的时期里，它充当这种角色是有道理的。今天就没有这个道理了。今天，它分出了一个寡头集团，这个集团实际上只代表社会上一小撮人的利益，然而却统治着整个国家。但是，寡头集团操纵的政党继续在以整个社会的名义说话，把自己说成是造成人类一切进步的主角。这些人自以为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有时却是不利于这些政党的社会趋势和规律的产物；他们自以为是在推动各种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然而这些进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群众在反对这些政党、反对它们所建立的各种政权的斗争中取得的。因为他们总是在台上执政，尽管总的说来他们起了阻碍作用，然而他们总是狡猾地把成绩记在自己的名下，最落后的人们居然也信以为真。

相反，要求变革和革命的力量，却总是倾向于仅仅以无产者这一个阶级的名义讲话。无产阶级会同文化力量，确实是各种进步力

量的动力,是一切革新行动的顶梁柱。实际上,无产阶级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他们有时并不是谈论这种无产阶级;而是谈论那种作为完全懂得自己历史使命的整体、那种书本上神秘莫测的无产阶级。总之,把它说成了类似上帝的手指那种玄奥而不起作用的东西。但是,要求变革和革命的力量以及我们,都必须学会以社会的大多数、以整个国家的名义讲话,这就意味着把劳动和文化的先进力量的行动,同最广泛社会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自觉地维护这些阶层,要敢于代表全国富于朝气的力量。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在思想和文化领域都应该这样做。还要挤走寡头集团控制的政党,挤走寡头集团在危机时刻抬出来操纵和转移人民要求变革的意志的“神通广大的人物”。

意识形态工具的危机 宣传工具

国家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中,包括着这样一些宣传工具:电视、广播以及影响不如前两项的报刊。这些显然是今天最厉害的思想武器,因为它们深入每一个家庭,有时大胆放肆,有时隐晦曲折;时而公开谈论政治,时而报道每日新闻,乃至介绍商业广告。凡此种种,都起着一种使人们思想混乱、失去理性的作用。总的来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宣传工具是今天最严重地毒害人民的鸦片。但是,在那些民主运动力量强大、在文化领域也具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利用这些工具(虽然只是很小程度上)从事进步活动,有时也是可能的。遗憾的是,西班牙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

显然,政权不改变,要想在利用这些强大的宣传工具方面来一个根本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争取对诸如电视、广播电台这类的宣传工具实行民主管理,使它们能够表达社会各种力量而不仅仅是政府的思想;制定真正保证新闻自由的法律,也就是说,为所有

各大派政治力量都能拥有自己的言论机构提供物质条件(新闻自由远比企业自由重要,虽然两者互不排斥),采取了这些步骤,要求变革的力量就能够从社会上的意识形态工具内部开展斗争。

从这一观点出发,革命和进步力量一定要为在文化领域实行领导而进行活动。为此,首先就要为建立真正的文化自由而斗争。只有在文化自由的条件下,上述各种力量才能夺取领导权。如果科学家、技术人员等从事发明创造的人,以及文学家、艺术家等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没有自由,不管在怎样的制度下,文化都会倒退和萎缩,都会变成保守主义的阵地。繁荣的文化是不允许有禁令的。文化繁荣发达了,革命和进步的思想可以从中立定脚跟,取得领导地位,打入并改造意识形态工具,从而对人类的前进越来越多地施加影响。

控制意识形态工具的斗争

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威及其精神和物质力量是以社会的意识形态工具为基础的。我们现在必须采取的解决办法,本质上就是要争取革命思想在所谓社会意识形态工具中尽量夺取统治地位。无论在教会里,还是在教育界、文化界、政治力量相互关系方面以及新闻界等,都应该这样。

不是要为一个党夺取阵地,而是要为必然越来越赞成民主的全体革命和进步力量夺取阵地。这大大超过了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思想,并肯定了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结成联盟的战略,即形成新的历史集团的思想,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在这些工具中展开斗争,使之反过来(至少是部分地)反对其原来的宗旨,这种想法在当前是现实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甚至在列宁的时代,这种想法定会被斥为空想的希望。所以,通过暴力打碎意识形态工具连同整

个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新的国家政权建立的意识形态工具来进行彻底的更替，这在当时是符合情理的。然而以后的实践证明，建立新的强制机构比建立意识形态工具容易。而且也证明在新建立的意识形态工具里，在许多情况下，旧的意识形态也还在继续传播，它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内容（尽管意义上不同）。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把新制度美化得超过了现实，并堵塞了批评的渠道。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空想今天已不是空想了。因为无产阶级诚然还是主要的革命阶级，但已不是唯一的革命阶级，另一些社会阶层客观上正在逐步赞成社会主义的前途，正在造成新的形势。这不是抽象的理论主张，而是近年来实践所不断表明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目前表现在所有领域，不但表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而且确实也表现在文化和道德方面，也就是说，表现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危机一方面是各种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促进和加快这些变化的一种因素。

人们时常把阿尔杜赛说成是他写出的理论著作的严峻狂热的保卫者，连他也在自己文章《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工具》中写道：

“执政的阶级（或阶级联盟）不象在国家（镇压）机器中那样，能轻易地在国家意识形态工具中制定法律，这不仅因为旧的统治阶级可能在那么长时间内保持强大阵地，也因为存在着被剥削阶级，它们可以利用矛盾，或通过斗争夺取战斗阵地，在那里找到发表意见的手段和机会。”

阿尔杜赛还在一处脚注中补充说：

“阶级斗争大大超出这些形式——（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正因为超出了这些形式，被剥削阶级也可以在国家意识形态工具中进行斗争，从而反过来使意识形态武器反对当政的阶级。”

总之，当前社会主义力量为夺取国家政权的巨大历史任务之

一，就是要勇敢、坚决而机智地进行斗争，使得意识形态的武器和意识形态工具反过来反对当政的阶级。

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着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提出采用上述办法了，因为近几十年来，经济生产方面发生了种种“物质的动乱”，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方面出现了确实了不起的变化，这一切使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成熟了。如果列宁在1917年已经说，发展为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夜，那么在七十年代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

在目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胎儿更加成熟，它为力争出世降临人间在躁动着。

改良主义者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的结构改革和社会政治措施统统称之为社会主义。很清楚，这是伪造的社会主义概念，因为资本主义仍然存在。

但是，我们这些一门心思要夺取政权、取得质变的共产党人，有时忽视了现制度的逐步变化，而这些变化客观上却正在开始打破现制度的机能。

对于这些“物质的动乱”，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

1. 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随着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教育接近于生产了；人们掌握了核能，发现了其他新的能源，能源得到了发展；技术也有了发展。

这是当代各种改革的基本因素，这也进一步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无疑，这一发展不断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阻碍。如果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实现，那么现有生产力就能在和平的宗旨下充分地发挥作用，它能在全世界消除饥饿和贫困，帮助不发达国家迅速克服历史遗留下来的落后状态。

其实，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惊人的军事开支，本身就是上述进步的一个障碍，也是财富的浪费。这种浪费也许能在不小的程度上消除经济危机的破坏作用，有助于改变经济危机周期，尤其是减弱危机强度，以致现制度的危机居然冲破了所有的约束，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2. 私人企业制度即使采用多国经营这种新的规模，也无力管理和利用生产力的这种洪流。今天多国企业靠了所在国政府从国家财产和积蓄中抽出的贷款和各种补助才得以维持。因此，这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国家和社会在建立和维持这些企业方面的根本作用。然而这些企业还是私人所有，这是完全违反逻辑的。由此可见，实行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已经成熟。

实行一种遵循世界计划的经济，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葛兰西提出了一种纯属预言的看法：

“在形成实行遵循世界计划的经济的条件之前，必须经过一系列的阶段，地区性的（几个国家）配合协作在这些阶段里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在现阶段，生产力的国际化，迫使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象共同市场那样的地区化的作法，也就是超越了一国范围的社会形式。如果说这种形式经常受到威胁，这首先是（生产的）社会性同占有利润的私有性有矛盾才造成的。要有一个人民的欧洲，社会主义的欧洲，这种希望是合理的。只有在这种社会形式下，欧洲才能全面地显示出它的真相。总之，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生产力来说已是太小了。

3. 国家力图解决集体的问题而承担了某些社会职能，比如开办了一些服务事业、企业、社会保险、卫生和教育事业；采取了资助受到损害的社会阶层的措施——前面已经举出了法国农民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共同市场对农产品价格的补贴。所有这些措施都

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不平衡的出现，避免由于不重视而可能引起严重社会冲突而被迫采取的；还可以用这些措施在“神通广大的国家”的表象下保持垄断寡头的统治地位，但是这些措施却同时在加重国家和社会的矛盾。

无疑，危机如果恶化，国家可能为了保护寡头集团的利润而取消许多“神通广大的”做法。然而，除非采取公开独裁的办法，取消民主权利，否则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独裁的倾向可能会发展，当然要人民容忍这种倾向也绝非容易。

4. 少数寡头同整个社会之间的差别在扩大。自由职业者在无产阶级化（这是“消费社会”中的一个标准说法，也许概念不清），他们的收入往往比雇佣工人多，但其社会地位同他们一样；在农村，正在采取种种抵制资本主义财富集中的合作化方式；少数寡头势力同中小企业的势力的差别越来越大。

就是说，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的力量对比的条件正在发展；在不使用专政方式的情况下，而是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并巩固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正在形成。

5. 新老殖民主义攫取了剩余价值，使得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得以把广大的社会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甚至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如此。而以前的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更加独立了；它们通过石油和其他原料的提价，可以减少甚至取消剩余价值。这种更大的独立性对当前危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尽管形势紧张，仍在客观上起着有利于国际关系更加民主化的作用。

正象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在封建制度中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已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达到成熟了。

我们今天要担当起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掉转过来反对现有阶级社会的任务，其物质基础就在这里。

三 国家强制工具

**如果失去对意识形态工具的领导权,任何阶级
都不能长久保持国家政权**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里,不仅只有意识形态工具,还有强制工具即暴力工具。但是,我认为阿尔杜赛在前述同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他说:

“据我们所知,任何阶级如果不能对国家意识形态工具行使领导权,就不能长久地维持国家政权。”

为了正确回答今天如何解决国家政权问题,需要提一个问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用暴力行动打碎国家强制工具作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这样的提法现实吗?

旧俄国在军事上遭到惨重失败,整个国家机器瘫痪失灵,军队渴望和平、面包和土地,对遭到惨败而感到沮丧,因此其大部分都站到了革命力量一边,在如此情况之下,这个问题是可以提出的。况且这个国家,政府又极端腐败无能,曾被日本海军打败。

拉狄克在他的《社会主义从科学到行动的演变》一文中写道: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当时叫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宣传、所取得的经验、无产阶级从上世纪末以来天天遭受资本家的打击,所有这些都不足以使无产阶级不断高涨的斗争情绪超过群众对资本的羞答答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已久的世界大战这一凶恶的野兽终于到来了,并开始用大炮向无产阶级宣传那些革命的社会主义曾经向他们宣传过而他们并不懂得的学说。”

“俄国革命是无产阶级对世界战争的第一次回答。”

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也是相互关联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也同样是一个同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密切相关的事件。

后来，又有一些国家的革命，也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事实；但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的影响之下，通过反对外国侵略者或殖民主义列强的民族战争形式所取得的。唯一例外的可能是古巴，这是历史上至今在美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都未能重演的一次真正的意外事件，可能是证明这个规律的一个例外。尽管如此，不应该忘记，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在美帝国主义眼皮底下居然取得了胜利，因为这个运动当时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而是一种民族阵线。后来这个阵线在革命向前发展的时候分裂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这个权力很大的人物及其最亲密的合作者后来决定转向社会主义，而右派却公开地站到美国阵营里去了。

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当作无产阶级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回答，这种设想在今天是不是革命的和现实的呢？我认为，如果说我们现在生活在欧洲本世纪以来为时最长的没有战争的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战争恐怖所致，而不是帝国主义业已失去其掠夺的本性。在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还很遥远的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不断发生着局部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今天如果在欧洲发生战争，将是一场快速的核战争，其结果，将不会剩下什么能够争夺领导权的社会阶级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的头几段里，谈到了人类历史（有记载的）发展到今天一直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说“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①

如果在欧洲发生一场战争，它可能同时就是一场世界战争。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

这场战争的结果,就可能是上述两种情况之一,即阶级斗争和斗争着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因为这场战争实际上将毁灭人类以及人类取得的物质和社会进步。

恩格斯早已指出,进行战争的形式也会影响到阶级斗争的动态,尽管在恩格斯时代人们连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核武器的。

不考虑这个因素而继续用从前(即使是不久前的从前)的思想谈论革命,那就不是革命者。

当然在国际上出现有利情况时,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某个没有自由、统治阶级对人民实行残酷独裁统治的发达国家里,只要人民得到军队中一部分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支持,通过暴力行动而取得革命的胜利。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很迅速地取得胜利,如果这个国家陷入有各个大国参与的长期内战,那末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不能完全排除上述的可能性。但在我们所谈的这类国家中,从具体情况看来,很明显要采取其他的道路通往社会主义。采取的道路必须把群众的民主行动和代议制民主机构的作用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要利用今天基本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那些代议制民主机构,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

怎样通过民主道路改造国家机器?

为了上述目的,问题不只是上台执政,而是——继续是——怎样改造国家机器。

我们前面已经谈了国家意识形态工具,谈了要进行一场全面的斗争,使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反过来起作用,并利用它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现在就要研究一下,这种转变如何能有助于改造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最后手段的强制工具。

社会主义力量在尚未取得政权之时，就在这种社会里起程走路，这是争取实行国家机器民主化的一个有力而机智的行动。这一行动的出发点恰恰是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失去对意识形态工具的领导权。

一旦达到这一目的，那怕是局部的也好，其效果会在强制工具中反映出来。

在这方面，法国的五月事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经验。开始时，治安力量采取了残暴的行动，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力量就拒绝为政府利用去充当镇压人民的工具。许多警察工会纷纷表态抗议政府利用他们，表示了不愿意反对人民的意志。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波动。

上述情况未能进一步发展，其原因可能是在政权问题上当时还没有一种反对现政权的真正出路。当时，左翼不团结，代表左翼的政治力量没有料到危机发展到如此规模，也未能在短暂的政权不稳时期内克服不团结和无准备的状况。我认为这样说是不过分的。

同时，那次危机具有新的特点，因此它不能象其他传统的危机那样通过单纯的街头行动和直接袭击政权的办法去解决。这一危机本来可以用重新选举这样的民主主动行动，用严肃负责的选择（如同今天左翼联盟那样的选择）来完成群众斗争。可是这一危机的新特点却助长了不成熟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团体采取行动，扩大它们过火行动的影响，吓坏了中等阶层和国家机器里的许多人们，削弱了左翼在群众中一度曾是巨大的影响。

这就使得政府经过无能为力的几个星期之后，恢复了在政治上失去的主动权，采取了进行选举的行动，而且从中得到了好处。

当时，左翼为了避免某种反作用，过分突出地显示了它的力量，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缺乏准备和前后不一。“戴高乐派”的政权

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形势，之所以没有走得更远，显然是因为工人阶级作出了对行动负责的榜样。

然而，1968年5月事件有助于为法国左翼未来的胜利准备条件。同时在警察队伍中，也可能在曾经历过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冲击的军队中，出现了一种反映他们对社会问题以及对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所抱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的情绪。

最近，当劳动者起来反对雷蒙·巴尔和德斯坦总统的紧缩计划的时候，巴黎的警察组织了有意义的游行，也参加了行动，并在他们的工会中进行了辩论，再次对他们在社会上的作用提出了怀疑。

在法国军队内部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些现象不仅在士兵中而且在高级将领中都有所表现。在高级将领中表现为军事理论问题上有分歧。这是自然的。这种身分的人发生纠纷，自然会表现在上述问题上。然而，政治社会的矛盾恰恰也是常常在这个问题上反映出来的。

不必夸大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但这些现象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是不可能想象的。在列宁时代，也只是在1917年那样的危机中才能设想，但那时的表现形式还与今不同。

看来，意识形态工具的危机以及在各个领域里开展阶级斗争的影响在意大利的国家强制工具内也开始有所反映。好象已经证实，最近在罗马举行的选举中，比如说治安部门很大一批力量投票支持意大利共产党。在司法机构也出现了有意义的现象，好些司法人员还受到了法西斯恐怖集团的袭击。

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一些军队中，如在荷兰军队内部，士兵和军官参加的工会组织正在活动。军事评论家们说这种情况并未阻碍荷兰军队在共同演习中有效地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可是这样的军队能够被用来搞政变吗？

另一方面，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般来说公职人员组织工会已成为事实。公职人员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公共服务行业的一部分，他们愿意同支付他们工资的国家建立一种越来越象雇员和老板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国家机器中的成员（在当前只是一种倾向）开始认识到政府经常利用他们反对社会利益；开始承认社会和国家政权不是在走同一条路，它们之间有矛盾；开始象反对独断专行的老板那样反对国家政权。这种情况不仅出自其职业或工会的狭隘利益，而且出于一种日益明显和具体的对他们同实际社会的关系（垄断资本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以歪曲和操纵的关系）的看法所引起的。

这就是说，现有国家这个庞大事业的成员正在开始提高觉悟，同整个社会在一起提高觉悟，认识到国家政权日益脱离现实社会，而公职人员则又是社会的成员。

确实，这一过程才刚刚开始，因而是不成熟的，仍可能被统治阶级扭转方向和操纵利用。改造国家机器，使之成为能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机器，其原则就是实行国家机器民主化，能否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来加以实现，这并不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摆了出来的问题。

为国家机器的民主化而斗争

然而，要走这条道路，共产党和一切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以及所有要求改造社会的力量，就必须对国家强制的或非强制的工具及其成员，采取一种不同于历来采取的态度。

阶级斗争的实践，引起了劳动者同国家机器的成员的冲突。发生了游行或罢工，走上街头同罢工者和游行者直接冲突的不是西班牙的巴内斯托贷款银行和比斯开钢铁公司的老板，也不是法

国的巴黎银行和达索航空公司的领导人（在其他国家依此类推），而是治安力量，即警察，甚至在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军队。

这就是垄断资本的国家政权使武装力量所起的作用，对此则必须加以谴责。

为了保护社会免遭扰乱社会分子的破坏，为了维持交通，保护居民，治安力量和警察力量是应该存在的。人民的游行示威和罢工，如果政府不派警察去镇压，是不会成为影响公共秩序的冲突的。罢工，应该通过工厂主和工人双方代表的谈判来解决。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应该保证游行示威的秩序。

如果警察只是专门监视小偷和杀人犯，破获偷盗和犯罪案件，如果警察被利用来监视和逮捕那些贩卖毒品的扰乱社会分子，如果保护居民免遭现在日益增加的暴徒的袭击，如果对各公路进行监督，制止违犯交通法的事件，从而更有效地防止每周末造成伤亡数百人的无数事故，如果警察能够更紧密地接触居民及其遇到的问题，那末，现代社会就会安全得多。

但是，社会上有什么必要使几千名警察身穿军装，并派他们使用现代化的镇压手段来对付人民的罢工或游行示威呢？执政者要习惯于看到争取权益的游行；要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群众指派的代表，同他们讨论问题；要习惯于同人民对话，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补充他们所作的决定。执政者不要凌驾于社会之上！

老板们要直接同工人谈判，要放下架子，不要以为依仗国家暴力就可以自己说了算！企业主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不能满足工人的要求，就应通过谈判向工人说明，使他们随时都能清楚地了解每个企业的财务情况，这也是杜绝财务舞弊的一个决定性办法。对整个社会来说，维持和出动为老板服务的特种镇压部队，较之满足工人非常合理的要求，往往要用更大的化费。

也就是说，要从维护全体人民而不是维护少数特权者利益的

思想出发，运用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努力确立一种新的、更加文明的治安概念，一种新的、更加民主的治安概念，并努力把这种概念装进治安力量全体人员的脑中。大部分治安力量，对执行现制度交给的任务也越来越感到烦恼。他们抱怨公众只看到他们的消极面，没有看到他们的职业所具有的积极面，他们到处感到居民对他们反感和对他们怀有戒心。他们被迫去执行有损于他们人格的任务。被迫去反对也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面斗争的力量。如果生活费用上涨，卫生和教育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社会服务事业不足，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归根结蒂同所有靠工资生活的人一样，都会受到影响。

治安为什么就一定是一保护任意行事的某个政府或某个部长的权威呢？它为什么就一定是一保护某个政府而不是保护社会呢？

治安也并不是要拚命维护某种社会政治秩序、某些具体机构。如果大多数居民不满意这种社会政治秩序，不满意这个或那个机构，并表示反对，那末，维护治安就意味着要保证大多数居民的愿望能够得到实现。

应当根据各种具体情况，考虑拟定一种实行治安力量民主化的政策。其中一个首要条件就是要使治安力量成员能够组织工会，能够维护自身的权利和职业尊严，并同工人组织建立一种不同于警卫人员与嫌疑犯的关系。

打算改造社会的力量，应该经常促进就治安力量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进行公开的辩论；应该关心这部分人的物质、社会和职业上的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变化。但是必须进行这个变化，因为社会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也必须有专长于破获偷窃和犯罪案件，维护居民安全，使之免于受害，维持车辆的交通等本领的公职人员。

这并不妨碍揭露那些专门镇压人民的集团，并不妨碍同他们斗争，要根据情况加以解散或加以改造。但是，如果政策得当，在

治安部门内就会有反对这些常给从事这一行的整体抹黑的同盟者。

在当前社会危机的形势下，政策得当，能有助于从治安部门中争取到一部分重要力量，使之站到民主的一边。

军队无疑是国家最重要的强制工具。多次的经验，其中包括1973年智利经验和其他许多经验，都证明了军队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能变成寡头集团的政党。当普选威胁到寡头集团的特权，寡头集团就会把这一个拥有飞机、坦克、大炮、机关枪和步枪的政党拿出来进行对抗。

在大多数情况下，军队是在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在镇压人民的行动中受到思想教育的。

为了适应其职能，一部分军队干部直到不久前，历来都是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他们历来承袭祖国和社会政治制度就是同一事物的原则。军官们真诚信奉的爱国主义，是反人民的阶级结构在思想上的反映。这种爱国主义同秩序是等同的，不是简单地同公共秩序等同，而是以现有社会秩序的保卫者的身份把爱国主义同社会秩序等同起来的。它的纪律观念是社会上从属关系的反映，是被统治阶级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反映。为祖国效劳的思想本质上就是为某一个政权效劳的思想。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自然而然使军队领导部门的主要骨干反对任何政治和社会变革，因为他们把现有的政治社会秩序就看成了祖国、秩序、纪律、效劳。

这就是左翼力量历来反对军队，人民群众长期不信任军队，以及革命力量把摧毁这种军队写进纲领的原因。

但是，对军队的传统看法，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已经发生了危机。两次世界大战起了促进作用，由于现代战争消耗惊人，不仅是军队而且军队中的指挥职务在两次战争中至少暂时地向出身普

通的人开放。群众斗争也把一种空气(我不知道是不是民主空气,但总不会是带有那么多阶级偏见的空气)吹进了军事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除了俄国外,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没有变。在俄国,沙皇统治崩溃了,与这个政权联结在一起的所有传统观念也破产了,这就决定了很大一部分军队转入了革命阵营。其他国家继续奉行殖民政策,甚至反苏主义,因而维持并丰富了那一整套把武装力量同现有社会秩序联结在一起的思想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更为深刻。东欧的旧军队因战败而崩溃了,一部分军人接受了新思想并参加了新的军事机构,其他军人都失散了。但是,即使在获得胜利的军队中也开始出现危机,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一直发展到今天。

法国军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军队内部就有了深刻的危机。一部分指挥人员从不认真准备对付德国的侵略,马其诺防线被打开了缺口,致使侵略者包围并降伏了法国,这种情况符合部分指挥人员的非职业性的立场,因为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发生了战争,他们对社会政治制度的看法已不是那么容易地能同祖国、纪律、效劳……等同了。当时他们进退两难:让人民阵线的民主取得胜利呢?还是让法西斯主义取得胜利?要同俄国一起捍卫祖国的完整、反对纳粹德国呢?还是保护传统的社会秩序,向德国投降反对俄国呢?法军的部分指挥官在进退维谷的形势下,抛弃了祖国,甚至抛弃了军事机构本身的职责和荣誉。很清楚,另一部分军官选择了祖国。法国1940年丢脸的惨败,其原因是军队发生了政治气节危机,这也是统治阶级发生危机的反映,要不然就无法解释了。

是法国人民和爱国军官重新树立了祖国的观念和反维希政府的国家军队的观念。后来,反轴心国的各帝国主义强国在解放法国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就使得带有阶级性的、殖民主义的旧秩序

在进行修改后又重新建立起来，来自人民阶层的战士和最忠于抵抗运动的军官实际上都被解除了现役。一批曾有爱国表现的军官，恢复了军队原有的统一，并让1940年表现消沉的那批军官复职，从而建立了一支传统的军队。

然而，这并没有解决根本的危机，而这个危机从另一个方面又重新表现了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取得的反法西斯的胜利，开辟了一个非殖民化的不可逆转的时代。可是，在战争中（比如越南战争中）法国军队多年被用来在军事上维护一个受谴责的殖民帝国。战争重担全部落到了职业军人身上，他们亲身体察到他们按照命令进行的活动与法国人民的态度之间有一条鸿沟。他们成了造成一次战争失败的罪人，然而真正的罪过应是统治阶级的殖民主义政策，即在越南人要求自由的坚贞不屈的意志面前，显得非常危险的和行不通的那种政策。

越南战争以后，就发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据夏尔·艾尔努说，一部分军官吸取了远东的经验教训，清楚地认识到这场新的牺牲是毫无意义的。但这一次动用了军队，从而使得很多人在戴高乐将军亲自决定停止这场殖民主义的冒险行动时，认清了当时存在的这种军事政策和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到阿尔及利亚去的法国军人发现了指责他们的恰恰就是那个把他们投入无底深渊的领导阶级。这就为秘密军组织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同时也加深了军队的危机，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军队的作用。那场危机还没有造成更大后果，因为核“打击力量”刺激了军人的兴趣，提供了把祖国、效劳等与现存的制度等同起来的新的理由。

这种新的观点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机构内部又有所发展。但在这些机构的思想中传统的一些力量概念正在消逝，而首先就是关于祖国的概念。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用苏联可能发动进攻来为自己的存在辩解。这一看法曾经一度把祖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系起来。但是，二十多年来，苏联并没有进行侵略，同时事实证明华沙条约组织的方针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在此情况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成了一个官僚军事性的超级机构，而存在的理由则尚需寻找。最后干脆成了一个由美国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欧洲的工具。祖国这个概念这才真正地消逝了。在那些有关国家里，最后竟然谁都不能清楚知道这一组织的军事政策是什么？那些军事机构是干什么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象其他一切军事或文职官僚机构一样，产生着一种自管自、靠寄生来捞一把的倾向。同时也产生着一种成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倾向，各国都不能加以实际控制，五角大楼以及美国那一整套军事工业体系是例外，他们靠设在欧洲的分支机构在施行控制。

核武器至今一直起了阻止战争的作用。但是可以日益清楚地看出，如果象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那末，核冲突就根本不是政治，因为它会导致交战双方的互相毁灭，不可能有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也不可能利用胜利，即不可能有什么可以称为政治的东西。

目前两个集团互相对立，消耗着巨大的财富，谁也不能利用它。用了，就是双方的自杀。因而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这种危机虽然在资本主义西方更为明显，但也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仅是外贸关系受影响，而且巨大的军事开支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消耗了很多生产力，使之不能用来谋取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

现在确实有了战术核武器，其用意是限制破坏，设法使战争成为服务于政治的一种手段。但是，任何有战争经验的军人很清楚地

知道(假如不知道就该责令其退役了)在核导弹威胁下,那怕只是战术核武器,没有任何军队能按照战斗部署前进而不被瓦解并保持阵地的。首先逃离战场的恐怕是将军们。

况且,在欧洲这人口如此众多的大陆,上述战术核武器也会不加区别地消灭作战部队、居民和物质财富。在核战争中没有稳定的后方,即使使用战术核武器也是如此。一位“戴高乐派”的内政部长弗雷在他任职期间,谈到在可能发生核战争时的民防问题,他严肃地指出,他正在登记法国国内所有的山洞,以便用来进行防御。这句话已经说明了一切,尽管弗雷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些很少的幸存者可能会回到穴居时代。

这就是说,这两个超武装集团在消耗了大部分世界财富和越来越贵的石油和原料后,在消耗了经过科学家和劳动者的努力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后,其结果却是要人们回到穴居时代。

夏尔·艾尔努用恐怖性的语言介绍了他参观设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空军战略指挥部所在地的情况:

“洲际弹道导弹操作室,同五角大楼用电视直接联系的各个局,能够向美国设在全世界的军事基地、海上船只、空中的飞机发出警报的随时能通话的‘红色电话机’,用来标出战争爆发时最初几分钟的‘红色钟摆’,那些打开了枪套准备用手枪打死任何一个发了疯的军官的警卫人员……”

执行这种政策,甚至从帝国主义观点和霸权的角度来考虑,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所以很多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严重怀疑美国的“原子保护伞”有什么价值,怀疑这“保护伞”在一旦发生冲突之时能否打开。除这些怀疑外,还必须再补充一个疑问:即使打开了“保护伞”,欧洲在处于绝境的情况下,除了挨更多的核导弹之外,还能赢得什么呢?

据权威的意大利评论家讲,这是不合理的,其后果是人们完全

不了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是什么，至少在意大利以及它关心的一些地方是这样。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组织甚至在审核武器方面，除了普遍采用某些美国武器外，也没有取得什么明显的效果。据贝内代蒂说，意大利军队所拥有的美国坦克，在意大利无法用于铁路运输，而且独自活动的有效行程很有限。

上述情况反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战略观点也出现了危机。厉乌奇将军写道：“……意大利整个国防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没作过严肃的估计……。”

另一位将军帕斯蒂说“不存在什么意大利的军事政策”，“从来没有以我国的情况为依据进行过任何严肃的研究，因此也无法检验我们的军队是否符合意大利国防的切实要求……”，“我们甚至不了解要用那些政治设想来作为我们军队建制的出发点”。

至于法国，其军事政策动摇不定是人所共知的；从殖民战争到“打击力量”；从“全面”防御到统一的军事集中；脱离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又模棱两可地返回到这个组织。这种情况在高级将领中引起的某些纠纷是众所周知的；可以想象在中层军官中，这些问题也许不那末明显，但却深刻得多。

西班牙军队，象整个社会一样也在变化。如果有什么官方的军事政策的话，那末这种政策今天只是起着支持美国军队和反对“国内颠覆”的辅助作用。这一切使人想到迭斯·阿莱格里亚中将和古铁雷斯·梅利亚多中将等首脑人物对于防务问题持有更加开放和更能适应现时的观点，尽管这些观点还不是很为人们所了解。

过去，我国的武装力量被用来充当殖民政策和保护资产阶级、地主秩序的工具。后来又接受了一项国内政治任务：支持佛朗哥政权。政府恢复了帝制，然而在它的统治下，殖民地逐渐地消失了。最后一个殖民地——撒哈拉——的丧失，给职业军人留下了

痛苦的痕迹。现在政府要军队支持君主政体，支持对他们过去支持过的部门进行变革。

应该承认，三十六年来军队在专业和技术问题上被严重地忽视了。只是把它看成是推行国内政策的一种工具，却不注意在各方面予以训练。我不是低估军队成员人的因素的作用，问题是一当发生外来侵略，我们的军队今天能迅速出动，进行有效地反击吗？恐怕到头来充其量只能“为了国旗尊严”而作出无谓的牺牲。很多军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只是在想到西班牙至少在目前确实还没有受到威胁时，才能在忧虑中得到一些宽慰。有些军人对改变这种状况不抱多大希望，甚至可能寻求机会另谋出路，宁可违心地放弃军职。

另一些人，出于坚定的职业感，还在等待；那些职业感消沉的人则是安于现状，这种情绪同军人所称的“内心安慰”远不是一回事。

国际上的社会危机也反映为另一种危机，即比较有修养的、也关心本身职业的军人正在努力确定一种新的形象。在这方面，普鲁登西奥·加西亚少校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很有意义和很说明问题的，这本书所维护的观点是：军队应该准备支持和平与裁军政策，尽管出现这种前途的可能性尚为遥远。

我们左翼力量，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积极考虑军事问题，把它当作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很有决定意义的内容。但是要根据我们当前社会的情况，而不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争以前那些年头的情况，深刻分析这个问题。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仍然是唯一能使我们得出正确结论的方法，但今天重复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过的公式会是很错误的，因为这样做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纯粹的教条公式。

如果不改造国家，就不能改造社会，因而也不能改变国家的基

本工具之一——军队。象我们所做的那样，我们选择了一条民主道路。这既不是为了图方便，也不是为了碰运气，而是出于不可阻挡的历史要求。但是这样做时，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向往社会主义的各种力量所遵循的方针与最能顺应时代要求的军人已开始寻求的新的形象之间能否统一起来。

这里不是要军队充当为另一种政治方向服务的工具，更不是想搞军事阴谋，不是要用兵变、政变、内战来重演我国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历史，而是要在当前这个过渡的时代，求得军队和文明社会的一致，消除寡头 + 军队 = 保守派和反动派这种两位一体的老公式，便于进步力量用民主手段向一种平等和公道的社会前进。

以前，武装革命直接摧毁旧军队，建立一支新型的军队。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这样，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也是这样。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之具体条件下，看来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除非出现预料不到的灾难。要在这些国家提出一个改造社会和国家的现实主张，就必须对武装力量的问题另作考虑。这是必须的，也无法回避的。

要进行严肃的分析，就不能不看到，就是过去用暴力摧毁镇压性的国家机器，那也是在军事机器遭到失败，在社会上以及军事机构里接着也产生危机的时候，革命力量争取了或中立了军事机器中的决定性的力量的结果。

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非战争因素造成的社会危机后，军人的思想能否发生民主的变化呢？如果答复是否定的，那末只好放弃社会主义，永远甘心忍受目前的政治、社会现状，或者就象疯子那样祈求战争爆发。可是，我们已经谈到，在目前武器装备的情况下，爆发战争就等于所有参与争斗的社会阶级的自杀。

总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新力量，除了通过非传统的道路争取或中立军队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之外，别无他

路。

这就要求革新力量对军事机器的看法有一个深刻的改变，对整个问题的看法，针对军人意识的某些特点造成影响，使之在军队内部也能扩大和深化当前社会危机的客观效果。

过去反对军队的做法，单纯的政治宣传，对军队采取否定的态度，显然都不利于工作，使工作无法进行，甚至会帮助当政的寡头集团同军队抱成一团。

拟定新的战略，必须从客观事实出发：只要存在着国家，不管它的社会内容如何，军队无论属何种结构，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放弃过军队。一般来说，国家消亡之后，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结构的社会之后，军队就会消失。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但作为现实主义者，必须承认，这一目标还很遥远。

这就是说，我们认为军队的存在是社会的需要。但是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军队首先必须是保障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工具，而不是确保垄断寡头集团对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进行压迫、保证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现状不可侵犯的一个机构。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应该成为警察的后备力量。军队及其指挥干部应该来自人民阶层。军队不应该是任何政党或社会派别的工具。军队在履行其专门职能——捍卫领土完整——方面，必须服从任何经过普选建立的政府的命令。不管那个政府，更不用说社会上的某个派别，如果企图利用军队来进行其职能以外的活动，应该坚决拒绝服从。

就是说，在向军队所灌输的各种观念中，有一条是必须消除的，这就是盲目服从现行社会制度产生的权力机构，盲目服从上级的命令。在军队里，纪律是不可缺少的，没有纪律就没有军队。但是，即使在军队里，纪律也不能是盲目的和无条件的。军人是人，不是机器人。假如一个士兵，不管他的军级如何，执行了违背人民

的庄严意志或反对人类尊严的命令，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原谅的。

在这方面，反法西斯世界大战传下了一种可以称为以十分明确的道德原则为基础的法律学。那些参与战争罪行的军人，并没有因为执行上级命令而受到了保护，他们由于没有拒绝执行这些命令而被审判和定罪。就是说，他们受到惩罚恰恰是由于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了上级。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军队内部严重的涣散军心的现象在增长，这也是美军失败和撤退的因素之一。因为一而在发生战争罪行，一而却遭到一部分军官和士兵的反对。问题如此之严重，以致最严重的罪行在美国受到起诉，即便事情尚未弄到对罪魁祸首严加惩罚的地步（这些人地位太高了），那也确实使美国军队在印度支那所进行的非正义战争声名狼藉了。

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手头上没有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已作修改的法国军队条例，因此只好靠我的记忆力了。我记得，当看到这个条例时，有些条文给我留下了好的印象。现在无法确切讲出其文字，但这些条文给下层指挥员留下了一个思考和自由行动的余地，以便不去执行某些违反人类尊严和民主法制精神的命令。

除了那个对上级命令盲目服从的观念外，军人意识中的其他观念，如爱国主义、效劳和牺牲的精神，都是极其有用和极其高尚的，任何军队都是绝对需要的。

有必要使军队接近现实社会。在这方面首先要提出军官和高级将领的社会地位问题。具体地说，军官和高级将领的社会威望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比如说，在殖民战争期间产生过一个社会威望的观念，即指挥官一般要从自己担当的任务中获得其社会威望，例如他为了“祖国的利益”——这是别人教给他的，实际上仅是旨在经济上剥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参加了这类战争，准备为此贡献出自己

的生命。这种任务要求指挥官去冒生命危险，因而给了他社会威望，给了他高于其他公民的头衔。军事指挥员正式成了祖国的救世主，当统治阶级认为受到了被压迫阶级的威胁时，这种救世主就容易地从反对殖民地国家来拯救祖国转为反对自己国家来拯救祖国。

统治阶级为了使军队关心他们的目的，把属于军事纪律金字塔尖顶上的一部分的高级军官吸引来参加企业管理委员会，让他们直接参加经营活动。当然高级军官一般都盲目服从上级、接受过一种特定的思想训练，从中得到了阶级观点的灌输。事实上，大多数指挥员的经济情况处于社会中等阶级下层的水平。其社会威望往往很难隐匿破旧的军服和月底经济上拮据的情况。

在已经没有殖民地、军队除反对自己的人民外再无任何理由起拯救者的作用的情况下，这种社会威望的概念能够继续存在下去吗？

今天，军事干部应象技术人员、科学家、知识分子一样，在国内起一种训练人的作用，教会人们保护领土免遭外来入侵。一旦发生战争，军人已不再是唯一的国家救世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文职专业人员也会成为军人，同军队干部及其所属的下级军官、士兵一样，捍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军事干部这种技术员或科学家即知识分子的头衔，不仅取决于他所担负的训练人才的任务，也取决于要掌握日益复杂精密的军事技术。

今天，指挥一个现代化的部队同指挥古罗马军团或传统的殖民军步兵毫无共同之处。勇敢和坚强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如此仍旧无法胜任高级军官，必须具有广泛的知识，必须进行真正的文化培养。立志终身服务于军界的军官必须把自己造就成一名实际上的技术员、工程师、科学家。从更广义上讲，必须具备大学

的水平。

不仅技术方面要这样，在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方面也要这样。因为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社会，人们有了更高的文化素养，对自己的作用和个人自尊有更高的认识，因此指挥的方式方法变化也越来越大。现在军官在兵营里接受的新兵，大部分已不再是文盲、胆小、顺从、只要上级态度严厉甚至粗暴，什么命令都愿服从的人了。他们所接受的人都是有文化的（文化水平有时甚至比他们自己还高）、能考虑问题的、有思索力并能以批判的眼光对待他们的人。如果军官文化程度差，没有能力指挥这种人，那末对军官的服从只能是形式上的，在人们中间无法建立真正的威信，因而不会存在任何真正的纪律。这种情况在作战（军队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作准备的）的时候，以至在进行操练时，就会起很消极的作用。当前，在一年比一年更现代化的社会中，一个军官如欲有效地指挥，首先需要使他的部下了解他是善于指挥的，并且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我再重复一遍，不能靠粗暴待人，而是要靠本事和智慧。

所以，实行民主的军事政策，首先的任务就是改革培养军官的制度。这种改革必须体现为在专门的军事学院和在大学实行一种混合的培养制度。

军事学院应该讲授理论、战略、战术以及军事技术的具体应用，但是士官生还应该在大学里同其他学生一起继续学习理工和人文社会等学科。

已经成为军官和高级军官的军人应该继续进修大学的课程，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水平。

就是说，现代军队的军官应该有文化，他们的社会威望应建立在知识水平基础上，而不应建立在标明与他人不同的武器和军服上。其实，现代军队有文化的军官，现在可同大学生一样在民间生活中担任技术员、工程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这种趋向现在正

越来越明显。

在军事学院和在大学进行有配合的培养，不仅能使军官受到更全面的训练，而且在到军营工作之前就能直接接触和了解以后将要参军的、一旦需要将同他一起用鲜血来捍卫祖国的青年。

这种培养方法也是为了创造一些条件，使军人（如果他们愿意，或是在必要时）到一定年纪，转业后不致降低其状况。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不是所有的军官都能成为将军的。

然而在现代战争中，甚至指挥作战部队的将军们也都必须是年青的。这就是说，必须具备优良的体格，才能充分行使指挥军队和操作十分复杂的作战仪器的职能，一切都要求具备十分灵敏的智力和体力。如果指挥大部队的将军都应如此，那末，领导规模较小的部队的上校、中校、少校更应如此，因为在今天的战争中，这些人几分钟内就能决定一次战斗取得胜利或遭到全歼。

现代军队的作战部队必须由年青的军官和首长指挥。不管对哪种人来说，这当然意味着要降低退役的年龄。因此除最有才干的人可能在高级总部或军事学院任职外，让具有各种智力的年龄不大的军官退出现役，如他无所事事，就等于在社会生活中过早地结束其生命。更全面的培养恰恰是使军人到了年龄就能参加市民生活，继续进行力所能及的工作，无损于其原有地位。

这也符合捍卫祖国不只是职业军人的职责这种现代思想。国防不能只靠少数拯救者的牺牲，国防是所有公民、全国人民的责任。一旦发生战争，职业军官的任务当然是作战。但在作战的情况下，非职业的后备军官和士官、士兵也会象职业军官一样进行战斗。他们不同于职业军官之处在于，职业军官在和平时期的职责是在军事上训练非专业人员，如后备军官、士官和士兵。这种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在大、中、小学讲授文化课程的教师的工作，只是军官工作的社会范围较之他们更为无比广泛。

根据这一现代思想，军人并非某种与社会隔绝、脱离社会并凌驾于其上的集团之成员，而是某种教师队伍的成员，其工作就是对公民进行某种训练，以便必要时能够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

当然，这不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但即使在这些国家里，如果我们使意识形态工具回过头来反对国家的话，这一现代思想就会逐渐为更广大的军人所接受。此外，这一思想还有着客观的物质因素为依托，有一种日益明显的历史趋势为依托。

这些因素、这种趋势，一方面同往往带动技术和军事艺术的生产力发展相联系，而技术和军事艺术日益精密细致，又要求专业人员具有日益高超的水平；另一方面又同当代各国军队的作用正在发生的变化相联系——这种变化有时是不知不觉的。各国的军队是各国政策的工具。在今天的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共存，各殖民帝国已不复存在，国际关系正在民主化，各种问题正在国际化（虽然其进程是缓慢而费劲的），因此在这样一个已非清一色的世界上，各国的政策也在发生深刻的、有时是不知不觉的变化。

所以，今天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有一种可以称作为军事理论的危机——军事理论的含意要比简单的规章制度广泛得多。军队任务的定义在不断修正。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深刻危机所在。过去，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世界均势几乎周期性地发生变化。今天，由于所谓的核威慑，要改变均势是昂贵的，谁要改变它，就要付出代价。

当前的均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由此引起的动荡中产生的。这是一种以美国和苏联两大国的军事霸权为基础的均势。除非发生一次毁灭地球的失去理智的行动，否则这种均势是不能通过直接冲突去改变的。因此就有了共处所取得的不可否定的进展，尽管这种进展是不稳定的。说它不稳定是因为它是靠核武器取得的，而不是由于人们普遍认识到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目前这

种认识正在逐步深入人心)而取得的。

尽管目前的均势并非静止,而是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未遵循传统的方式。因此以两个集团直接发生冲突的想法为基础的军事理论发生了危机,对于双方来说,这种想法正日益显得可悲而不合情理。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已经不再是一种政策了,因为政策总是有一个目标,总是有加以实现的最低限度的可能性和最低限度的合理性。

改变当前的均势,就要削弱两极结构,要建立一种新的多极均势。亚洲和欧洲正在逐渐出现新的力量中心。发展程度不一而且存在矛盾的所谓第三世界,尽管其军事力量还远远跟不上它在经济、政治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成为一个新的中心。

当前世界的问题和矛盾主要出现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很难想象会发生军事冲突,除了在一些落后国家,在那里军事手段不过是一些常规武器——这还是靠外国支援的。不能否认,各国军队的总部都制定了应付可能发生冲突的计划,但纸上的东西还远不是现实。哪一支军队经得起一场那怕是用简单的战术核武器的战斗,而不发生肉体 and 精神的瓦解,以至消逝在自然界呢?哪一支部队能在这种武器面前保持其作战队形呢?哪一个后方能够抗拒这些武器而不遭破坏呢?

最近召开的第二国际领导人会议,提出了一个疑问(戴高乐以及其他一些政治家早就有过,尽管有些人不愿承认),即欧洲发生冲突时,美国“原子避雷针”能否起作用,是否会象苏联的“避雷针”未曾在越南、古巴和中东等地起过作用一样。

这是一个有根据的怀疑,从中产生了欧洲防务的主张,还可能再产生有关区域防务的新主张。在人们尚未清楚认识到普遍裁军是一种急需的情况下,上述主张可能就是走向以普遍裁军为基础

的世界新秩序路途上若干不可避免的阶段。

总之，两极结构的政策及其军事理论都发生了危机。出现这一危机也是因为任何集团政策，不管它是以何种意识形态为基础，都要谋求霸权，即谋求最强大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霸权。这是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掩盖的客观事实。这种霸权开始时依靠其军事实力，采取保护者的面目，最终就要扩大到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一切领域。到后来，这种霸权总要变为受害国家无法忍受的东西。每个集团的政策都是准备同另一集团发生军事冲突，当人们逐渐清楚地看到这种政策的实际目的恰恰是相反的东西，是一种自杀性的东西之时，于是每个集团里出现了矛盾，而且日趋尖锐。

在当前世界（正处于过渡阶段）的军事理论问题上，西班牙这样的国家不能指望自己成为“大国”那样的军事强国，它的首要目的是：在不进行战争并严格地根据保卫国土免遭敌人突然入侵的需要出发，使侵略者认识到，入侵和占领要付出的代价将是非常重大的，是与他所企求的结果成反比的，因为每一个公民都将成为战士，每一寸土地都将成为工事，即使遭到占领，我们也不会投降，并将继续闹得侵略者无法过日子。

在西班牙，进行抵抗是具有深刻的民族传统的。

实行这种政策，就能同处于同样情况的邻国进行合作。

然而，这种捍卫民族的战争必然会是一场全民的战争，不大可能成为维护寡头阶级或维护外国利益的战争。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应当以这些国家也受到同一个侵略者的威胁或攻击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必须和全国、和全体人民融合在一起，全国人民必须拿起武器。这就意味着，除了建立在征兵制基础上的常备军以外，还必须有一支在本地由体格健全的人组成的后备军。

他们要经过定期训练，能够拿起武器，在本地区进行防御战斗，也能在几小时内就能开到其他地区作战。这种全国性的人民防御战争的观点，其实质同帝国主义征服战争的观点，以及同反对人民的反颠覆战争的观点，都是对立的。反颠覆战争，实质上是反革命军队的一个概念，这种军队不是用来保卫民族的，而是用来搞政变的；不是用来维护领土完整的，而是用来维护少数寡头的特权的。

要求改革社会的力量，必须为建立一种能够保卫国家的军队而进行公开的斗争；必须用国家的利益反对当政的寡头集团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有可能得到忠于职守的职业军人的理解和同情。

这样的军队首先要从国内得到主要的供应，武器和弹药的供应不要依赖外国，至少在基本方面应该如此。这就意味着必须建立本国力所能及的国防工业，同时也必须发展民族工业，以便在发生战争的时候，能保证供应军用物资。

社会主义力量，首先是共产党，必须具有自己的军事政策。只有自己的军事政策比垄断寡头政府的更合理，更具有民族性，更吸引人，才能在取得政权之前和以后，获得职业军人的赞同，并使其中的多数忠实地支持新的国家政权。

这就意味着要争取社会上这部分受过错误思想影响的人。他们是可以为某些职业性的问题，为另一种思想体系所吸引的。这种思想体系并不要求他们不能具有某些心理状态，只是便于他们适应西班牙社会和世界上新的实际情况。

要争取这部分人的斗争，就要认真地对待和了解他们的问题。就要根据民族利益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力量的政治纲领必须含有解决国防和军队问题的内容。

西班牙某些“守旧派”可能说这是一个“颠覆的”计划。怎么能是颠覆呢？其实不过是军队和防务观点的民主化计划的开端。它本着民族利益，会有利于军队本身和军人的社会地位。应该公开

维护和发展这个计划。因为国防和军队的问题如此之重要，必需在社会上最广泛最经常地对这个问题进行各种思想的辩论。在这种意义上讲，不是要把政治带入军队，而是要把军事问题纳入左翼的政治领域中去，以便在政治上左右军队的不再只是历来控制国家的右派，并使军队不再同右派结成一体，而越来越多地同供养着它的民族结成一体，并成为其武装的臂膀。

制定民主的治安政策和军事政策是最关重要的，这种政策应有助于（即使仍处于在野地位时）在治安和军事这两个强制工具里为社会主义革新力量提供某种依托，有助于提出一系列供政府采用的措施。同样地，诸如政府职能的民主改革（我只是提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国家民主化等问题也是最关重要的。

在这方而主要应解决国家机器接近全国、接近人民，分散庞大国家机器，建立地区性权力机关等问题。西班牙是多民族的国家，还要解决建立民族政权机构的问题。拿破仑式中央集权的传统适用于过去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要征服外国，就要把国家的力量集中为一个拳头。民主国家的特点是权力分散；这样，政府工作会更灵活，更加接近和更加符合被管辖者的愿望。这种性质的国家能更容易地被改造为适合于通过民主道路达到社会主义的国家，成为人民选举出的人能更容易地控制的国家，成为一个对于暴力政变各种可能性更有防范的国家。

权力分散也是各地区和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克服这样一种不平衡状态的需要，即：一些地区成为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巨大中心，另一些地区却总是处于落后和不发达状况。

这就是要在全国各级实行一种生动的民主制，实际权力归各级人民政权机构，使其生命力达到在中央政权机构任职的人们无法突然取消民主的地步。

关于国家以及争取国家民主化的概念，要求抛弃以传统方式

建立工农国家的想法。也就是说，不要求把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和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带进政府的办公室、又把历来在办公室工作的公务人员派出去顶替工人农民干活的那种另起炉灶的国家。再说，这样的国家，只是有过理想，实际上从来不存在。甚至在通过暴力行动革命取得胜利的那个地方，除了个别例外，官僚始终还是官僚，新官很快沾染了旧官的很多恶习。

这个国家概念也包含着要抛弃国家机器属于党的想法，即抛弃党的机器控制国家机器的想法。我们要建立一种国家机器，它每时每刻都忠实地服从于人民选举出的人，而不是被操纵来违背人民的意志。

把目前垄断资本的国家改造成这样的国家，那里反对垄断的社会主义力量以及新的历史集团，即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联盟，能够行使领导权，实现这一任务也许不能单靠政治行动和政府的民主措施。在某个时刻，也许必须用暴力去压倒暴力的抵抗。也就是说，国家机器的质变也许不是完全和平的，民主政府也许会遇到政变的企图。但是，民主政府如能用民主的办法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而赢得人民的支持，并在朝野两方奉行并实施国家机器民主化的聪明的政策，这样的政府在履行职责和清除寡头残余势力方面，必将处于有利的地位。

四 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

对经济问题的看法

无疑，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我们可认为是经典模式的经济改革的进程。也就是说，意味着所有制的公有形式和私有形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并存。这样，我们纲领中所预示的政治和经济的民主阶段就有了它的全部含义。在这个尚不是社会主义、但也已不是垄断资本统治国家的阶段，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生产力和已经建立的社会服务业，承认私人积极性在这个阶段所起的作用。

同时，其基本目标是把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杠杆掌握在社会手中（而在某些情况下，不仅是在国家手中，而且是在各民族的、地区的和地方的政权手中），以保证由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所组成的历史性集团在这个过渡时期的统治地位。

与此同时，社会性地掌握这些杠杆，是制定全国性的民主经济计划的基础。该计划包括公、私成分，并可以作出一个符合居民的实际需要、符合根本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模式。

我是从这个新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条件的需要出发，来谈一项合理的计划的。我所谈的一个民主计划的含义是，它应该从下面开始制订，要考虑到各方面居民的和各企业或服务行业的主动精神、需要和可能。这个总计划应该把各级、各种各样的计划联系成一个整体，而不应是一个由上面官僚式地强加下来的东西。

在该计划中，为了以有效的方式（尽可能少地依靠进口）来解决粮食问题，同时为了解决这个传统上被忽视的部门所遇到的严

重的社会经济不合理现象,在我国条件下,应该对农业和畜牧业给予首要的重视。西班牙能生产足够的肉类、粮食、蔬菜、水果、油料作物、食糖和酒类来自给自足和提供出口。这一点应该是首要的经济目标。与这个目标密切相联,提出了对一部分与农业生产者直接有关的农牧业生产实行工业化的必要性,同样提出了重组分配网的必要性。这也将有助于阻止资本从农村转移。

在农业方面,应该把维护私人的主动性同不同程度的(和生产、加工及分配有关的)合作形式结合起来。这些形式无论从经济收益观点还是从社会改革进程来看都应加以提倡。在这方面还需要指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并不一定意味着把土地划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分给个人。同样可以采用集体形式或个体与合作社相结合的混合形式来实行,这样就使社会正义和经济收益协调起来。

为了解决食品问题,对渔业也应同样给予认真的援助和极大的重视。对待由于共同市场和另外一些沿海国家扩大捕鱼范围所产生的问题,不仅应该有国际政策的主动性——虽然这是必要的,也要靠渔船队的改革和现代化,使捕捞活动能用那些先进国家今天在这个部门所拥有的技术手段来进行。国家应当为这一目的做出决定性的贡献,各民族的、地区的、甚至地方的政权也要这样做,同时还要鼓励合作社所有制的形式。

民主计划也应该注意能源的发展,使我国最大限度地不依靠外国的供应。国家对寻找石油矿藏,对矿业的发展和现代化,对为了利用各种天然能源所进行的科学研究都应给予更多的重视。

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说,粮食问题和能源问题今天都是基本问题。这两个方面是保证平衡发展和普遍福利的基础。

一个合理和民主的计划,应该致力于改善大城市的生活条件,取消地皮投机,令人满意地解决住房问题,发展各种集体的社会服务行业,考虑建立一个注意避免疲劳、节省时间和减少污染的交通

系统。同时，必须提高乡村的生活条件，把文明和文化的好处带到乡村，以便消灭城乡差别。

教育应是合理和民主的计划的另一重要方面。教育在任何国家的各个领域的发展中都充分地表明了它的作用。教育不仅对造就新人是不可缺少的，事实上，也是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儿童、青年和要求学习的成年人的免费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子女和他们本人的知识水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和表面上十分激进的意见相反，富有家庭的子女也同样应享受免费教育。因为这将有助于鼓励他们在物质和思想上从家庭里独立出来，有助于突出社会作为集体的作用，客观上也有助于克服把教育和家庭本身看成是用来“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工具的观念。

卫生和医药是另一项重大的社会任务：医疗站、诊所、医院、预防医疗、科研，所有这些都必须是社会主要重视的问题。医疗的社会化依然是有待于实现的重大目标，但是不能用否定自由营业的行政强制手段来实现，而是要增加适应于医疗和卫生需要和适应于科学研究的措施，要培养一支人数众多、技术高明、得到体面的报酬和受到社会尊重的医务人员队伍。

我不打算详尽地确定计划的目标——毫无此意，也不是在此制定任何完整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显然应该包括技术的现代化，发展我们具有较好条件的针织业，尽可能地帮助诸如纺织、制鞋等传统工业。

公有制形式和私有制形式的共存，意味着承认剩余价值的生产，并允许私人占有有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混合制度。社会通过税收采取措施保证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会太高，然而又保证这一剩余价值足以刺激私人的积极性。此外，社会控制着贷款，就有可能把银行储蓄用到对整个国家最为有利的目标上

去。这种在经济上仍然混合的体制，将表现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主不仅能在经济上组织起来，而且能够组成代表其利益的政党。这将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阶级斗争将公开地表现出来，然而社会的一致程度当然比在目前垄断资本统治的社会里所存在的要来得大。克服社会差别将经历一个自然的过程，它不可能是强制措施的结果，它是生产力和社会服务事业发展的结果。这样，通过一种受教育推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各阶层的居民将组成一个社会集体。

也就是说，在社会政治民主阶段仍将有公开的而不是隐蔽的社会差别。

但是，经济中公有成分的统治地位，以及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的政治领导权，将确保向无阶级和平等的社会、向社会主义逐步前进。

这个道路开辟了不仅将广大科技人员，而且将广大的现代企业的新人员结合进新社会的可能性。这种新人员只要对其职业的作用看得比他在企业财产中占的份额（如果有的话）更重要的话，就可称之为管理人员。在社会政治民主阶段，甚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今天管理人员所起的作用（自然是有某些差别的）也同样需要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曾不得不临时雇请管理人员，有时得付出极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在可能的范围内，这是一个要避开的危险。无疑，在新的社会形式里，管理人员将必须顾及基层民主，并将在整体计划之内去行事。但是，这些在其职能上的限制，与今天企业计划和管理委员会的决定所规定的限制相比，肯定不会是更大的，而且从社会角度来看，肯定会合理得多。这样，他内心会感到满意，因为他工作的实用价值不单是为一个垄断集团所承认，而且为整个集体所承认。

苏联的思想与民主道路

我正注视着空论家们在高喊，这是“纯粹的改良主义”。我不怕。让我们看看按照经典道路进行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吧。其中大部分已经是实行了几十年的新制度。如果说以一个极快的历史速度就夺取了政权的话，那末经济和社会的改造的速度则要慢得多。依然存在着不平等现象，存在着一些根本的问题，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供应问题，这些问题不能说已经解决了。生产率问题，群众参预问题都仍然存在。还有一个重大问题未解决：民主及社会矛盾和冲突问题。片面的宣传只是掩盖这一问题，而不是予以解决。所有这一切并不否定这些国家同过去相比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中国同志一再直截了当地说，在他们的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并反映在执政党本身的内部斗争上。斯大林为了确保他个人在党内和国内的权力，在苏联把这类理论过于极端化。这类理论有一部分是用来适应所建立的政权的需要的。但是，另一部分却是现实。就连那些一夜之间就夺取了政权的国家，社会改革的进程也必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列宁说，对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夺取政权要比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来得容易。但是，对他们来说实现社会的改造将更困难（我手头没有原文可引证，但大意是如此）。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沿着我们所主张的道路，尽管改变国家政权的进程会比较缓慢，但社会变革的成果，对劳动人民来说却很可能会更加迅速和更加显著。

在七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面前提出的问题概括说来，是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是以科学的标准，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出发来对待我们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使它成为世界性的革命的任务呢？还是思想上过于简单化，象那些重复“上帝在六天里创造了世

界，第七天休息”的教徒一样懒得动脑筋去考虑这些任务呢？

今天的具体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尽管帝国主义还有力量，但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已经变得不稳固了。这首先是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又由于带有局限、欠缺和不完善（我们不隐瞒也不想隐瞒这一点）的社会主义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进展，也由于非殖民化的整个进程。这种不稳固日益加剧，并推动着迄今为止一直统治着世界的那些国家中的变革潮流。

我们处在世界性的革命进程之中。这种进程是从暴力革命开始的，特别是从最典型的革命，即俄国革命开始的。俄国革命对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来说，在历史上的作用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对资本主义体系所起的作用。

这个进程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震撼并扩展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震源是红十月。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源在法国，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当时都没有发生过如此根本地改变社会秩序的革命起义。但是，法国革命的思想传遍了整个西欧，而且通过失败了的革命运动、战争和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生产力的进步所决定的结构改革，资本主义制度遍及欧洲，但各国的发展进程不一样。

为什么不将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扩展看成是个不同的进程呢？这个进程的起点是十月革命，接着是反法西斯的胜利，东方国家的社会变化，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古巴及某些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革命（都各有其特点）。作为这个进程的结果，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历史地丧失了统治作用，其内部产生了新的力量对比，推动这些国家前进的并不是通过机械地重复历史的模式，而是通过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结构改革来推动这些国家的前进。这种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将引起质的飞跃，依据各国的政治传统，变资本主义秩序为社会主义秩序。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国家所发生的革命运动，武装抵抗法西斯和以这些国家为舞台

的强大的阶级斗争，可能就是这些国家结构改革的前题，并将推动这些结构改革，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道路。

和资产阶级的变革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在很多情况下，这条道路可能意味着在行将灭亡的这种社会里的一部分统治阶级，在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重要作用影响下，在过去的殖民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对抗所产生的新问题的影响下，以及经济进程（如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范围内争取各国人民之间平等民主关系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模式有所突破）的影响下——我重复一遍，将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这些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将会变得更加可以渗透，并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与新的社会制度合作，只有极少数的统治阶级的核心可能进行暴力对抗。

我们经常重复说，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让我们作出由这种观察所形成的结论吧。透过有时仍被极为混乱状态所掩盖的现象，可以看出，人民对这种现实觉悟得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尽管有时对我们来说不那末明显，因为它可能以不同于我们迄今为止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方式表现出来。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进步力量的革命意志和一贯的行动（这一行动有时可能经历统治阶级所强加的暴力阶段），我们所一直谈论的这种进程就不会自动发生。但是，革命的意志应该把对现实可能性的分析用之于其战略上，并应清醒地注视新鲜的东西，以免盲目地模仿而一无所获。

当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在苏共二十大上制定“非斯大林化”的政策时，有些问题已经开始由苏联共产党含含糊糊地提出来了。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报告中，引用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所说的一段话：

“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

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因为这顶多不过是苏兹达尔城的蹩脚绘画罢了。”①

赫鲁晓夫自己补充说：

“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连在一起。……说我们把暴力和内战看成是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赫鲁晓夫的报告接着说：

“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同时，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经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民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和它们所组成的政府，正越来越遭到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知道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

“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如果我引证了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提法，那也并不是要提出一个权威性论断。我并不大相信权威性论断，而赫鲁晓夫的权威也早已被他党内的同志们揭穿了，他们越来越不提二十大了。此外，如果判断一下后来所发生的情况，那个提法的出现反映了也

* 着重点系卡里略所加。——译者

①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

许是出于向西方开放和消除冷战的需要的一种直觉认识，而不是对具体现实和这种现实所包含的各种问题所作的深刻分析。另一方面，那是一个仍然搬弄以前的思想原理和公式来勾画新现实的草图。

但是，了解到这类报告起草的方法（在这些报告里，借助于一批有名望的理论家，让他们花上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炮制、重新制定公式。就是说，这些报告不是个人即席的简单产品），就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上述理论家们就已修正和更改了列宁关于在资产阶级制度下普选权受限制和民主受限制的某些论点，而那些经院式的空论家们却至今仍顽固地坚持着这些论点。其实，上述这种修正大体上已考虑到了那个时期的具体现实。因此，由于思考不周和仍然受到教条的束缚，这种修正虽然还不完善和自相矛盾，却是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作出的。

对民主最基本的估价

在政治、理论的论战中，在阶级斗争里，特别是当阶级斗争趋于紧张和激烈的时候，所有的提法，包括那些在科学和原则基础上提出的看法，都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这一主观性不仅是由于激情，也是由于要毫不犹豫地确定紧急政治任务的迫切需要所决定的。一切紧急提到日程上来的事情都要予以强调，甚至于在宣传上夸大其词，因为对任何战术主动的必要性的怀疑，都会加强对手而危及整个战略的成功。虽然后来在这个战略的发展中，有时也得慎重地纠正过头的夸张。譬如，我想起了列宁后来在另外一个场合对夸张的方式所作的解释。在《怎么办？》等文章中，在同孟什维克就关于工人党的结构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就是用夸张的方式强调一个“职业的革命家”的党的概念。我还记起了另一个例子，恩格斯说过，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学生们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

时，有时过分强调经济方面，那是他本人和马克思的过错，因为面对着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敌人，他们曾不得不强调这个基本原则，从而损害另外一些同样涉及作用和反作用范畴的因素。这是由于下列两种人的情况之间存在差异所致：一种人是不进行实践而只是在实验室里活动的纯研究者；另一种人也进行研究，但他们是在实践中进行这种研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在实践中，意志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是赋予政策以不仅是科学的而且是艺术的含义的因素。

在这方而，不能忘记恩格斯给约·布洛赫那封能说明问题的信：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但是，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我认为，在列宁的一些著作中，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强调那些在某个特定的时候才是主要的东西，甚至有言过其实并片面地、过分地加以概括的危险。这些著作是他在十月革命前夕或革命中写的，当时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确实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决不是要责备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身上具有的那些所有革命者都共同的东西，他具有天才，而别人则没有。

^①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479页。

列宁在同那些不顾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前景或现实而吹捧“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倾向进行辩论时，把民主和国家等同了起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谈到在无阶级的社会里国家消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念时说：

……“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也是国家、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指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①

在同一篇著作里，下面这段话同上面摘录的有一些矛盾，又犯了把民主和国家等同起来的错误：

……“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②

我冒昧地认为，列宁在这里所表达的把民主和国家等同起来的民主概念，包括关于把少数服从多数看成是一个阶级或一部分居民系统地使用暴力来反对另一个阶级或另一部分居民的看法，是在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主义”的卫道士们激烈论战中所产生的对民主概念的一种狭隘的解释。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无误地谈及了原始共产主义、古代“氏族”时期的民主，也就是说，谈到了一种国家尚未存在时就已存在了的民主：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5页。

② 同上书，第241页。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①

恩格斯强调了易洛魁人中的代表大会的作用；在大会上，他们发表意见，以此来影响决定。在“荷马时期的希腊人”和古老的日耳曼人中间，有着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人人都可以发言，决议由举手表决或欢呼的方式来通过。恩格斯说，在这个时期“自发的民主处于全盛时期”。他也谈到了使野蛮人比罗马帝国还要占优势的“自由精神”和“本能的民主”。

确实，民主的内容经过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某些阶段已经消失，或只保留给统治阶级。而这一点本身也证明了把民主同国家的存在联系起来的错误。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里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论据，论据中的有些方面同样引起混乱，因为他肯定说：“……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②

也许民主永远也不会达到“纯粹”的地步（应该检查一下“纯粹”的民主指的是什么），但是如果民主起了变化，演变成习惯的话，推断它就此行将消亡似乎是有矛盾的。演变成了习惯的东西是存在下来、成为习以为常的东西。国家也要消亡，但是正相反，它不演变成习惯，而是真正的消失。这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理论里是明确的。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②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第629页。

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当列宁肯定只有在共产主义里才可能有完全的民主时，又出现了混乱：

……“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①

这就是说，面对着社会民主党人所渴望的崇高理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即将出现的、或在十月革命后已经出现的革命现实的维护，导致列宁低估并缩小民主的普遍概念；导致他把这个概念不仅和必须与之战斗的资产阶级国家混同起来，而且和注定要消亡的国家混同起来；使他认为，当完全的民主演变成习惯时，它也就消亡了；并使他把民主和共同生活的基本准则混同了起来。

力图把红十月的对手的意见贬为荒谬，事实上不也就陷入了另一种荒谬吗？因为，毫无疑问的是，甚至在最高纲领派关于国家消灭和用所谓的“事务管理”来代替国家的设想里，这个管理也将通过人面而不是事务本身来实现，并将产生出新的民主形式。

认为其中的某些意见已经导致列宁的门徒（一段时期内包括我们自己）低估民主的价值和无视损害民主的明显事例，且不谈斯大林主义骇人听闻的过失。我觉得，这种想法并不是冒昧无理的。

有遭受法西斯主义痛苦经历的，以及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了解斯大林的蜕化的几代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同的方式估价民主的概念，这并非是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是把它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条道路，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

* 着重点系卡里略所加。——译者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47页。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概念，在陶里亚蒂的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文章里是明显的，因此无需引用西班牙共产党过去在保卫民主共和国的战争时期的提法了。

陶里亚蒂说：

“还必须指出，我们的民主压力之所以过去是有效的，现在和将来也会是有效的，这恰恰是由于我们并不只满足形式上的变化而是为缩短社会主义道路而斗争。我们的斗争给予民主自由本身以新的内容；对自由权利重新作出估价，因为有了自由权利我们就可以向争取福利和经济进步的要求靠近一些；把议会制度本身提到更加高得多的水平；要求对政治制度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革（如发展地方权力、区域建制等）；提出在工厂和农村采取和发展新形式的民主的问题，以达到经济变革和经济进步有助于满足劳动群众的切身要求。正是我们推动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充实了我们争取民主的斗争和我国整个民主生活，并且使它们产生效果。”

陶里亚蒂把民主概念和社会主义联系了起来，并深入探索了社会主义应该对发展民主作出何种新贡献。

对普选估价方面的修正

有关民主的论战在传统上和马克思主义现实上，也包括涉及对普选的具体估价这个方面。列宁在关于国家的著作里，依据恩格斯的观点断言，普选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①

这就是共产党人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内对普选价值的观点，这种观点排除了革命力量通过普选取得政权的一切可能性。所有的共产党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榜样的鼓舞下诞生的。在十月革命中武装起来的群众摧毁了一个腐朽的国家，他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82页。

们并没有利用普选。如果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上述观点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这些党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并曾和它斗争过，因为在那些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恰恰是通过选举才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他们不仅不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在各自的国家内，背叛国际，支持本国的资产阶级。如果没有忘记这一点的话，上述观点也就同样可以理解了。

这个否定普选的概念通过遭受法西斯之害的经验教训得到了证实。在德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伙同另外一些资产阶级政党和国家机器，通过议会方式取得政权，接着就践踏民主自由。这个经验教训一开始就导致革命力量对民主手段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

但实际上，法西斯经验教训所曾证实的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所注意到的，并非普选和民主道路有没有用的问题。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经验教训：当时工人阶级的分裂使得工人阶级软弱无力，不能团结一致并把劳动阶层和中产阶层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利用民主手段，依靠民主手段，甚至使用暴力来对付危险。

因为最终（这是那个时代的人民阵线政策之实质所在）工人阶级终于吸取了教训：必须团结起来，同其他劳动阶层组成联盟，以及认识到民主自由的内在的价值，为了争取民主自由，他们又一次作出了更加痛苦的牺牲。

1894—1895年发表的恩格斯的一篇著作重新具有了现实意义。这就是他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的导言。恩格斯解释说：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我们大家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观念，都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①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4页。

相类似的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仅是我们）长期来，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在西欧各国展开活动的，但我们没有去考虑产生十月革命的客观条件。

恩格斯继续写道：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①

接着，恩格斯详细说明，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是一部分少数人对另一部分少数人的事业，而人民或者参加这种事业，支持其中一部分人，或者是安然接受他们的统治。但是，除开特殊情况（如1789年的革命），广大人民群众并非积极活动的人。

恩格斯称为“相当陈旧了”的街垒的巷战方式是适于这类革命的。他又说：“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对军队的真正胜利，象两军队交战中那样的胜利，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②

恩格斯阐明了这一论断的理由，我不再加以重复。当然，他没有排除革命的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一如今天，甚至在主张民主道路时，如果而临历史的危机关头，也不能完全排除统治阶级的暴力挑起这种可能性。无疑，当时恩格斯就已把国家之间战争条件的变化，与阶级斗争中发生的变化联系起来。

但是，接着恩格斯就强调了德国工人做出的“重大贡献”，“他

^{①②}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603页。

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①

恩格斯又说：

“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 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工具变为解放工具。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根能估计我们行动的比例尺，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畏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但是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②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③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页。

② 同上书，第602页。

③ 同上书，第603页。

恩格斯继续论证，认为这条道路在为把广大民众争取到革命主张上来而进行的缓慢而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是必须的，而没有民众的直接参加，彻底改变社会组织是不可设想的。

恩格斯又说：

“我们在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二百二十五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①

就是说，早在上个世纪，而且在欧洲这个几乎是唯一的和特殊的德国的例证的基础上（在当时的欧洲，工人阶级还远没有今天的力量，文化力量还不算是革命因素，还没有目前的历史经验，也没有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和非殖民化的胜利），恩格斯就给普选权赋予了会使今天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喧闹不休的长处。在这方面，恩格斯又说：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象是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②

^① 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9页。

^② 同上书，第610页。

也就是在这篇著作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原始基督教之间进行了生动的对比。

显然，自从恩格斯写下这些论断以来，自从列宁只把普选看作工人阶级政治成熟的标志以来，欧洲和世界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以致今天我们在谈到欧洲发达国家时，不能停留在同样的限度内。

普选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是劳动人民和文化力量的政治行动的唯一方法。但是，由于我们上面论述的理由，在今天的欧洲，社会主义力量可以通过普选首先进入政府，然后执政，而且如果通过定期向选民征求意见能够保持人民的信任，就可以继续维持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

社会主义的批评与民主斗争的方式

实现这一点，包含着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一场强有力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理论斗争。就是说，开展我们一直谈论的那种全面行动，以便使国家的意识形态工具转而反对统治阶级，并且至少部分地逐步取得素来允许统治阶级确立其统治的国家暴力工具的理解和支持。这就等于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而斗争，为国家组织和机构的民主化而斗争。

在这一事业中，我们必须给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力量，恢复理性的和道德的价值观念，而国家垄断资本的制度却虚伪地企图把自己与这些价值观念等同起来，但资产阶级在它还是一个革命阶级之时可以说是这些价值观念的化身，而今天它已不是了。

在真心实意地实行民主和政治自由化的价值观念的人和那些以为民主和自由仅仅意味着保持其垄断资本的财产及其经济特权的人之间打开缺口、把他们真正地区分开来，这是一种需要、一种责任。上述后一种人，在民主和自由尚未使现行经济制度成为问

题时，他们是民主派和自由派；情况一旦不是这样，他们就变成法西斯分子，并且可以冷酷地杀害、拷打和迫害他们自己的子女。

有时，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混在一起，表面上难以区分。现阶段支持欧洲政治制度的中间或中左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混同的基础之上的。

今天，区别真正的民主派或自由派同垄断资本制度狂热的辩护士的标志，是看他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力量有权执政并实行它的纲领，如果大多数人民通过普选授与它这一权力的话。而承认不承认共产党人有权不受限制地在民主领域内行事，也是区别的一个标志。

同时，我认为，对于已经吸取了这一时期的经验并且赋予民主以其全部价值的欧洲共产党人进行区别的标志，是看他们用何态度对待某些人对他们的善意批评；是看他们在政治论战和思想斗争中的民主作风；是看他们自己对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特别是对这种制度的某种意义上的极权方式（从未因此而将社会主义制度与法西斯制度混为一谈），对无视民主和个人的人权，对官僚主义等所持的批评态度。这种批评态度与这些国家的敌人的态度根本不同，这些人之所以与这些国家为敌，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政治制度的缺点，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取消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被剥削阶级开辟了振兴的新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的批评态度可能在许多方面与正直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的态度相吻合。

我们这种区别态度显然表明，我们不认为纯粹经济的原因能决定所有人的政治和社会态度；这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矛盾，这与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确定阶级的普遍真理也没有矛盾。在这个过渡时代，许多基督教徒以基督教教义的革命起源为根据投身于进步运动。和他们一样，整整一系列人，不管是不是不可知论者，都经历着类似的演变。他们依据的观念渊源

于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资产阶级是高喊“自由、平等、博爱”这一名言的革命阶级。如果我们不理解这种现象，就有把客观上并非敌人的人，不自觉地置于社会主义的敌人的营垒的危险。

批评共产党人实际的或可能的错误，批评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消极面，这本身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反苏。这里我们指的是严肃的批评，而不是造谣诽谤。确实，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批评，为了客观起见，必须区别这些和那些国家的客观情况。在批评时，应该考虑到每个国家人民的历史、传统、发展和文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或今天的苏联和印度支那、朝鲜或古巴的人民不能一概而论。但归根结底，严肃的批评只能增强社会主义并有助于它的发展。

在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特别是在那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内，这种批评显然需要有国内的表达渠道，并且不会遭到那种用令人不能容忍的方法进行的压制。

为了扩大并变成为世界经济体系（这不意味着只有一个样板，不意味着依附于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不意味着失去各国的独立性和独创性，甚至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和那些国家之间利益差别的消失），社会主义必须为自己恢复民主和自由的价值、捍卫人权，包括尊重持不同政见的少数。

与此同时，而且在同样的情况下把普选作为准则，作为一个社会的政府所必须遵循的准绳，这并不意味着把人民群众的作用缩小为每若干年进行一次投票，选举他们的代表。当受委任者不称职时，群众必须有权撤掉他们，另选新人。群众必须有可能在各级政权经常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事务。这就强调了民主自治和人民监督的方式的意义。

但是，除了新闻、集会和结社等传统自由外，人民群众和一切政治力量充分享受参与政治生活的其他权利。例如，游行和政治

罢工就是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所不能放弃的民主权利。在高度民主的制度中，唯一应该彻底根除的，是把恐怖主义和肉体摧残作为政治行动的工具，是用造谣和诽谤反对个人或团体。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在存在民主机构的情况下，当某一届当选政府，其活动损害国家多数人的利益而有利于少数人的特权时，政治罢工也是一种民主权利，作为对不合理的措施表示抗议和施加压力的因素。

历史的发展、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进步阶层的扩大，使得无产阶级政治总罢工的方式在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适宜了。发生政治罢工时，罢工必然波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曾把这种情况称为全国罢工，这不是从涉及的地区而是从社会意义来说的。提出这种罢工其目的不应是与国家机器发生直接的冲突，而在于通过提前投票寻求一条民主出路，在某些时刻投票有可能是解决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必要手段。这就要求有能力把这类罢工的目标转入民主范围，由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目标应该包含广泛的社会内容，就是说，把全国最广大阶层的利益和意见统一起来。

确实，政治罢工与要求收回权益的罢工是大不相同的。后面这种罢工在劳资关系中是经常发生的，并且一般带有部门或企业的局限性。政治罢工是一种极端手段，当一个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危险地脱离社会的民心 and 利益时，人民应该可以应用它。因此，这是一种真正特殊的手段，进步党派应用时，必须永远采取非常负责的态度。

党的作用与新的政治组合的作用

发达国家中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新概念，在共产党的作用和职能上，包含着某些细微的差别。只要共产党真正体现马克思

主义的创造性态度，它就依然是先锋队的党。但是，它已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文化力量的唯一代表。在理论与实践上，它承认具有社会主义方针的其他政党也能代表这些或那些阶层的劳动人民，尽管它们的理论和哲学观点及内部结构与我们的不同。它认为，对具体问题同时有多种路线和解决方案，是正常的和令人鼓舞的。它毫不犹豫地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在分析具体形势方面，其他政党可能比它更击中要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文化财产的一部分，有些政党会偶然地、甚至是不自觉地应用它。保持先锋队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严格应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方法。这有时意味着不仅不赶一时占统治地位的潮流，而且要反潮流。先锋队的作用已不再由于党的名称和纲领面成为一种特权，实际上也从来不是这样。它也不是由我们导师的恩赐或权威性的认可，授予我们的天职之类的东西。它是一种应该每日每时、而且（我重复一遍）有时要靠反潮流来赢得的地位。或者我们用这种方式把我们的先锋队的的作用变成现实，或者任其成为一种思想虚构的东西，有时只能聊以安慰我们的无所作为而已。

新概念还意味着党不是军队，尽管它可以变成一支军队，如果历史条件和统治阶级的暴力不允许其他手段的话。在民主阶段，党是由日益觉悟和负责的人组成的一股政治力量。这些人自由地发表意见、讨论问题、展开思想交锋，但是在估价下列问题^时意见是一致的，即：党的纲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党本身是劳动人民为求得解放所拥有的最可宝贵的工具；组织是保证政治行动效果的关键因素；一旦多数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或领导机关（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作出决定，行动一致和纪律就是必不可少的武器。

男女党员作出个人判断、提出个人创建，从来不是消极分子；但他们知道，到了行动时，集体意见高于个人意见。

党承认，除去集体的政治任务外，在所有涉及其爱好、知识或艺术嗜好、私人生活和私人关系的事情上，每个党员都是自己意志的主人。党还承认，在理论、文化和艺术领域，在包括人文科学的各种学科的科研领域，不同的流派在党内可以同时共存，而且所有流派都应有在其文化机构和刊物上自由交锋的可能。因此，除了在革命战略和政治策略问题以外，党不强求一致。

党同时是群众和干部的党，是一般党员和先进党员的党。

党不想变成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力量，也不想把党的思想作为官方思想强加给国家和社会。党的使命是为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夺取政治——社会领导权做出贡献。因此，党不想用垄断方法为它自己夺取政权，而是要夺取这样的政权，在这样的政权中，代表上述力量的不同政治团体，按其实际影响参加为争取进步、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竞赛并进行合作。

显然，这意味着要纠正某些关于党的作用的经典概念，这是与社会上发生的结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的力量对比，一言以蔽之，与新的现实有联系的。

在这方面，过去时期我们共产党人要党肩负的作用，即成为社会上劳动人民进行统治的工具，从理论上说，今天就要由我们所谓的新的政治组合来发挥了。

新的政治组合的概念是与社会上劳动和文化力量集团的领导权的概念相联系的。无疑，一切社会力量都需要一种政治工具来发挥它的作用。虽然我们首先是考虑我们的党，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党不是唯一的政治工具，其他政党单独来看也不是唯一的政治工具。所有政党联合起来才能成为唯一的政治工具。

这种联合可能会有共同的特点和不同的特点。

共同的特点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与民主的最低纲领；制订和研究解决今日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的共同机构；政治协调和批准上

述解决方案的共同机构；包括国家政权一级在内的各级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共同行动。

不同的特点可能是：构成新组合的各政党或社会组织有各自的哲学或理论；它们在组织上、在各自政治生活中以及领导机构，都是独立的；完全有自由在新组合内外确定和捍卫各自的立场，一旦出现不可克服的分歧时可自由退出新组合。

就是说，它有点类似各政党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联合会，该会根据共同协议行动，同时尊重各政党和组织的特点和独立。

它不是超级政党，因为毕竟各自都保持其自决的自由；也不是为了选举或者偶然的简单联合；它为实现共同理想的永久性使命所鼓舞。

实现这一新的政治组合，不是靠我们随心所欲的一次行动，而是通过取得对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共同的民主道路的认识、抛弃与垄断资本主义合作的立场、互相接近和创造以竞赛代替敌对的信任气氛这一整个过程，并通过日益提高的合作和共同斗争的方式才能实现的。就是说，这不是一蹴而就、立即可以实现的目标。

“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我认为，上述一切可能有助于向朋友们和正直的对手们证实重要的一点，即：“欧洲共产主义”这一现象，不象某些西班牙（及非西班牙）的反动分子所说的，是一种“莫斯科的策略阴谋”，它是正在制订中的、产生于独特经验和具体现实之中的一种自主的战略概念。任何一个公正地判断我们的人都必将承认，这个战略不是为“扩大”苏联的“影响”，也不是为打破本大陆军事力量对比的平衡而制订的。在这方面，这一战略的目的是：超越集团政治，确保在实现社会主义前景方面我们各国和欧洲整体的独立，使这样一个欧洲能在维护和平、国际合作和特别是与第三世界建立平等和

民主的国际关系上占更大的比重。或许由于这个原因，通常所说的“欧洲共产主义”，一方面成了逐出教门的目标；而另一方面，人们有倾向地把它看成是反对派集团。就是说，想把它逐出教门的是，那些认为共产主义必然是苏联政策工具的人；把它看作反对派集团的，是那些把欧洲仅仅看作是美国帝国的延伸的人。

尽管从根本上说，我们企图确定的共产主义倾向，对任何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有效的（如日本的例子正在证明这一点），如果可以承认“欧洲”这个附加词，那是因为以本大陆每个国家的现实为基础，并从这一现实出发来看，各国的社会主义力量不能与欧洲范围的某种共同战略脱离关系。为了站稳脚跟并取得胜利，这种倾向需要欧洲范围的一致行动。正是这种倾向可以为建立这样一个欧洲，做出决定性的贡献。这样的欧洲是统一的，有其独特的重要性的，使用本大陆的资源，并能使本大陆在处于结成地区集团阶段的世界均衡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思想领域，在“欧洲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至少与迄今为止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不可能有丝毫混淆。通常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主张改造而不是管理资本主义社会；为国家垄断资本制度提供社会主义选择，不与这种制度融为一体，不成为这种制度的一种政府。就是说，它主张发展世界革命进程，而为了走出人类被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引入的死胡同，今天，这一进程是客观的社会需要。

同时，“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主张与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与进步的基督教力量，与一切不依附于垄断类型所有制的民主团体实行联合一致。如果社会发展被看作是一个流动着的、变化着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那么这与前面之所叙述是不矛盾的。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分裂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但现在去深入分析这些原因就会脱离正题。在涉及我们的部分，我们共产党

人完全对我们的历史负责，包括它的成绩、错误和缺点，既不抛弃历史，也不把历史变成胜利主义的神话，而是以批判的精神对待历史。

如果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方面继续进行类似的、多少公开的进程（因为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至少在第一阶段，往往是通过纠正它们的战略和策略，而不是通过历史的分析来进行自我批评的），那就毫无理由不去克服二十年代的分裂，并在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基础上实现联合。我认为导致法国左翼结成联盟这一演变的基础就是这种进程。

至于基督教运动，至少在西班牙，很明显地正在开展一个自我批评或更新过程，这是有助于为这种联合提供方便的。

总之，需要在各国或全欧范围内进行欧洲共产党、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之间（象某些国家已进行的）类似于几年前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对话。这种需要日益迫切，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达到具体的成果很困难并需很长时间。

环境对我们的进程的影响

在这个划分为集团的世界，西班牙同西欧其他国家一样，处在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中。我们无意无视这种现实。我们对这一现实持什么立场呢？

我们的立场不是与这种现实决裂，以便转到另一种环境，转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符合于苏联的那种环境。我们已经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苏联和美国的欧洲，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的欧洲，在这样的欧洲中，我国将保持自己的特点。

至于西欧已建立的政治制度（其基础是代议制的政治制度即：议会、政治和哲学的多元论、权力分散论、地方分权及人权等），从根本上说，这种制度是有效的，如果它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

本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话，它会更加有效。无论如何，要力图使这种制度更加民主化，使政权更接近人民。

经济环境则更加复杂。应该考虑到，如果出现一个民主政权，其领导权又掌握在劳动力量和文化力量手中的话，帝国主义就会力图动摇这个民主政权。

面对这种压力，第一，应该依靠欧洲左翼最广泛的声援。这种声援不仅通过公众舆论，而且还在左派执政的国家里，通过左派政府的政策来体现。这种声援必须是互相的，是在一个不同的多种形式的、但在改变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却是吻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就需要一个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欧洲左翼的共同战略。

第二，应该依靠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那些坚持反帝和民族主义政策并且关心有益于其发展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家的合作。

第三，应该加强与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

这一切不意味着改变我国经济关系的体系。经济关系的传统体系是不会轻易地而又不造成严重危害地发生改变的。西班牙应该努力保住它的传统的买卖市场，尽管它企图按照它的利益在可能的范围内扩大市场并使之多样化。

确实应该强调我们经济独立化的倾向。但是我们认识到，这种独立永远是相对的。我们不能在不可能实现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中闭关自守，这种经济在佛朗哥统治时经过试验并失败了。我们处在生产力国际化的过程中，而面临着外国资本投资和多国公司的现实。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必须考虑并努力利用这些现实，以便针对有利于国家利益方面的发展提供方便。

这意味着外国资本的投资和多国公司在我国的活动将不会遇到阻碍。因此，外国资本将要在我国这里提取剩余价值，将会有利可图。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历史经验的观点来看，这不过是重复某

些国家曾经做过和正在做着的事情而已；而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已经多年，甚至实际上曾一度断绝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

在苏联，列宁甚至曾一度主张准许给外国企业临时租借地，以便稳定苏维埃政权和发展落后地区。无疑，这在当时是一种极端的紧急措施，根本没有实行。在中国，英帝国主义继续占领着香港，并非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把它赶走，而是因为实际上香港是中国经济的进出口渠道。

就是今天，在苏联还开设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银行；苏联主动向日本企业提出签订合同，共同组织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的天然气；在苏联建立了一家菲亚特的子公司，苏联还与法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签订了类似协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如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继续严重地发展下去，它们的企业会越来越狂热地竞相与社会主义国家签订协定。这样，资本家就赚到了利润；但是同时他们也帮助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而利润就是对此之报酬。

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企图与共同市场达成互利协定。象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企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共同市场合伙。

波兰正在接受美援，虽然数目有限。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显然，社会主义的民主的西班牙必须对有益于我们经济发展的外资和多国公司继续实行开放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维护国家利益，将上述投资纳入计划并禁止对内政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干涉；对任何干涉将给予最严厉的经济惩罚。

无论如何应从客观现实出发：尽管帝国主义已非唯一的世界体系，但依然存在着一个世界市场，它是受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制

约的，这些规律，说到底是资本主义的。

有一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界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曾谈论两个世界市场：一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是社会主义的。今天，即使还这样讲的话，也已经很少了。除去出于政治声援的需要而造成的某种特殊情况外，市场规律也指导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在特定的情况下，常常为了得到技术的好处和优惠的贷款，这些国家是优先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市场是紧密相联的（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将更加紧密），甚至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尽管有好几年否认价值规律也在社会主义国家起作用，并在这种否认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价格的理论；但世界市场的价格，今天却仍非常直接地（尽管不是自动地）发挥着影响。

事情已达到这种地步，以致于资本主义西方的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国家（或许中国、朝鲜和其他某国是例外，因为目前它们与世界市场的关系很少）也存在着通货膨胀的过程，尽管这种过程比西方缓和，但并不因秘而不宣就不是事实。如果说，共同市场存在着举世皆知的危机，那么同样明显的是，经互会也没有摆脱严重的矛盾。

就这样，经济以其铁面无情的规律深伏于一切政治决定的底层。

因此，就西班牙而言，现实主义的经济政策不能无视它的经济环境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必须用剩余价值的方式向外国资本纳贡；重要的是，在这样做的同时，要维护我们的政治独立性，并且对那些并不企图利用经济手段对人民的民主意志施加压力的人，给予优先权。这里，不仅要洞悉对民主政府的直接压力，而且要洞悉那些常用的、通过给政党和群众性的宣传工具以资助津贴的方式施加的间接压力。

至于谈到西班牙由于处于一种有明显军事意义的地区而派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政策必须有其伸缩性和灵活性。不应改变目前世界力量的均势，不应从受美国影响转到受苏联影响。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要必须裁军的思想尚未占上风，军事力量的均势可能是和平的唯一保证。现实情况也是如此，甚至这种情况使目前的和平岌岌可危。从这一点出发，并以不结盟和克服集团政治为目标，可能向民主的西班牙提出的任务是，第一阶段，为越过目前均势的两极特点并把它变为多级平衡做出贡献。所以，我们不反对这样的阶段，在此阶段中，联合成全欧范围的、既独立于美国又独立于苏联的防务，而且这种联合不应破坏西班牙军队的民族特性。就是说，既不要企图仿效外国军团集合于大帝麾下的，凯撒之罗马军团，也不要仿效那些自愿或被迫入伙的国家的军队置于德国参谋部指挥下的，希特勒之欧洲军队。它是这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维护各国军队的民族特性，有明确的目标，其首要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不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活动，不干涉任何一国（不管是这种联合的成员国或非成员国）的内政，不以任何借口侵入任何一国的领土。

在目前条件下，这样的欧洲联合防务可能同时对美国对苏联都是一种保证。此外，这两国由于有巨大的核威力，也无需基地无需占领别国领土来确保其防务。

五 “欧洲共产主义”的历史根源

欧洲人民阵线的经历

在欧洲共产主义潮流的行列里的党一致认为需要走向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它实行民主，实行多党制、议会和代议制机构。它通过普选定期行使人民的最高权力。工会独立于国家和党派。它给反对派以自由、尊重人权、信仰自由，文化创新，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的自由。发展人民大众参加各级、各部门社会活动的最广泛的形式。同时，这些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提出完全独立于任何可能的国际指导中心及社会主义国家，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是国际主义者。这些党极为重视同反对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为国际关系不断民主化而斗争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

这些党为合作与和平共处，为战胜军事集团政策与撤除任何大国在国外的军事基地，为禁止原子武器与裁军，为互不干涉内政，为各国人民行使其自决权而斗争。

这些共产党已经逐步形成了（其形成的速度并不总是一致的）一种不同于其它共产党的独特的政治思想结构。这样的不同是一夜之间出现的现象呢，还是渊源于一个更长更久的过程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的，因为不同的回答将增减我们现存关系的密切与信赖。又因为这一类的变化事实上总是经过长期酝酿的。

是的，不管其政治幽灵采取何种形式，肯定地认为这种不同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则是荒唐的。一些人认为，这种不同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开始呈现的，而在1968年由于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猛然

加剧的。另外一些人，譬如日本人则认为，关键时刻也许出现在中苏分歧公开化之际。

英国共产党人早在五十年代就制定了一个纲领，纲领中预言了通过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首创与苏共二十大前后的解冻时期正相吻合；而苏共二十大，则确立了通过和平和议会的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这种情况对早就存在于象哈里·波立特和约翰·高兰这类人的脑子里的思想的抬头是有利的。

而意大利人，特别是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1956年又更深刻地认清了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所谴责的那种现象的起因，更深刻地认清了象匈牙利发生的那种事件。

陶里亚蒂善于触及关键之点：问题在于政治制度。虽然至少公开地没有对这一制度展开批评，但从那时起，就开始强调通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了。

在西方共产党领导人中，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大概在苏联生活最久。因此，他对苏联也认识得最清楚。他在共产国际里的实际决策的一小组人中工作了许多年；他熟知各种各样的派别斗争，也看到了解决这些斗争的方式；也许他曾为了摆脱那个制度的圈套而不得不多次施展他全部技能。人民阵线的经验，尤其是西班牙人民阵线的经验、萨莱诺转折、新的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的里雅斯特港的冲突（冲突中他持一个非常坚定的民族的和独立的立场）都曾为他提供了另外一类型的丰富经验，这使他比许多其他领导人更好地武装了起来，特别是他还具有那渊博的知识和冷静清醒的头脑。自从意共八大以来，一条自主的路线已经形成；陶里亚蒂在1969年（原文如此——译注）世界会议上想方设法阐述这条路线；在著名的雅尔塔备忘录中再次明确地提出了这条路线。雅尔塔备忘录被认为是他的政治遗嘱。这条自主路线后来在路易吉·隆哥领导下得到了肯定，到贝林格时终于在“历史性妥协”这

一概念中得以最后形成。

先前，南斯拉夫的经验对推动自主和思想创造性的潮流业已作出贡献。1948年，许多共产党遵循着无条件地服从苏联的传统（组成共产党情报局的一批重要的党促使这种无条件地服从合法化了），我们象耶稣教的信徒团那样跟着谴责铁托同志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我们在无条件服从中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当赫鲁晓夫大胆公开揭穿阴谋时，我们痛感上当受骗被人卑鄙地利用了。这导致我们在对待苏共的态度上所留存的神秘的、近乎宗教的东西最后的幻灭。

面对着共产党情报局里社会主义国家对它发动的政治战和经济战，为了动员全民把建设和保卫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这副重任承担起来，实行自治，在起初可能只是一种防卫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发现；但当它一旦显示出可能性之时，就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当有所成效时，就需要对它加以研究，并把它充实到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中去；于是，这种自治就成为反对惯常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自卫手段。

如果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问题（即使至今还没有人这样做过，以后可能会有学者或社会学家去做），就会发现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共产党的某些一般性论点（甚至在成为我们的许多观点和论点的依据的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路线内部）和实践活动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分歧。这种实践活动力求符合实际，却与一般性论点发生——有时不明显的——矛盾。

我们的对手往往低估这种分歧的现象，因为这种分歧符合他们的目的，他们把它看成是共产党的权宜之计而已。然而真正了解什么是共产党的人都知道，任何权宜之计都不能导致它抛弃涉及其本性的概念。

譬如，深入研究一下（我现在既无时间亦缺乏必要的材料）

1935年确立的人民阵线路线中，哪些东西是一些党（象法国党和西班牙党）独创的，哪些是苏联为了适应反对法西斯对苏侵略的需要而作出的贡献；而这种研究是很有意思的。官方历史学家可能反映出一种美化事物、赋予这条路线以诗意的倾向。但是，譬如说，现在已经获悉，那时法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之间在关于人民阵线问题上就曾经有重大的分歧。如果认真地估量一下这些事的话，可以看出主张在人民阵线于巴黎获得胜利后参加人民阵线政府的莫里斯·多列士与反对参加政府的共产国际的对抗（虽然我们并不详知所引起的争论，虽然用共产国际的权威解决了问题）不是什么次要的分歧。这不是要不要部长职位的简单问题，而是一个涉及人民阵线的内容与范围的实质性问题。没有共产党加入其政府的人人民阵线是一码事，有共产党加入其政府的人人民阵线又是一码事。在不同的情况下，在战争的环境里，这一点在西班牙得到了证实。

设想一个有共产党人加入其政府的人人民阵线一定能使法国反法西斯斗争更加激进，并非冒昧的。共产党人不参加政府，在人民阵线中只能发挥较小的作用，他们的动议的分量肯定要比假使在政府中负有责任时小。假使共产党参加政府的话，布卢姆在西班牙共和国面前耍的左右摇摆的把戏，他那前后不一贯的态度，起码也不会表演得如此充分。多列士希望的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意味着在法国有一条更为有力的反法西斯路线来引导，意味着对西班牙共和国承担更为积极有效的责任，意味着法国对外政策会更坚定地对抗咄咄逼人的希特勒主义。我不知道在讨论共产党人参加不参加政府的时候，曾否看到并指出了事情的这种意义。然而我认为，这本来应该是多列士获胜的必然结果。不参加政府，则意味着从外部支持（就象在简单的选举联盟中做的那样）一个优柔寡断、没有能力执行一贯的反法西斯政策的政府，靠这种政府在国际棋盘中可以走这样的步法：能给自己留退路，自身可保，见机行事，决

定进退，以免自己陷入有一条同轴心国激烈对抗的道路。

事后推测假使多列士的立场取胜就会发生什么，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设想，在多列士获胜的情况下，法国人民阵线是会与事实上的状况有所不同的。它制订更为坚定的反法西斯政策的能力，定会影响欧洲局势，很可能会影响西班牙局势。

这些分歧即使在内部争论中，靠共产国际的集中制和纪律能轻而易举地解决，然而分歧的存在还是证明，人民阵线的政策并非象其对手所认为的那样，只是苏联的创造（苏联的这一创造同它面临法西斯侵略的危险所制定的保卫自己的对外政策有联系）；还证明，这一政策是两种创造性的汇合，一种创造性来自环境，是各国具体现实的需要，同另一种则迥然不同。

还有一例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这种分歧。就是哈里·波立特的例子。他是英国共产党的领袖，不同意苏德条约，他认为从德国入侵波兰的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反法西斯战争。这在当时不是苏共及共产国际里占上风的意见。那里的官方意见认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哈里·波立特被迫辞去了英国党总书记的职位，有一段时间他没有担任这一职务。后来，当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时候，斯大林宣告了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并在某个时候承认了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这样的性质。哈里·波立特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这就默认了波立特过去的看法是对的。而我之所以举出他的例子来讨论，是因为这个例子反映了一种不时出现的矛盾的存在。然而那时同本国实际及世界上这一地区的问题有更密切联系的欧洲党的首创精神，与苏联至上的中心主义之间，尚未达到分裂的程度。

西班牙的经验 托洛茨基事件

西班牙的情况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因为我国随着君主政体的

垮台而出现的国内革命进程有其自身的规则，很难服从外来的决定。

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时候，当时人数很少，思想狭隘，派性很强，斗志旺盛的共产党走上了街头，宣布必须建立苏维埃、解散资产阶级国家。那时是阶级对抗的策略时期，这一策略从许多方面使人联想到今日左派分子的观点；然而在西班牙，除了很小很小的、难以捉摸的几个小组外，没有一个当今的左派象昔日我们党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那种狭隘的左派方针起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决定，这些指示与决定谴责同反君主政体的小资产阶级力量达成的任何协定。

生活证明这些观念是错误的。在党同群众保持广泛接触的地区工作的一些党的领导人，如在塞维利亚的何塞·迪亚斯、米赫、德利卡多和巴尔奈托及巴斯克地区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开始提出了问题：他们是着手把党引向群众的新班子的基础。这些在党的改造中起了这么大作用的人物很幸运，他们的立场同共产国际指导方针的变化正相一致，从而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但是在1933年的选举中，他们迈出了偏离人民阵线方向的一步：在马拉加同左派力量达成了协议，使得博利瓦尔博士作为人民团结的候选人当选为共和国的第一个共产党议员。

后来在组成人民阵线的时候，正当苏联棋盘上和共产国际内部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处于高潮之时，西班牙共产党却同意将西班牙的托派分子包括进人民阵线，甚至在加泰隆尼亚自治政府中还同他们合作了一个时期。

西班牙政治进程的需要，在当时是凌驾于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内部展开的势不两立的派别斗争之上的。我不知道这方面可能有过什么样的会商，因为我当时还不是党员，更不是党的领导成员。

但是为了说明导致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群众性的党具有社会主义和独立的特殊概念的这种背景，我认为这些背景由于确定了这个国家固有的民族特殊问题的分量，也就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即使在共产国际还是一个国际性的政党时也是如此。

的确，关于托洛茨基主义和西班牙战争人们已谈了不少，而且还在反复地谈论着。毫无疑问，其中有一部分是别有用心反共宣传。但这不应使我们迷失方向和否定那些被无理地谴责为“法西斯代理人”的人或集团，取得恢复名誉的权利，尽管为时已晚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共产党人深信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已经成了纳粹主义的代理人。不能否认，莫斯科的审讯以及在诉讼中令人愕然的招供，不仅在共产党人中间，而且在那些公正的评论家（他们同我们一样很难想象为了获得那些招供而使用的残忍的手段）中引起了震动。事实上，历史及苏共二十大已证实了托派在一个时期里所揭发的许多暴行。但是在托派讲的话与斯大林及其同伴的话之间，选定真理在谁的一边，是一种信条问题，而我们也作出了相信苏联领导人的选择。苏联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它的长存对我们共产党来说是头等大事。那时，我们觉得，任何事情只要看上去象是对苏联的攻击，客观上都是为它的敌人效劳的。

在这个基础上，一个托洛茨基里通纳粹分子并受美帝保护的神话就出现于世并得到了确认；而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也就接受了关于十月革命及紧接着的国内战争的官方解释。在这些官方解释中，对托洛茨基的作用却只字未提。

二十大以后，苏联发表了列宁的一些文章；文章中，列宁客观地谈到了托洛茨基的立场，在一系列事件中支持了他的立场；就在评定他的人品时，也没有掩盖他那些积极的方面。发表列宁的文章似乎就是宣布，要在历史教课书中，比较客观地谈论托洛茨基的

作用了。但是这样的谈论并未出现。官方的历史教课书一批接着一批，事实真相丝毫没有提供，仍旧是一部片面的，不符事实的工具化了的历史。这就有助于继续将红十月及革命的许多问题说成象是美妙的“埃比纳尔塑像”，使研究工人革命运动的人难于认清丰富的充满矛盾的历史，在政治思想上解除他们的武装，而不是武装他们。

对托洛茨基在革命时期的作用作出客观的介绍同对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批评并不矛盾，作这样的介绍并非时间问题。列宁在革命前——在中间派的托洛茨基时期——和在革命期间，在评价这个老的人民委员的某些观点时，对托洛茨基的作用做过客观的介绍。

这种对托洛茨基的介绍，应该是从托洛茨基在革命运动中和在俄国党中代表着一个政治倾向这一事实出发，而不能将他描绘成一个卑鄙的希特勒的特务。现在还有什么理由能使这种看法延宕下去呢？相反，说出真相将会帮助人们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将有助于新一代更清楚地认识这种复杂性。

承认这一点后，必须指出，举例说，托洛茨基关于1936年至1939年西班牙革命的观点是错误得不能再错的。托洛茨基把在西班牙发生的一切同俄国模式等同起来，因而批评他的信徒没有以足够的忠心效法俄国模式。然而西班牙革命展示了极其不同于1917年10月的特性。我下面将谈到这些特性。

在插进了一段关于托洛茨基的话题之后，我想谈谈另一个目前不断在某些人中谈论的问题：关于安德鲁·宁的问题。安德鲁·宁是在巴塞罗那1937年5月暴动之后失踪的。一个说法是，他是被秘密警察杀害了；另一说法是，他逃到法西斯那边去了。战后得知的一切，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从得知的一切中所能推断出的一切，都无疑地证实安德鲁·宁是被杀害了的，他并没有想逃到

敌人那边去。

我可以这样说，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实际的责任；假如有共产党员个别地参与了这件事（我不知道有没有），那是他自行其是，并不是党的决定。那时我已参加了政治局。每当谈起此事，当时所有的人提出的和接受的说法都是说他逃到敌人那边去了。后来，我私下询问比我资格老的同志，他们当时起的作用比我大得多，可能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但他们都对我说，他们所知道的唯一说法就是“逃跑了”的说法。而我相信他们当时对我说的是实话。

1937年的这种说法怎么能够广为流传并似乎是可信的呢？如今，这一点使所有那时没有积极行事的人感到奇怪。人们只能将这件事同对托洛茨基分子的迫害联系起来，同接受了斯大林的政策联系起来。然而这只是理由之一，仍然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当时大家都相信那种说法。围绕着这件事，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1937年5月，发生了一起武装暴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某些无政府主义帮派参加了这次暴动，反对社会党人拉尔戈·卡瓦列罗为首的共和国政府。该政府由五名社会党人、四名无政府主义者、四名共和党人、一名加泰罗尼亚人、一名巴斯克人和二名共产党人组成。当时我们正处于反法西斯的鏖战之中。暴动意味着给佛朗哥的部队敞开了战线。因为一部分原先守卫这一战线准备用于打击的部队，从这一战线撤走了；必须征募另一些人来控制这一战线。

激战期间，困难极大，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说得轻点，这些动机完全是发了疯的），暴动是背叛共和国的严重行为，法院对此作出的惩戒性的制裁，从法律上和道义上来说都是正当的。从前后情况来看，安德鲁·宁逃跑的说法是可信的，这并不是出于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感情，而是出于战争时期犯下了严重的叛国罪，这一罪行

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造成了一个受佛朗哥主义摆布的形象。然而实际情况是，共和国的法院只是对那些政治头目及放弃阵地掉转枪口反对人民政权的军人判了徒刑。

也就是说，宁的被害是一个可鄙的、不能说是无罪的行为；然而这件事是发生在暴动的情况下，而这一暴动在反法西斯的革命战争年代是大逆不道的叛国罪。

西班牙的经验 人民阵线

但是在谈起西班牙战争和人民阵线的经验时，对本书的目的来说，我所关心的是指出阵线实质上是西班牙现实的产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具体形势的范例，尽管这种情况与国际指导方针的总路线是相一致的。即使国际指导方针是另一个样子，具体形势也会由于西班牙事变自身的辩证法将我们引向人民阵线。

这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的：必须结束对1934年10月运动的镇压，必须实行大赦、释放政治犯，必须废除非常法律、恢复共和法制，必须同法西斯主义开战。

这些是为了在选举上击败拒绝大赦、继续镇压的右派势力，而形成的名为人民阵线的选举联盟的主要迫切任务。人民阵线纲领中提出的社会权利要求是非常简单而有限的，现在看来，就连民主的右翼党派也会觉得是起码的。

正是这些原因：大赦，结束镇压，法西斯威胁，最终导致拉尔戈·卡瓦列罗及社会党左派（他们吸取了1931年到1933年在社会党和共和党政府中合作的经验，拒绝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达成任何协议）犹豫不决地接受了人民阵线，共和党人当然也参加了这一阵线。

毫无疑问，决定性地影响了工人政党不参加人民阵线政府的，

正是拉尔戈·卡瓦列罗及社会党左派拒绝同共和党人合作这件事；直到战争开始、马德里岌岌可危的时候，由于形势，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参加政府的要求。

如今可以问一下，工人政党不参加政府是不是一个错误；工人政党从一开始就参加人民阵线政府，是不是将会使政府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避免发生军事暴动，即或发生了暴动，坚决武装人民，在全西班牙取得象在马德里、巴伦西亚、巴塞罗那、巴斯克地区及其它地方获得的成功；防患于未然。可以问一下，果然如此的话，是不是就可避免三年内战和近四十年的独裁。

假使在法国和西班牙，工人阶级都直接参加了人民阵线政府的话，西班牙和欧洲的命运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了。当然，这种看法已经不能改变事物了，仅仅作为历史经验来提一下还是值得的。

一批作家、历史学家现在将西班牙战争及其一切事变，几乎都看成是苏联对外政策的简单反映，低估了一切民族特性，低估了上述经验中一切独到之处；反之，他们却企图在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尝试中搜寻革命的独创性，但这些尝试不仅没有提供任何新鲜东西，而且事实上还采用了那个时期的一些最为官僚主义的独裁的东西。面对着这么一批人，为了不致离题万里而言归正传，我想强调一下在我看来是那时最具有特性的东西。

远非佛朗哥主义所宣传炮制的关于赤匪和民族主义者、十字军和共产主义的神话那样，这些神话至今尚在我国某些社会集团中流传着，事实是，在共和国地区，虽然有着各种内部矛盾、不和，甚至冲突（这在战争时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这期间有如此之多的利害交织在一起，又施加着如此之多的外来压力），但那时人们经历过的多少有些缺陷的经验却是一种多元的、民主的经验，这同那些刻板的传统毫不相干，这同后来其它革命采取的形式亦不雷同。

当时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加里西亚一开头就被占领了）有

合法的政府、议会、民族自治机构、党派、工会、各种青年组织，还有新闻自由（在战争形势下这是很大的自由了）以及言论、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在共同承担战争重担中，有着非常活跃的对抗和竞争。各级都有大致是生气勃勃的直接民主的形式。

尽管关于战争还是革命，在当时任务中占有首位的问题上，有过某些空泛的争论，——而我仍然认为，当时即使要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首要的、必不可免的也还是要赢得战争；不幸的是，这一点由失败来作出了明白无误的证实，因为失败意味着反革命的胜利。的确这一多元的民主制度，往往是在对它比较不利的条件下，即内战和革命的条件下存在过的。

浏览一下当时的报刊，不戴有色眼镜，读一下这一政治团体或工会与那一政治团体或工会之间的争论，人们可以同意这一观点或那一观点，甚至可以谴责所有的观点；但是无论如何，都会承认那时所许可的极大的自由和真正的多元化。可以批评政府，批评党派，批评工会——事实上也是那样做的。关于如何指导战争问题，不同的见解公开进行了争论。

假使有什么能引起惊异的话，这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广泛的自由。是的，这种自由对那些手持武器的劲敌来说是不存在的；而我想不会有人批评这一点的，因为我们正处于激烈的内战之中。

官爵甚高之人很少做指导战争的工作。这是事实。可是，如果阿萨尼亚是一个思想家、文学家，而不是一个行动家，不是克雷孟梭那样的人，那又能怪谁呢？然而，象经历颇右的罗霍将军这类人物，象内格林（不管写了多少关于他的事，他还是个温和的人）这样的社会党人，反倒起了非常杰出的作用，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象他们那样的例子来。

有人曾企图把维护民主形式一事说成是苏联的需要；就苏联

的对外政策来说，最好是西班牙的情况不要过分激进。可是，这一见解并不全面。在经济、社会方面，激进得很难再激进了。在某些方面，激进得太幼稚了；我指的是对一些小企业和小农业实行社会化，这是一些组织自行其是，有时采用强制手段搞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这种过火行动，因为那是反社会、反经济的，那是同广泛动员人民群众以赢得战争背道面驰的；把决定性的经济杠杆掌握在政权手中，利用它来更有效地进行战争，主要的并非要使经济解体，而是要使城乡广大的小业主阶层都同共和国的事业联结起来一致起来，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同全民的利益一致的。

我这里并不想作什么历史评论，并不想抨击这些或那些组织，这并非我写这本书的意图。

当时，我们共产党人捍卫议会民主的共和国，捍卫各民族的代议制机构。这件事曾使我们招致许多左倾的批评。我们当时想到，如果维护这种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如果在各民族机构中，在市政中也采取这种形式，如果在企业中发展直接民主形式，让劳动者直接参加各级事务的领导，就能跨出走向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的开头几步。

有一封1937年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签署的写给拉尔戈·卡瓦列罗的信。信中说：

卡瓦列罗同志：

我们的全权代表罗森伯格同志已经向我们转达了您的友好致意。他还告诉我们，您一直持有必胜的信念。请允许我们对您的致意表示兄弟般的谢意并向您表示，我们同样确信西班牙人民一定会胜利。

我们认为，我们将继续认为，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领导着西班牙全体劳动者、所有民主力量为进行反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仆从法西斯军事匪帮而斗争的西班牙政府，是我们的责任。

西班牙革命开辟了在许多方面不同于俄国所走过的道路。这是由

不同的社会、历史和地理条件所决定的，是由不同于俄国革命时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需要所决定的。比起当年俄国来，议会道路在西班牙很可能成为更加有效的革命发展的进程。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我们的经验，特别是关于我国内战的那些经验，如果适当地应用于西班牙革命斗争的特殊条件，对西班牙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从这点出发，鉴于您的一再要求，罗森伯格同志已把您的要求及时地转告了我们，我们同意将一批军事专家交给您使用。我们给他们的指示是，在军事上做西班牙军官的顾问，他们应由您委派去帮助西班牙的军官。

他们受到了断然的告诫，在充分意识到现在西班牙人民和苏联各族人民之间是紧密团结的同时，切不可忘记，苏联专家是在西班牙的外国人，只有在严格履行顾问的职能、仅仅是顾问的职能的情况下，才能切实起到作用。

我们相信，您会这样来使用我们的军人同志的。

我们请求您从友谊考虑，通告我们，您委托给我们的军人同志的使命他们完成得如何；因为这很自然，只有您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作用的，他们留在西班牙方为适宜。

我们也请求您直接地、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您对罗森伯格同志的意见，西班牙政府对他满意不满意，要不要派别的代表去替换他。

我们提出四项友好的建议供您考虑：

1. 应该注意农民，他们在西班牙这样的农业国里是举足轻重的，希望能够颁布满足农民要求的有关土地的和财政的法令。还应该把农民吸引到军队里来，并在法西斯军队的后方成立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颁布对农民有利的法令可以使这一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2. 应该将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吸引到政府方面来，或者无论如何，得使他们能够采取有利于政府的中立态度，保护他们免遭没收，尽可能地保证贸易自由。否则，这些人就会追随法西斯主义者了。

3. 不应该将共和党的领导人拒之门外；相反地，应该吸引他们，接近他们，将他们团结到政府的共同努力上来。特别需要稳住阿萨尼亚及其集团对政府的支持，尽量帮助他们不要摇摆不定。这也是为了避免西班牙的敌人视共和国为共产党的共和国，从而防止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干涉，而这种干涉对西班牙共和国来说是最严重的危险。

4. 可以在适当时机在报刊上宣布西班牙政府将不容忍任何人侵犯在西班牙的外国人的，未支持叛乱的国家公民的财产及其合法的利益。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斯大林

莫洛托夫

伏罗希洛夫

1936年12月21日

虽然某些人将这一观点视为苏联党的权宜之计（从后来发生的或是我们认识到的事物来判断，他们是有道理的），但事实是，我们许多人都是极其严肃地看待这条道路的可能性的；这一可能性后来得到了苏共二十大的差不多是完全的确认；这一可能性也正符合我们民主地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

只有少数人记得在那炮火连天的时刻，共产党曾建议举行普选，以便使公民们选出他们的议会代表；可是这一建议遭到了其它党派的拒绝。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新的议会选举将破坏战前选出的议会所体现的合法性原则。也就是说，同人们提出的想象相反，我们共产党人关心更多的不是一个民主议会形式上的合法性，而是它的实际存在。对其它各级的直接民主也是这样。我们共产党人总是为民主选举企业委员会而斗争的。我们总是同不幸占统治地位的主张，同让这些委员会的组成由工会官僚分子从上面指派的主张直接对立的。

可是在战争期间及在战后，我们共产党人受到了批评，说我们温和；因为我们保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党派参加政府的权利，至少在政治生活中享受充分的权利；因为我们坚持捍卫中、小业主；因为我们在能恢复的地方都恢复了宗教活动；因为我们反对那些同官方警察并存的各党派或组织的形形色色的警察；因为我们

坚持司法必须要由法官以合法的形式来进行。假使某个时候，我们队伍里在这一见解上出现了偏差，我们将与之斗争，毫不犹豫地予以纠正。同样，从第一天起，我们就捍卫单一的国家军队的存在，这支军队接受统一指挥，服从政府，取代集团的民兵；我们坚持广泛利用职业军人的力量，而且如果说有这么多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军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那是因为他们在我们党内看到了尊敬、组织精神，看到了在其它党里不那么觉察得到的民主国家的观念。

我们从人民中获得的力量并非来自用以保卫共和国的武器几乎全是苏联武器这一事实（后来其它国家曾用比我们的武器更精良、效力更高的苏联武器保卫自己，而共产党并未因此有所壮大），而是来自这个一贯的政策（对某些人来说，是温和的），这项政策比其它政策更好地表达了我们的地区最为普遍的感情。因为在这些政治指导方针上的温和是伴之以各条战线上的自我牺牲的决心、战斗精神和纪律的；这些也就使最高统帅部（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在进行最大胆的攻击和付出最高代价的决定性的防守中，特别喜欢使用由共产党人组成的连队，众所周知，这些连队是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条件下进行战斗的。

共产党员在战争期间担任了许多职务，这是我们有时受到批评的一个方面。但被忽略了的一点是，没有指出这些职务是在军队里担任的，是在战斗中晋升的。政府中最多有过两名共产党人部长——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和党人占有更多的部长职位。一个时期里，只有一名部长是共产党员，就是维森特·乌里维担任的农业部长。在那些高级行政职务上，我们共产党人也比其它党派拥有的职位少得多；假使我没弄错的话，在外交方面、在外国采购的任务中，我们的人一个也没有。

同样被忽略的一点是，共产党在某个时期曾准备放弃拥有的

很少的部长职位，从外面来支持政府，这样政府就便于同西方列强打交道，其目的是结束几乎全部依赖苏联供应的状况；如果说已经作出的这一决定未曾付之实行，那是因为某些盟友认为，这种做法将会对共和国战士们的斗志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也就是说，共产党是将人民的事业、共和国的事业置于其它考虑之上的。可能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会有局部地方、个别人破坏这一行动准则的；但一经发觉就已采取了补救措施。

就是在第一次抵制竭力以“体面的和平”的外衣掩盖着的投降企图（后来生活表明，更确切地说，许多人的死亡，表明了那是徒劳的）之后发生了卡萨多政变的时候，党也还是努力同政府达成协议，以便至少可以进行有组织的撤退，挽救军队和在悲惨的状况下受煎熬的、属于各个不同组织的成千上万名干部。

我提到这一切，是为了表明，虽然有时在某些带普遍性的理论提法与具体实践之间存在着差异，虽然我们最初的思想体系中有许多成分可能是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论述有矛盾，但对我们具体的政治实践作一严肃认真的分析，对这一实践作一上升到理论的阐述（这一工作至今几乎尚未着手进行），将大大证明我们现在的立场是扎根于那个实践的。

不幸的是，在传统上，理论不是西班牙工人运动擅长的东西。象贝斯泰罗和阿拉基斯坦这样的人，在某些时候都可以毫无理由地算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一点就是证明；也许这就是“瞎子国里独眼为王”的道理吧。而现在我们队伍里已经有了一支理论力量，他们本来可以澄清历史，但是分散的地下活动，紧迫的目前任务，以及在一大堆虚假的、已被歪曲的、主观臆断的材料里大海捞针，使得这项把过去所有实践进行认真的理论概括的工作仍然显得困难。

总之，尽管我们是凭革命的直觉，而不是靠深刻的理论分析和

详细阐述，我们在人民阵线时期的政策已经初步具有走向拥有民主、多党制、议会和给反对派以自由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在这种意义或那种意义上说来，曾有过过火行动（的确有过）。这些过火行动在正常的民主状况下是不可想象的。过火行动的理由应该到右派所发动的内战的激怒中去寻找，因为内战把祖祖辈辈遭受压迫和剥削而造成的深深的创伤激化了。因此，我们现在不仅是从对今天具体现实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中，而且是在自身的矛盾生活经历的特性之中，得出我们为了我国而维护的民主社会主义的论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共产党的经验

但是，如果说目前方针所依据的许多基本因素是存在于过去的政治态度中的活（我讲的是西班牙的情况），任何一个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共产党的经验进行研究的人都将看到，这些共产党是使它们的活动同民主的方式一致的，而且任何时候都未曾违背这些民主的方式。1945年，除了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共产党外，共产党参加到所有的政府里当了部长。这并不是因为苏联与西欧强国间存在着反希特勒联盟，尽管这一联盟有助于这些党进入政府；而是因为在欧洲武装抗击希特勒期间，共产党人冲锋在前（就象每次为争取自由而斗争过的那样）并且在各国取得胜利的军队中间赢得了杰出的地位。1945年到1947年是民主在本大陆巨大发展的年代。1947年冷战开始，产生了一个新的力量对比，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在美国的庇护下结成了反对共产党人的联盟。共产党人退出政府，成为反对党，没有一个西方国家里的共产党人想用武力维护他们在政府中失去的地位。有人会说，这种态度是同大国在雅尔塔划分的势力范围相一致的。但事实是，当时希腊正进行着激烈的内战，共产党人拿起

武器进行战斗，反对美国人支持当时的政权。显然，在雅尔塔会议上，希腊被划到了西方一边。在象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共产党人是很强大的，而且如果党号召共产党人拿出埋藏着的武器进行抵抗的话，则一定会奋起而投入战斗的。也许他们可能被打败，但是却会使统治者很不安宁。然而他们却宁愿搞民主运动。他们继续执行在当时看来好象是乌托邦的团结和民主的战略。通过一段漫长的经历，他们制订了自己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于很多人来说，用这样或那样的词句，或者用其它兄弟党的行动来判断欧洲共产党人，比起用一条内容至为丰富、非常宽广而曲折的道路来判断，要便利得多。

在开拓新路的过程中，最艰辛的是取得对苏联的自主。尽管共产国际解散了，联结欧洲共产党人和苏联的传统纽带，战后却一直保持着。理由之一，是由于苏联自从卓绝地、决定性地参加击败希特勒的战争以来，苏联的威望在全世界极大地提高了。

在冷战期间，不仅对共产党人而且对许多仅仅是进步的人士来说，冷战犹如帝国主义企图再次用火与血扼杀社会主义成果。福斯特·杜勒斯之流的理论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当时由于美国的核优势占压倒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人会轻易地想同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断绝亲密关系。

但是，至少对于某些共产党（当然包括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共产国际的解散已经明显地改变了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的类型。我不记得，自从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我党曾预先同苏共协商过任何一次转折、任何一次重要的政治决定；如果可能在某些时机、毋宁说是偶然的机会会有过这种事情的话，那是因为正好我们由于其它原因（那里有我们的移民）去苏联，我们乘机事后告诉他们的。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本身，使我们感到突然。它没有使我们感到丝毫愉快，尽管我们没有把这一点公诸于众。那一步骤意味

着什么？那个甚至根本没有同我们商量过的最高法院，想要起什么作用呢？

有一个证据，揭示了同苏共的关系事实上已发生了变化。那是在共产党情报局谴责南斯拉夫的前一个月，我们的一个代表团正在贝尔格莱德同铁托同志讨论问题。当时我们一刻也没有想到，要事先向莫斯科征求意见，也没有觉察到即将发生的冲突。

但是，变化尚未大到足以阻止我们犯支持共产党情报局谴责南斯拉夫的不可宽恕的错误，而且这种谴责是在没有通知也没有同其它党商量之下进行的，使我们处在必须拒绝或者接受的尴尬境地。你要是拒绝了它，你也就要被开除教籍。那个时期动辄被革出教门，而我认为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准备冒被开除的危险。不管怎样，那些采取主动创建共产党情报局的人，利用共产党情报局确立了一种独特的国际主义，而我们绝大部分共产党在其中仅仅成了纯粹的配角。这种“国际主义”使我们大家想起现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它使部分（不是全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享有特权，而且实际上，不管以什么形式加以否认，它试图不顾一切地维护一个世界中心的存在。

简而言之，对我们来说，在最初的一个时期里，共产国际的解散意味着一种分工：“我们管我们西班牙的事情，在这个范围内行使我们的主权。世界的事情由苏联同志来管，他们才是有经验，有情报并负有更大国际责任的。”只是到后来，我们才发觉为了有利于分析和解决西班牙的问题，我们也必须管世界的事情，包括社会主义世界的事情。

对于我们，对于西班牙共产党，我们取得独立的顶点是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这一行动的准备工作是用同苏共二十大上揭露的1936年的历史事件相类似的方法进行的，或者说，是用同谴责南斯拉夫相类似的方法进行的。这就是说，作了一种绝对的

断言（这次是说捷克斯洛伐克即将落到资本主义手里），并基于这种断言，对其行动提出了与事实相距之远堪以光年衡量的说法，企图使我们轻信。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是不能再容忍的事了。它使我们党说出了：否！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国际主义”已经结束了。我们所说的“老国际主义”指的就是这个；我们相信，应该结束了。真正的国际主义是另一回事，必须是另一回事。

我知道，我这样写（因为关在房间里这样讲的话那现在所有的人都这样做了）会引起误解，遭到谴责；但却必须这样做。为什么我们不习惯于讲真话呢？只要讲真话，我们大家都会有好处，能奠定真正的和健康的国际主义的基础。

此外，如果我这样写，那是为了证明我们党——像我们这样的其它党也一样——是通过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变化着的情况而确立它今天正在捍卫和发展的概念的；也是为了断定那些怀疑我们民主立场的可靠性的人，并没有对我们的道路进行过研究，或者是出于狭隘的党派原因，他们对于研究我们的道路不感兴趣。

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

是的，我们共产党人确实已经把过去当作信条的论点和公式加以修正了。

因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漫长岁月帮助我们更加看清了民主的真正价值；真正的价值，而且我再加上一句是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们已经克服了对所谓形式上的自由的某种低估，早已把它抛得远远的了。帝国主义的凶残和它在一切领域里的明显衰败，使我们更加感到自由和民主的珍贵。同时，我们毫无偏见地看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民主的弱点，而且我们更加严厉地谴责了对民主的歪曲和践踏。过去我们把这种歪曲和践踏归罪于某种理

由，这些理由使得我们对这种歪曲和践踏尚可容忍，甚至使我们在阶级对手面前勇敢地为之辩解。

但是，我们决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阶级斗争的观念、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要消灭帝国主义的世界性的革命进程的思想。这一进程不能理解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失败，而是一种社会制度的失败，这种社会制度对所有国家，包括对那些历史使他们利用这个工具达到了很高生活水平并对其他国家称霸的国家，都是日益有害的。各国人民应该用自己的斗争来夺取对不合理制度的胜利。

我坚持这一点，因为有些人看到我们立场有改变，问我们是否正在退回到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立场上去，甚至于在我们运动内部也不乏对这方面的若隐若现的指责。

我们不是正在回到社会民主主义方面去！首先，因为我们绝对没有排除革命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如果统治阶级封闭民主的道路，并且出现有可能采用革命的方式的机会的话。当我们具体地观察西班牙目前形势时，我们这些意识到它的复杂性的共产党人以完全负责的态度断言，今天不开展暴力运动，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是可能的。这是一个不会轻易再现的历史时机。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确信，在民主中能够开辟通往新型社会主义的途径。这个新型社会主义维护并扩大自由，不否定打算在选举运动中和代议制机构范围内进行战斗的反对党的自由。

但是，暴力作为历史的产婆的作用问题，作为理论问题，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发明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从战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自身经验中，从阶级斗争的全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对这个问题有必要更为广泛地加以阐明。

难道说，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提出在民主中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就是在否定这一经验和我们的导师的理论定

义,就是把自己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等同起来了吗?

当然不是。暴力产生了资产阶级秩序。没有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没有英国1688年的“光荣的革命”,没有美国的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在把资产阶级权利扩展到各个领域时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从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飞跃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飞跃体现了历史性的巨大前进。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范例,毫无疑问是法国大革命。它彻底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里给别的国家灌输了它的思想。正如历史学家乔治·路德在提到1789年的影响时所写的: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旧秩序的欧洲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以致于在1815年拿破仑时代和革命时代行将结束时,东至俄国和土耳其,南至比利牛斯山,没有在其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中经历深刻变革的国家是罕见的。在看到了这些结果和革命以前发生的事件时,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法国革命不是一种唯一的和个别的现象,而是一场广泛得多的动乱的真正阶段,这一动乱被称之为‘西方革命’、‘大西洋革命’或‘世界革命’。”

路德本人不同意给法国革命赋予这些通称。但是这场革命,无疑照亮了在条件更加成熟,可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阶段;而且是得到了最为不容置疑的影响和共鸣的革命。1848年以前,法国大革命一直用它的思想和目标,鼓舞着资产阶级进行的各种革命。但是,到1848年,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带着它自己的革命要求,出现在斗争舞台上;从那时起,革命的暴力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普遍地成了最卑劣的罪行。因此,托克维尔认为,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合乎逻辑的;并且给我们今天的某些改革家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见解,例如:“往往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人民毫无怨言地、一似没有知觉地忍受最残酷的法律的迫害,一旦减轻了压力,便猛烈地砸烂这些法律。在法国

封建主义政权全盛时期，它并未像它在灭亡前那样引起法国人如此大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好象比路易十四的全部暴政更难于忍受。”托克维尔后来在1848年1月27日的一次讲演中说：

“请注意这些在目前平静的——我承认这一点——工人阶级内部所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的事实是，他们不象从前那样为仅是政治感情而激动了。但是，你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政治热情已经变成社会的热情了吗？你们没有发现，在他们内部逐渐传播着这样的意见和主张，这些意见和主张不是想要推翻某些法律、某一个部长、某一个政府，而是要推翻社会本身，砸碎今天社会所依存的基础吗？难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在他们内部逐渐地断言，迄今世界上所实行的财富分配是不合理的吗？所有制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前提上的吗？你们不认为当这种思想深深地渗入群众之中，迟早会引起最可怕的革命吗？”

“最可怕的革命”在1870年普鲁士人包围的巴黎废墟的背后露出了它的面孔；那就是公社，第一个劳动者的政权。在这之前普鲁士的老爷们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还是不可调和的对手，此时则联合起来反对它，用炮弹和火镇压它。

然而，公社已经扎下了深根，无产阶级革命终究在历史上出现了，尽管时间短促，立足未稳。被剥削阶级已经接受了一次教训：即在一定的条件下，为了自身的解放和结束压迫政权的暴力，被剥削阶级的革命暴力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如同资产阶级在它还是革命的阶级时使用暴力来砸碎封建社会一样，无产阶级必须用它来结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过渡到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思想同革命暴力的思想联系起来。而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他们是有道理的。不使用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管它经历了什么波折，这场革命对社会主义胜利的意义，相当或大于法国大革命对当时资产阶级胜利的意义。十月起义，内战，抗击

希特勒战争中苏联人民的作用，这都是俄国劳动者所做的牺牲，它为后来的革命，为非殖民化和许多国家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的解放，为打败法西斯主义和保卫民主开辟了道路。当然，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没有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他们的胜利是可能的吗？如果没有革命的暴力，他们能获得胜利吗？

如果没有这个先例，也包括其它因素，难道我们能够自己提出通过一条民主的途径，扩大和发展民主自由，向新型的社会主义前进吗？

曾任第二国际主席并如此严厉地批评了俄国革命的艾米里奥·王德威尔得写道（不幸我手头没有原文，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它的大意），西欧工人阶级的许多社会和政治成果之所以取得，是由于俄国革命的胜利在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里产生了影响。

因此，虽然在现在条件下，我们不承认“对苏联的态度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这一定理（不管这个已过时的原则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却不能不把世界上已经发展的进步变化，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不能不把这一胜利，看作是将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变革的起点。

为了粉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革命暴力阶段是不可缺少的，就象资产阶级为打碎封建制度那样。当考茨基还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的意见在工人革命运动中还有权威的时候，他嘲笑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他们来说，我们所要朝之前进的社会革命，似乎不过是一场几乎感觉不到然而深刻的缓慢的社会条件的变革，一场类似蒸汽机所产生的那样的变革”。（《取得政权的道路》）

俄国共产党人在 1917 年除了夺取政权没有别的选择

不错，当时存在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意见是，革命首先在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这是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和工作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现代无产阶级作为这样一个阶级，主要存在于西欧国家和美国。虽然，很久以来就有了殖民地和殖民剥削，但帝国主义作为现代制度尚未形成。很难想象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其它国家而不是在上述国家取得胜利。从这个前提出发，有一个时期，被普遍接受的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具有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条件。”（《取得政权的道路》）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达到怎样的具体发展程度，才算是足够的高度呢？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定要精确地与物质基础处于最有利的时刻同时发生吗？历史上的事情，能够进行得如此理想吗？或者相反，1917年10月夺取政权——某些只有书本知识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成是历史的异常的事件——，不是更有偶然的、时机的因素，更有无足轻重的而在历史上往往占压倒优势的因素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表明，他们看待这一问题的方式比他们的某些追随者更加灵活得多。在《共产党宣言》里他们这样写道：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注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①

我手头没有关于1848年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准确材料；但是很明显，它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至可以进行无产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革命，而不需要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支持，而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指望着小资产阶级阶层的。

事实是，在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迅速变革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错了。在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法国，尽管工人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旗帜，竖立在街垒上了，但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和旧政权的残余之间的妥协，导致了工人的失败。

但是，甚至在那些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没有发生革命的英国除外）在生产资料实际发展的情况下，一场社会主义革命难道不也成了明显的历史的异常吗？当时无产阶级在本大陆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占人口的大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明显的理由，没有能象后来列宁那样对帝国主义制度进行研究，当然就未能看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一定发展阶段上各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里写道，恩格斯和倍倍尔：

“……却基于1789年至1871年这一期间，即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经验，仍然对新的革命的迅速到来怀抱着希望。当然，他们所希望的，还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的领导权，由于无产阶级业已增长的重要性，必将由无产阶级担当起来。”

后来，在对于那种认为革命比事实情况更加迫近的上述看法，作了某些批评之后，恩格斯仍然认为，革命可能不按“历史时间表”而生存下去。关于这方面，考茨基本人讲道：

“1891年恩格斯还在想，一场战争对于我们将是一次不幸，因为它将孕育着一场革命并将使我们过早地取得政权。他认为，在一段时间里，无产阶级利用现存的政治制度，比冒险进行战争引起的一场革命，更能取得积极的进步。”

考茨基没有指明他对恩格斯的意见所依据的具体出处，而现

在我手边也无寻出具体出处的可能。但是，尽管 1891 年恩格斯实际上是想最好等待革命物质上更加成熟的时机，但根据考茨基所述来推断，恩格斯认为战争孕育着一场革命，而且无产阶级应该掌握政权，尽管为时尚早。

有趣的是，考茨基——可能在著名的理论家中，他是最坚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高度发达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就恩格斯的这个意见著述时（据他说，是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的时刻——1909 年写的）写道：

“无产阶级现在已经强大到可以更加平静地对待战争了。既然无产阶级已经从现在政治制度吸取了它所能从那里吸取的全部力量……那么就不能再说什么为时尚早的革命了。”

后来，在 1918 年，俄国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沙皇制度倾覆的条件下已经夺得政权的时候，考茨基却又批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这样，他的言行就自相矛盾，并与恩格斯的说法发生了矛盾。

就是说，虽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和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对实现社会主义是巨大的障碍（列宁和全体布尔什维克都承认这种障碍），当 1917 年列宁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并夺取政权时，他是在做着这样的事情，这件事的情况和危险，恩格斯早已预见到了，但列宁并未因此而放弃这件事。

可以对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和它在客观上带有的风险加以讨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俄国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只能夺取政权，并且无论能否得到欧洲革命的支持，力图奠定一个新社会的基础。

曾一度在理论上依赖于考茨基的社会民主党人，没有理由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他们已经站到了本国的资

产阶级一边，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国际的理想，并且，还继续走着同一条老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反对十月革命。我们共产党人捍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视之为通往没有被剥削者和剥削者、平等和友爱的新的国际社会的起点；而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如果确实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话，却很难捍卫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思想。

六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最后谈一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为数不少的西方共产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再使用这个概念了。

因为本世纪有过最可恶的法西斯的反动专政，如：佛朗哥专政，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这是败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现象），有过带着某种特色的极权主义弊病，因而专政这个词本身已变得令人憎恨，这就是人们在政治上不再使用这个词的充分理由。

但是，如果我们只讲这一点，我们的对手就有理由指控我们在别有用心地、肤浅地搞策略主义，或者指控我们简直是回到了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当然这是有着更为重要、更为深刻的理由的。应该承认，总的来说理由已经有人摆出来了，但据我所知，却从来没有用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作过充分的解释。我应当承认，当我企图论述这个问题时，问题之大使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我决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理论家，我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工作者。正因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工作者，在谈论一个在我看来主要不是值得谈而是应该谈的政治观点时，如果不打算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论证，那我是不能感到安心和宽慰的。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没有怎么探讨过的问题，容易出错，更不用说有人存心要用我的思想故弄玄虚，歪曲捏造，不仅想以此来败坏我的名声，而且想使凡对教条不持保守主义的态度之人声名狼藉。有人把教条奉为神明，来为自己的固步自封辩解，在我们之中也有固步自封的人。

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已提到日程,工作认真、比我更有知识的人可能发现我犯的~~错误~~,我对这方面的一切批评都表示欢迎,现在我就诚恳地承认,有许多批评可能是有道理的。尽管我也有想在这本书中论述西班牙共产党的战略的意图,但我写这本书只是发表我个人的意见,由我个人负责。

在共产党领导人之间,无疑地是陶里亚蒂开始较深地论述这些问题的。他曾强调指出,要制订具有自己历史特色的通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除了实际的政治行动外,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理论研究工作。

首先,我想说明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地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汇的次数很少,但有的人把它几乎说成是写作中偶然出现的,是什么无关紧要的偶然提法,这种改良主义的意见是不能得到人们赞同的。从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里就可得出这种意见。书中讥讽地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字眼马克思在1875年一封信中用过一次”。

考茨基本人几年前在他《取得政权的道路》一书中所说的正好相反,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说: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恩格斯在1891年,即逝世前不久,还极力维护这个定义,肯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独裁是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的唯一形式。”

一些人包括后来考茨基本人在内,企图说列宁是用一个“字眼”来建立一整套概念,这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国家

路易·阿尔杜赛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时把它说成是“描述性”的,他用这个词想说明这是理论的开端,是告诉我们理论

“本质”的开端，但理论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本身也是发展的，他们是在步步向前之中阐述自己的学说的，尽管许多本质的论点在开始时就已确立了，我认为这是事实。然而，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国家所起的作用日益广泛和复杂，这也是事实。

黑格尔把普鲁士的君主制理想化，把国家看成是“道德思想的现实”，是“现实和理性的形象”。我并不打算从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最初著作中对马克思的事业进行仔细的、专门的研究，马克思固然是在维护政治民主，但确实已经谈及国家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国家的一般作用的主要特点。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中写道：

“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一种方式，即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①因此，君主制和民主制两者的特点都是政体，但在君主制中(古代制度的)，政体是不定型的(例如，可想一想颁布了些什么章程)，因而作为它的决定使人民——真正的整体——服从于它(因此，人民的选举是非实质性的)；在民主制(在每个完全是世俗和人间的国家)，政体作为人民的一种决定，作为人民生活和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从属于人民。而人民则是真正的统治者，是真正的整体。”

西班牙的某些政治家好象是在“古老的制度”君主制即前资产阶级制度里行事一样，他们似乎认为恩赐的制度将满足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在这种时候，约在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在1843年对这一形式和民主制所作的区分是很值得注意的。

^① 上述语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下述语录没有找到出处，系自译。——译者

为了便于考虑后面提出的一些论断，也应该注意到马克思在同一篇著作提出的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制度不再是纯政治性的这一想法。我认为应该根据马克思后来关于国家将在无阶级社会里消亡的意见和在《共产党宣言》中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两者结合起来的看法来加以解释。也可以把这一看法同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将建立一个民主的国家，并在这个国家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①这一看法联系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场合曾严肃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甚至在谈到民主时还强调了这一批判，至少在他们写《共产党宣言》之前没有把工人的权利和民主等同起来——尽管没有深入地阐述。我认为，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在于：从1848年革命起，资产阶级力图在民主这个概念中去掉包含革命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内容，并开始利用民主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愿望，甚至把民主作为它同旧制度残余调和的掩护。这是由于资产阶级处于这样的历史时刻：无产阶级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了，开始打破资产阶级对它的控制，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要求强调阶级的区分，特别是要强调所有制和国家政权内容的问题，强调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资产阶级玩弄“民主”以维护剥削和替剥削辩护的行径，进行不调和的、彻底的斗争。

总之，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十分清楚地揭示了国家的真正含义：

“在北美，财产等等，即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同普鲁士的完全一样，只不过略有改变而已。所以，那里的共和制同这里的君主制一样，都只是一种国家形式。”^②

^① 这段语录未找到出处，系自译。——译者

^②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他坚持国家的本质：

“政治解放的限度首先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①

在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现代民主国家是：

“……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②

但看来是《共产党宣言》(1848年)第一次更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国家，一切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来改造社会；国家将随着工人的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阶级的消失而消失、灭亡。

《共产党宣言》说：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③

《共产党宣言》已经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这一学说总的说来，对于共产党人和对于一切想通过和平方式真正地

①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273页。

变革目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党人说来，今天仍继续有效。

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里，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在社会中实行领导的工具，是使一个阶级起统治作用的工具。甚至在那些有较多自由权利的国家里，国家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法西斯的经验教训（我们西班牙人长时间亲身经受过）说明关于国家的最极端的、最不能容忍的、最令人厌恶的一个方面。在法西斯统治下，专断是没有限度的。罪行、拷打、对反对派肉体上的摧残、取消那些严格地说不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及社会集团的一切积极作用、腐败和偷盗、对文化的轻视和诋毁、没有任何伦理和道德的准则，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规律。法西斯主义则是垄断资本有时同社会上遗留下来的半封建残余结成联盟进行阶级统治的最可恶的形式。

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我们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士认识到，尽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民主权利有种种局限性和约束，但民主权利是有其不能低估的现实价值的。

也许由于我们有这么一段不幸的经历，我们就更明白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历史性的创造，而我们以前一心想要首先脱离“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立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思想来加以反对之时，正是这样思考的。

应该说，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也使我们人们对人们称作“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体制之蜕变及其各种后果，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使我们对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的那种东西有很大的保留。

事实上，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的民主，总是先于资产阶级而存在的，它将在阶级社会告终，国家消亡，社会主义时期……之后仍继续存在。甚至在共产主义时期，即在所有人都积极参与社会管理这个意义上的民主仍将具有不可放弃的价值，或者谈得更确切

一些,它将得到更完全和彻底的实现。

资产阶级革命(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革命)必须把民主的要求写进它的纲领中去,因为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劳动阶级的支持,没有社会最下层阶层的支持,便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封建统治。如果没有各种自由的吸引,人民就不会为资产阶级上台去斗争了。这同资产阶级为了自己在社会上获得发展并在一段时期内维护它的政权而需要某些自由并不矛盾。

但是,我们不能无视民主的自由权是最进步的人民力量对资产阶级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现代史上总是人民(为首的是工人)更多地为自由而斗争,他们常常为自由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其它著作中把“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同“争得民主”当作一回事也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疏忽。

下面还要谈论这个问题,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甚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社会,国家确实“是一个阶级有组织的暴力”。我们可以拿任何一个西欧国家作为例子(美国就不用说了!),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当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提出新的社会、经济或政治要求时,他们同什么相冲突呢?他们同一系列旨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统治阶级特权、维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法典、法律相冲突,这些法典、法律可以用来关押和判决企图进行变革的人;他们同维护那些特权的一整套国家官僚机构冲突;最后,同装备越来越精密、人员越来越训练有素、用来镇压任何对抗企图的公安部门相冲突。

此外,国家政权还拥有强大的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来限制和缩小基本的权利。例如,当一个政府任意地划分选区企图改变大选的实际结果时,看来政府并没有使用暴力,只是动一动国家行政

区，但实际上，它是在粗暴地损害广大公民通过民主方式，在代议制机构里拥有自己的代表的权利。当电台和电视台按当局的方向向每个家庭播送新闻和宣传时，表面上看来也没有作出任何暴力的行动，实际上是在给几百万人的脑子开刀，使他们失去自由思考和自己拿主意的可能。

国家对贷款的分配（谁会想到这里面会有暴力呢？）是一种剥夺一些人有利于另一些人的形式，有时还能使一些人破产和落得凄惨境地，同时又使少数垄断资本集团享有特权。事实上，反对国家诸如此类决定的斗争（这些斗争我们不仅在一系列的工人冲突中，而且在影响到农民和小生产者的其它冲突中都可看到），有时甚至还不能排除会发生流血的暴力。

在最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更有甚者，在现代，多国公司和帝国主义列强建立了种种庞大的秘密的机构，使用种种武器进行犯罪活动和收买活动，暗中干涉别国事务，反对民主和解放运动，反对那些只不过想捍卫本国国家主权的政府，虽然很难肯定揭露出来的有关中央情报局的情况都反映了它真正的活动；但从其中很小一部分活动中已足以看出现代化的国家机器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使用暴力。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和在印度支那其他的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就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例子；可以从中看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自认为不仅有权使用暴力反对本国的被压迫阶级，而且有权奴役和剥削其它整个国家的全体人民，这同一切殖民帝国不久前的所作所为是一样的。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的概念，总的说来，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在劳动者还没有压倒垄断资本上升到社会领导力量的地位并为所有自食其力的人服务的情况下，不夺取政权，就无法考虑改造

社会。

问题是要断定，不改变民主的尺度，而改变传统的民主机构的内容，用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政治民主的新形式使这些机构更为完善，这是不是有可能。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其它共产党肯定这是可能的。认为劳动者会在这种形式下取得领导权还没有任何先例的那种论点，是没有任何科学价值的。认为事物总是一成不变的看法，是教条的和保守的观点，并已多次为历史所驳斥。事物没有什么理由非得总是一样，尽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事物曾经是一样的，但归根到底，事物并不总是一样的。

为什么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

那么，我们如何对待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呢？为什么会出·现·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所·强·调·的·他·的·一·个·重·要·发·现·的·这·一·概·念·呢？

提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能否不靠无产阶级专政，亦即并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取消业已失败的阶级及其支持者的政治权利，便可确立他们的领导地位？

我认为，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个时代，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能在发生革命危机时掌握政权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在多数国家里，无产阶级都能这样）只是居民中的少数，他们只能依靠武装力量夺取政权，用武力即用专政来保住政权以便着手改革社会。

1917年俄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很集中，是世界上最·有·觉·悟·最·革·命·的·，·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是·处·在·以·农·民·为·主·的·“·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

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不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社会统治地位简单的同义词。专政这个概念曾是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无产阶级社会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手段。马克

思、恩格斯和列宁是明白这一实际情况的。

但是，在欧洲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国家内，劳动者今天已居社会的大多数；思想影响巨大、人数众多的文化力量正在接近工人阶级立场。显然，这种形势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必需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巴黎公社之后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当时有了一次具体的经验为依据并且看来也是注意到了历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教训，即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建立了它的专政并且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恐怖。

恩格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写了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的一段话：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①

马克思在《政治冷淡主义》一文中也谈到了巴黎公社：

“……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形式。”^②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今天存在着另外的道路和另外的方式来建立劳动者在社会中的领导权和掌握政权，并没有背叛这一理论的遗训。

今天，当我们读到列宁同考茨基的论战——《无产阶级革命和

^① 恩格斯：《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② 马克思：《政治冷淡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5—556页。

叛徒考茨基》时，毫无疑问，我们是坚决赞同列宁的主张的。

不能否认在考茨基的著作中有一些抽象的、一般的论断，如果不考虑当时的背景的话，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似乎也谈了民主对无产阶级的意义以及发展资本主义对形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性。

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本书是1918年在维也纳出版的，当时协约国列强正在进行干涉，俄国正在进行全面的内战，整个欧洲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危机之中，一些君主政体崩溃了，起义和混乱震撼大陆。在这种具体的时代背景下，显然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首先是替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倒向本国资产阶级一边反对革命风暴的背叛行为作巧妙的辩护。而考茨基本人在1909年却断言说“在德国和英国这样的工业国家里，无产阶级从今天起将有力量去夺取政权。当然，经济条件将允许无产阶级利用政权以社会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他还说“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而战争就是革命……已不再是一次早熟的革命了……”。列宁称考茨基为叛徒是多么有道理呀！如果考茨基的思想前后一贯的话，他就应当去找欧洲社会民主党算帐，而不应当找俄国的共产党人这么干，因为他们确实在进行革命，并期待着发达的欧洲工人阶级给予支援。

在1917年的俄国并不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或民主中作出抉择，当时是要在回到专制的军事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作出抉择。如果发生专制的军事专政，其残暴的血洗定会使对巴黎公社进行镇压的凡尔赛人自叹不如。有力量的不是制宪会议，反革命军人可以象布尔什维克一样或比他们更轻易地解散它。有力量的一方面是苏维埃，另一方面是沙皇的将军。这就是抉择，两者之间必择其一。

但是，考茨基却不顾这一现实，提出民主与专政的矛盾，好象

他在另一个星球上。

对考茨基来说，布尔什维克与其它集团的对抗只不过是议会斗争而已，似乎俄国并没有在进行残酷的殊死的战争，似乎那些集团并没有同反革命分子和协约国进行勾结，没有参加反革命分子组成的地方政府，也没有在这些地区参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当时这一切都在发生，全国处在饥饿和破坏情况之中。

“为什么民主对于实现社会主义来说是一种不中用的手段呢？”考茨基问道，似乎俄国存在民主，似乎1917年7月克伦斯基的“民主”政府没有在最后时刻为共产党人所拯救。这些共产党人从克伦斯基关押他们的监狱里出来，拿起武器，率领彼得堡的工人打败了科尔尼洛夫将军。

考茨基多次自相矛盾。他说“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意志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条件”。但他又说“这种意志是由大企业所造成的”。他坚持认为“这种意志首先在大企业很发达的地方的群众中出现”，“社会主义是从城市和工业里产生的，不是从农业里产生的”。面对能够在群众中间培养实现社会主义意志的工人的政党，他却只字不提。他的话说得很漂亮，表面看来很科学。

但是，考茨基忘记了历史常常本末倒置。帝国主义尽管是一个统一的体系，但仍包含着革命可以从其最薄弱环节予以突破的许多矛盾。正是在俄国，事情的发展同书本上的预见有点相反：无产阶级首先夺取了政权，然后再建设大企业。在中国，农村（当然是受工人先锋队领导的）包围并夺取了城市。在南斯拉夫和古巴，还有越南，除开一切不同之外，情况也差不多。

社会主义首先是在农业占优势的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因为革命先锋队善于把阶级矛盾同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结合起来。可能有人会把这看成是历史上的异常现象。然而可以肯定，如果社会主义首先是在发达的国家中胜利，整个人类就会更加具

体、更受吸引、更早一些享受到社会主义的成果。已经发生的缺点、反常、甚至变质，将来可能不会再有，虽然我们还不清楚是否能避免其他情况——恩格斯本人在考虑胜利可能在发达的国家首先到来时，也曾估计到某些可能发生的情况。

迄今为止，在劳动者结束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一切国家里，都是在帝国主义挑起的毁灭性战争之后，通过武装斗争实现革命的。这些国家（除捷克外）从未有过民主，有的国家刚从殖民主义、甚至刚从亚洲的封建主义制度下摆脱出来。发达国家的某些知名人士，对于这种与其说是历史的分娩，不如说是历史的流产的情况，都感到谨慎的绝望。然而却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但是，既然历史的发展已经如此，并未遵循坐在小房间里制订的计划发展，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我毫不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如同革命暴力一样，是历史的不可避免的需要。我还要说，象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工具，在一些不发达的国家可能仍是需要的，因为这些国家里所以发生革命，往往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或者是为了对付随时都会陷入危机、同社会的大多数人对立并拒绝退出历史舞台的恐怖与暴力的政府。

然而，我确信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劳动力量建立和巩固领导权的途径。其原因我已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做了解释。我确信，在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归根结底不仅是民主的扩大和发展以及对社会一切极权概念的否定，而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实行民主，发挥其一切效果的道路。

在这里，我冒着被指控为异端的危险而确信列宁下面的这段话只有一半道理：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0页。

说只有一半道理，是因为今天我们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各种政治形式的实质是劳动者的领导权，而“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也包含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必不可少的可能性。

这场争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并非新事。假如我没记错的话，在1846年和47年，在很高级的范围内（当时大部分共产党没有参加），至少是对于当时是多党制的人民民主国家能否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交换过意见。我们这个运动内的某些人说，季米特洛夫赞成这一理论，而斯大林是反对的。实际情况是，在一个时期里谁也没有把人民民主国家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后来开始有人把人民民主国家说成是“起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的，再往后则公开地使用这一概念了。

也应当指出，有些时候一些苏联理论家把埃及说成是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国家。据我们所知，埃及从来不曾有过任何可以算作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

因此，我认为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不仅把策略而且把整个战略建立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之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当我们肯定这一点，并在我们这些国家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时，我们这样作不是充当披着羊皮的狼来掩盖邪恶的企图，也不是放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站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去。确实，我们的对手，我指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心塌地的卫士们，总会轻蔑地指责我们诡计多端。可能也会有人一时不理解我们，从右的或左的方面来批评我们，对这些人，我们在交往上不能把他们当作对手。我们应当进一步搞好和宣传我们的战略，倍加清楚地说明我们的观点，把这项工作看成是我们民主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

事实上，在我们这些国家里，某些居民不相信共产党的民主诚意，这是与我们自己的活动和政策有关系的。但关系更大的是由

于在那些业已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国家，作为普遍规律，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一党制来建立的，这个专政受到官僚主义的严重歪曲，甚至正在严重地蜕化。

多年来，我们实际上采取民主的政策，但我们却不加批判地主张并维护了那个模式，好象是我们自己的模式一样，这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当苏联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时，这样做还情有可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国际上力量对比起了根本变化后，就没有理由了。

因此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应越来越迫切地在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开展批评，以便有助于找到克服缺点错误的正确途径，有助于对仍然模糊不清的历史现象作出解释。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事实上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实现。而在那个过去和现在仍然作为理想的样板向我们推荐的国家里，更是没有实现。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论述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①

苏联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一种国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加完善，即拥有强有力的控制工具的更强大、更有组织的国家，它代表着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

列宁在发挥这个问题时写道：

“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

了！”①

但是，从革命中出现的新的国家不得不建立一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在斯大林统治下，这支力量后来控制了一切：社会、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其它机器、党，甚至还把手伸进人民民主国家，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在那里策划了骇人听闻的诉讼案，继续进行镇压。

列宁也谈到官僚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②

然而，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国家却不得不组成官僚和常备军，给官僚以特权，他们拿的工资超过一个工人的普通工资，而且实际上他们象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一样不能撤换。

后来列宁本人写文章对这种官僚和官僚主义化的危险作了最严厉的批评。

就是说，在列宁曾经设想要用武装的无产阶级、民兵以及作为工资相当于工人的“公职人员”的可以撤换的官员来代替官僚，代替常备军和专门的镇压机构。但是掌权业已五十多年，那里都没有见过这种理想的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子。相反，出现了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大的国家机器，它恰恰不是列宁所憧憬的“廉价国家”。

既然国家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且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客观上已没有镇压其它阶级的必要，那么这个国家统治谁呢？

十月革命产生了一个国家，显然，它不是资产阶级国家，但无

① 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06页。

② 同上书，第195页。

产阶级还没有成为有组织的统治阶级，因此还不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国家。

这个国家里的斯大林主义有所滋长并起了作用，其一系列表面特征与法西斯专政的特征相似。我指的是表面的特征，因为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过去和现在都是与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截然相反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评价，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各族人民用鲜血的代价所证明的。苏联社会制度的革命本质，通过它同法西斯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获得各国人民的声援，多次得到了证实。

长时间以来，我们用“个人迷信”这个说法，把这些现象都归咎于斯大林的个性。确实，斯大林的个性在这方面是有重要影响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尽管列宁曾斥责过斯大林的个性，但是，象斯大林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能树立起个人的地位呢？确实，斯大林善于在苏共领导集团各个派别的矛盾中极其巧妙地玩弄权术，他先扮演各派统一者的角色，然后又逐步搞掉别人，把所有妨碍他上台的人都搞掉。但是，应该问一问，特别是在列宁病重，活动减少，行将过早地去世，从那时起，斯大林讲究实际的精神比起他的反对派来，难道不是更加符合正在现实中形成的这种国家，更加符合陶里亚蒂称之为制度的东西，更加符合周围的客观环境吗？

显然，斯大林的作法就是集权主义的一种形式，资本主义的宣传曾大加利用，它削弱了我们这些国家一部分居民对共产党民主诚意的信任。

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活动，在一个时期打破了斯大林在苏联和东方各社会主义国家所建立的一整套制度。于是发生了匈牙利和波兰等事件，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些事件中自发地默契地组成了反对斯大林统治制度的“国民阵线”。在波兰出现了

一个足以控制局势的反对这一制度的共产党反对派。在匈牙利则并非如此；是苏联军队恢复了“秩序”，这对共产主义的国际威望是一个新的打击，这在我们这些党内也引起了反响。

有那么几年，赫鲁晓夫象征着苏联对外开放和对内有较大的自由的新精神，在同时期，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加加林遨游太空，苏联的文学和电影有了新的起色。对特别的镇压机构进行了清洗并加强控制，出现了一种春天气息。

这个时期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了。但是，这个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当我们都认为终于出现了一个能对好事和坏事共同负责的集体领导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把赫鲁晓夫赶下了台，揭发了他的“错误”。确实，还在赫鲁晓夫领导期间，发生了与中国的冲突，根据人们逐步了解到的情况看，赫鲁晓夫对待这些冲突确实是轻率和拙笨的，他使用的办法与斯大林那时的傲慢跋扈差不多。

实际上，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来改变斯大林所建立的国家机器（即陶里亚蒂所说的政权的制度），这个国家机器最后也把赫鲁晓夫压得粉碎。

这一制度并没有改变，并没有民主化，在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还保留了许多强制的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之举就已暴露无遗。

斯大林时期大规模肉体消灭的镇压没有了。赫鲁晓夫被废黜后，死在他家的床上。已经有了一个进步，但由于在某些方面（当然包括文化方面）还在进行镇压而被玷污了。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国家，仍然不能算作是工人民主国家。

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党更加难以相信，在苏联是否真正存在着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各国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多表面的东西的话，到目前为止，共产党人所达到的工人阶级民主也是这样。

说这些话可能会被某些不肯讲真话的同志看作是损害国际主

义的罪行。

但是,今天在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在进步运动中,这些问题根据不同的情况,已程度不同地公开化了。这并非象随风倒的人经常说的是受“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之故,而是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我们这些自以为对先锋力量的称号当之无愧的共产党人,怎么能在承认事实,正视现实方面落后于别人呢?

此外,承认事实,正视现实是在已经废除或者仍然存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国家里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的唯一方式。

在苏联出现的国家已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它不保护私有制;但也不是列宁所设想的劳动者直接行使权力的国家。怎么能把这样的国家放进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观点之中呢?列宁说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国家还保留着许多资产阶级权利。但我们所说的国家在这方面已超过了列宁的预见。这个国家不仅保留了资产阶级权利,而且竟然出现了以前只能设想在帝国主义国家才会发生的种种畸形和蜕化的现象。

同时,我要坚持说,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这个国家曾为苏联社会制度所固有的进步政策起过作用。

这是两种互相矛盾的,但并不互相排斥的特点。如果想作客观分析的话,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特点。

这一切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政治实践的问题,一切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首先是苏联同志应该严肃、大胆地去探讨和阐明这些问题。本来,国家的问题不仅是在私有制消灭之前,而且在私有制消灭之后,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什么类型的国家?

对这个问题的实质,我认为我自己还不能给予一个满意的回答。但是我想提供一些材料,便于人们对这一课题进行更全面的、

深入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谈到了共产主义建设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阶段，他们概括出一个经典的公式——**按劳分配**；第二个阶段是共产主义阶段，是**按需分配**。

建立起给予劳动者最广泛民主的无产阶级国家，这是第一阶段的任务。第二阶段——共产主义，国家将要消亡。按恩格斯的说法，国家将与纺锤和铜斧一起进入博物馆。

但是在实践中已证实，情况远为复杂。严重的是对于已经变得复杂得多的实践，我们却在继续运用原来的理论公式，这样思想便脱离了实际，并与实际发生了矛盾。思想脱离了实际，就会带上精神失常的、迷乱的特点，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思想与实践关系所固有的特点。一个体力劳动者或脑力劳动者还未能**按劳得到分配**；还在困难的条件下生活，还是官僚制度的受害者；还不能参与任何重要的社会决定而又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予以忍受（对他来说，这是集中了力量和决定权的那种国家和党的两位一体的东西强加给他的），这样一个还没有摆脱精神失常状态的劳动者，尽管已经没有私人资本家在剥削他，他却不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主义里。用以前只能提出一般性的预言时制订的思想公式向他说明道理，不但不能使他满意，而且他还可能开始怀疑社会主义。如果对他**说共产主义建设已经开始，那就更糟**。于是他就用笑话来出气（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笑话流传已成了常事），甚至低估他生活的社会无疑已经取得的真正的进步——这些进步无非是些物质进步，可是却要**说成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甚至说成是共产主义**。

若干世纪前，有些传教士一半象神秘的预言家，一半象无处安身的流浪汉，他们在俄国沿途播讲人类的末日，播讲《启示录》，吓唬反应迟钝容易上当的乡民。今天，索尔仁尼琴也装成这样的传教士在全世界招摇撞骗。理想和现实脱节造成了悲观绝望以至

最无法按捺的憎恨，真可谓是集这些思想之大成的人了。与之相比，彼得一世也可算是危险的革命家了。

但情况与这位作家相同的，竟大有人在。这使人担心对于现实不能进行或不能充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因为国家制度没有为此提供畅通的渠道），最终会壮大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这种反对派都是要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的”，都会严重地阻止或妨碍能在社会主义意义上改变形势的力量增长。

应当回头来看看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同简单公式之间的矛盾。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公式中，除了上述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没有考虑到由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政权，应当着手进行现代化生产所必不可少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积累的阶段。也就是说，没有考虑到新的国家首先不得不完成一项典型的资本主义的积累的任务，这一任务在短期内是不能完成的，也不会因为给它加上了“社会主义积累”的名字，其内容就会有根本的变化。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引起的痛苦是众所周知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一积累意味着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对建立在个体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的破坏；对儿童和妇女劳动的难以置信的剥削；成百万的家庭挤在非人条件的工厂里干活；对殖民地人民的掠夺……。

应当提出，在苏联建立起来的这种国家，特别是与斯大林名字连在一起、有其一切过火、暴戾、专断的专制制度，难道恰恰不是行使了实现原始积累、全力发展现代工业这种职能的结果吗！的确，工人阶级和青年中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在革命热情鼓舞下，参加了这一工作，忍受了巨大的牺牲。苏联第一批文学和电影中某些最优秀的作品，就渊源于这种伟大的奋斗精神。这些作品在全世界掀起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浪潮，使千百万无产者对俄国革命抱有热烈的信念。不管怎样，这种革命意志和干劲在斯大林时期曾经

存在,在这一时期里确实创造了巨大的物质和文化成果,基于这种原因,不应该单纯从反面去看这一时期。

因为从反面看,要实行这一积累,要为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迅速地发展现代工业作出巨大努力,就要求劳动人民作出巨大的、无穷无尽的牺牲,而广大居民是接受不了这一点的。这一错误影响了工农联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建立一种不仅镇压旧的统治阶级,而且也镇压一部分人民(确实是人数不少)的国家;他们不愿忍受那样的牺牲,客观上可以动员起来反对新政权。

官僚化的现象不仅产生于沙皇国家的传统,也产生于理论家未预见到的这种形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绝大多数人镇压极少数人的,甚至要以广泛的工人民主的组织为其条件的一种政权。在实践中事情并非如此,大部分居民是被动的,很大一部又是持敌对态度的。工人民主逐渐地缩小了,党内民主也缩小了,社会上的尖锐矛盾反映为党内派别斗争之加剧。列宁逝世后,谁也控制不住了。这样便发展了一个官僚阶层,它逐步包揽了各种领导职能。这一官僚阶层认为自己承担着工人阶级的社会使命,自以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但这一官僚阶层是按照客观的、固有的、特定的方式和规律行事的,于是渐渐根深蒂固,渐渐具有了自身的利益。

1918年5月26日,列宁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说:

“我们并不闭目不看这事实:我们是不能够单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国家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甚至远远不象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四年空前的、痛苦的、破坏一切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①

^① 列宁:《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27卷,第386页。

列宁在另外一些时候也曾重复这一思想。他逝世后，斯大林在一段时间内也承认，在一个国家内不可能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只有革命在其它发达的国家内也取得胜利时才能实现。

后来在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宣告了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建成（这并未妨碍后来按斯大林的命令从肉体上消灭出席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大部分代表和进行臭名昭著的审讯），在意识形态上抛弃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同苏联建成的国家的特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国家已不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服务，在苏联已经没有资本主义所有制了。从这一意义上说，官僚阶层不能被认为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阶级。这一阶层并无私有财产，从苏联企业中抽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以维持这一阶层的，肯定比维持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少。但是，各级的官僚阶层拥有不受阻挡的，并且几乎是无人监督的政治权力。这一官僚阶层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甚至凌驾于党（党是服从它的）之上，决定和处理一切。

我们看到社会发展为现阶段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这样一个国家，与社会相比是比较自由的。这丝毫不意味着社会已是自由的。

总之，苏联的国家已经履行了取得国家经济、工业、技术、文化和卫生发展的职能，也履行了保证国家防御的职能。也就是说，确保完成了在其它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度里，由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的任务。废除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就为过渡到发达的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条件。今天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国家的结构本身，是不是变成了、至少是部分地变成了过渡到发达社会主义的障碍呢？这样一个国家是不是束缚了真正的工人民主，它是不是阻碍了国家的物质发展呢？

问题在于，这个并非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不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正如中央集权的君主政体是封建社会与现代的资本主义议会民主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一样呢？假如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就可以用其特性和职能，更为客观地科学地对斯大林问题和其它相似的现象作出解释了。

问题在于这个国家要求不要求苏联的党和社会进行严肃深刻的改革，使国家成为一种真正的工人民主制度，成为其缔造者所预见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国家。

无疑，在苏联领导人身上，已开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尽管只承认社会主义民主之不足。在赫鲁晓夫时代甚至制定了“全民国家”的理论，而现在已不坚持这一点了。但是把党与国家混为一谈，看来主要是为了制造一些思想观念，用以掩盖无法令人满意的现状，而不是为了真正改造现实。

我自己还不能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我只是提出一种看法：必须进行一项理论研究工作，这一工作应为探讨各种政治出路提供依据，并应引起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首先是引起苏联同志和处于类似情况的人们的注意。

也就是说，恐怕需要对政治制度作一个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不能做或者不会做的理论分析，这样的分析也许能成为苏联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新的跃进的起点。

世界形势及其对国家的影响

为了分析苏联这类国家机器的特点，还要考虑到它在发展过程中所处的世界形势。

加速工业化就减少了民主，就为获得工业化的必要投资而把螺丝紧拧到底，这并不完全是由于内部原因而任意作出的决定。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的包围以及战争威胁（战争虽

然在 1941 年方才爆发,但却一直威胁着苏联)所迫使的。当时的问题是实现工业化还是屈服,后来的法西斯侵略也证明了这一点。

帝国主义列强,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用战争威胁的办法在影响着整个苏联的内部发展,迫使苏联加快积累和工业化的速度。这必然限制了社会福利措施;也是造成农业落后的原因。换句话说,这种速度最终也妨碍了工农联盟,缩小了这一政治制度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有利于形成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其强制性得到了巨大的膨胀,纵容了斯大林时期的种种过火的作法。

实际情况证明,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在一系列发达的国家胜利,一国便不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

如果国际形势不是这样,工业化的进程可能会慢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会更加稳妥,不致于失去同盟军,群众的生活条件也会更快地得到改善。这样,就会对劳动者的民主的繁荣创造出更有利的条件。

世界形势迫使苏联领导人作了如下的抉择:把这新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为此目标,牺牲很多事情。这个在十月革命中诞生的,后来又经斯大林发展了的,然而至今仍未能摆脱这个难题的国家,由于作出了上述的抉择,更加具有了一些特点,使独裁性质更加突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打破了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范围扩大了,这种情况也未根本改变。新的革命国家也是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诞生的,它们需要工业化。捷克斯洛伐克是当时唯一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水平的国家,它完全是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达到这一水平的。捷克斯洛伐克在失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资本和原料之后,在东方未找到有效的替代,因此,不能象在 1936 年与它处于同一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济上繁荣起来。

苏联的国家模式几乎是自动地扩展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去的。正如后来苏共二十大所承认的那样，在斯大林政策的影响下，把“互相支持”和“国际主义”执行到这样的地步，使这些国家的独立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这些国家里，列宁所预见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样形式纯粹陷于表面形式。1968年苏联军事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一方面表明其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而引起的危机；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苏联制度的保守主义和强权政治。

无疑，尽管共处政策是有成果的，但世界上军备竞赛在继续进行，这在客观上就加强了苏联国家的讲究实力的特点。要保持一种能与美国相匹敌的强国地位，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就会有损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就说是军备竞赛对技术发展能起积极作用的话，那末技术发展的成果，在美国是能在其它经济部门更快地加以推广，进行销售并有助于经济的发展的；至于在苏联却因其计划死板、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的严格划分和对军事部门的盲目崇拜，就不能有同样迅速的效果。

另一方面，今天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不仅以其军事压力，尤其以贸易和技术作为武器，能在苏联作出的很多决定中起着一种即使不是决定的也是有影响的作用。

对这一点，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索南费尔特和基辛格在美国驻外使节一次会议上的演说，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尽管在很多方面，索南费尔特和基辛格用更符合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来看苏联与其盟国的关系；尽管他们明确承认美国的力量有限，美国今天已经没有充分的力量来驾驭世界舞台新的力量对比中的问题；然而也提出了另一些看法，虽然离奇，但确真有道理。比如说，认为苏联作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其主要支柱是军事威力，鉴于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存在问题，美国可以用一项灵活的、长远的贸易政策来影响苏联的政策。

今天谈论世界冲突，反而无助于使苏联转化为工人民主的国家。因为谈论的是力量问题，这就会首先突出军队及服务于军队的辅助部门，就会更多地有助于加强其一致性而不是引起争论的趋向，有助于巩固其权威而不是发扬民主的趋向。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军队和权力机关起那么大的作用，尽管它是一个没有资本家的国家，尽管它支持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却还存在着把强权作为其主要目标的危险。这样的国家容易把意识形态作为强权的一种工具，容易把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争取解放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看成为它在世界对抗中自己一方的补充力量，容易把国际主义看成为它的强权的辅助，并把它当作工具。

人们不但没有承认这种国家取得发展的客观形势、条件以及它本身存在缺点错误限制了国内的社会改造，限制了把劳动者，从而把整个人类从一切压迫和迷惑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事业。人们不但没有承认其国家结构中，还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创建者预言的过渡国家格格不入的、带有旧的国家残余的东西，亦即不但没有承认我们只是在努力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能够发扬光大（这也是历史对我们的唯一要求）；反而力图把事情说成为我们已经处在完全的社会主义之中，甚至说已处在共产主义的前夜；说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社会主义了。

在这一名义下，企图维持我们称之为旧的国际主义，也就是说，以无条件地捍卫苏联来判定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主义：“对苏联的态度是检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

但是，我们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进行活动的共产党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即：要靠已经没有资本家的国家和还有资本家的国家的对抗来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当今的世界已是另一样了，索南费尔特已经承认了这一点：

“不论我们做什么，苏联人在世界舞台上都要起作用，并将表现出

来……。应当放弃这样的看法，即：把缓和看成是同苏联的力量妥协或实行绥靖的一种方法。我们今后的任务是与其共存或驯服这一力量。我们今后的问题是要在拥有另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上生活。人们等待着在未来的二十年以后将有第三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出现。”

如果说过去在某些国家，由于统治阶级的军事失败，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使劳动者取代了被战败的统治阶级，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也要走同样的道路。我们不希望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发生战争，也不要它们遭到军事失败。问题不在于东方以武力打败西方；应该把我们谈的问题同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绝对区分开来。资本主义作为统治阶级在每个国家都应被取代掉，应当由每个国家人民自己在不失去其民族特性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西方共产党人的作用不是增加东方军事集团的威力；而是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进行政治—社会改造，而又不削弱国家；是为制止战争而斗争，争取在各国人民利益和他们之间民主关系而不是压迫关系的基础上，实行国际合作；为限制和销毁原子武器、为裁军与和平、为同时消除各种集团和外国军事基地而斗争。

在资本主义西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打垮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取代剥削阶级；但不是靠外国强国来打垮这些国家。

我们共产党人要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对这些国家历史的民主成果得到更全面的发展作出贡献，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并建立平等的、博爱的关系，就是为了要使自己出生所在的国家蒸蒸日上地强大起来，从而促进人类的进步，而决不是要我们自己的国家从属于其它国家。

我们现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预先表明了我们在将来要同所有的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建立平等民主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的愿望。我们决不为了任何意识形态的或物质的利益而把我们的独

立抵押给任何人。

基辛格在美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的演说中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主张，表明了美国政策纯粹是资本主义的，有助于揭开虚伪民主的幕布：

“有些人认为我们对西方共产党的态度太固执了，但是我们不能纵容这些党取得进展，也不允许开辟这样的先例，即由于我们不采取行动而促进了共产党的胜利。这一党或那一党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莫斯科的路线，这并不重要。哪怕葡萄牙仿效了意大利的模式，我们也会全力反对的。这不是因为库尼亚尔是斯大林分子我们就反对葡萄牙的演变。意大利共产党许下了要有效地执政的诺言，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会在法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如果西欧各国共产党都控制了政府，很难想象我们如何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继续进行讨论。也许我们可以象对中国那样，奉行平行的政策。但是，象目前存在的这样的联盟则不能存在了。西方联盟的重要性历来是大于军事安全的。”

对基辛格来说，问题不在于一个共产党是不是在“遵循莫斯科的路线”，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充当苏联力量的一部分，他甚至主张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要那么触犯”莫斯科。实际上，基辛格并不注意军事力量的平衡；这种军事平衡并不决定于结盟，也不决定于基地，而决定于核威力的发展。这些联盟可能消失，但平衡仍继续存在。基辛格关心的是在西欧不要改变社会制度。因此，他才说“联盟的重要性历来是大于军事安全的”。他不认为联盟应起军事防卫作用，而是用来施加军事压力，防止发生各国都想用民主方式实行的社会变革。

他的供认是重要的，因为它打掉了某些简单的教条主义的论据，这些论据认为，对苏联的独立立场就等于靠近美帝国主义。实际上，使基辛格担心更多的是每个党的独立民主立场，而不是每个党的尾巴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因为，一个党持尾巴主义和教

条主义的立场，在一个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很难获得，尤其很难保住在政府中的地位。

现在再回到我们前面开始谈的看法，有人提出要在两种制度的世界性对抗中，在两种力量或两种力量集团的对抗中争取社会主义，这不是我们的主张。因为首先，直至今天取得的社会主义还不过是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还不是一个能在意识形态对抗中决定胜利的光辉的榜样（我这里指的是我们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采取的模式）；第二，一次军事对抗对双方来说都会是一个自杀。

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清一色的，在其内部存在着各种倾向。这是一个现实，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简单地说，有一种以苏联同志为代表的倾向，这一倾向要使运动服从一系列的教条，亦即在宣传上肯定苏联建立的那种制度；但是除个别情况外，这一系列教条对于要使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不起作用的，要使共产党成为各国的领导党就更起不了作用。另外的一种倾向就是中国倾向，对于它很难下个定义，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它几乎只表现为对苏联的极端仇视的态度，在实践中低估国际工人运动的作用和独立性。

我还要说，简而言之还有一种新的倾向，它主要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出现的。这一倾向表现为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批判的方式承认至今为止革命运动取得的成果，希望用对结构、经济、社会、文化变化的分析与判断来充实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这一倾向要求走民主的道路，要求独立地制定自己的战略。

之所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类型和倾向，当然，民族因素是起着影响的；在这缓和与合作时代，阶级斗争——不是阶级合作——的民族形式是占首位的；具有长期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的党在政治、理论上的成熟程度或大或小，也起着影响。

以上就是同时既有一致又有矛盾的原因。一致性产生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在这一制度下存在着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矛盾是与一种类型国家的矛盾，从其特点来看，这种类型的国家不仅企图凌驾于自己的社会之上，而且要凌驾于其它国家的社会之上。这种类型的国家基于一系列主观和客观因素，有成为强国的倾向。其中的某些原因我业已努力在书中指出。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可能帮助苏联社会和苏联共产党人克服这种国家的缺点，在把国家改造成成为真正劳动者民主的国家中获得进展。这是一个历史的需要，它将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彻底打破很多资产阶级宣传，作出巨大贡献。因此，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同志未能继续进行他们的试验就更为遗憾了。